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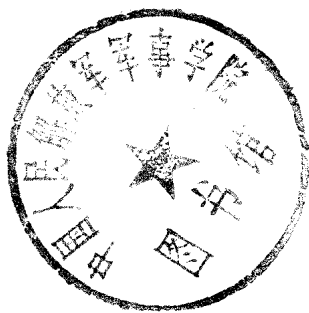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回忆录

〔美〕 约翰·司徒雷登 著

程 宗 家 译

刘 雪 芬 校



北 京 出 版 社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RANDOM HOUSE • NEW YORK

(根据纽约兰登出版社 1954 年版译出)

在 华 五 十 年

——司徒雷登回忆录

〔美〕约翰·司徒雷登 著

程 宗 家 译

刘 雪 芬 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00,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书号: 11071·156 定价: 0.80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司徒雷登于1876年生于中国的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截止1949年8月离开中国，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本书就是作者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回忆录。

本回忆录追溯了作者传教士家庭和其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与发迹史，记述了作者本人在旧中国的种种经历与当时的一些主要事件、人物，以及美国各派教会布道团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和兴办学校的情况，并以主要篇幅叙述了美国扶蒋反共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以及其本人在扶蒋反共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中所起的作用。1949年南京解放的时候，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撤走，后来在艾奇逊发表《白皮书》前夕，以普通美国公民身份奉杜鲁门政府之召灰溜溜离去。毛泽东同志在三评《白皮书》时，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瘟神，本书可作为帮助读者理解毛主席这篇文章的注脚。

司徒雷登对中国事务的种种叙述几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因而十分反动，但在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史、外国在华布道事业的虚伪性、美蒋勾结的历史和蒋王朝倒台的必然

性的时候，作者却在其回忆录中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资料。因此，本书按原文照译，只删掉了马歇尔写的序、胡适写的导言和大段吹捧蒋介石的个别章节。此外，附录、索引、照片也没有收入。

本回忆录涉及到旧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史料庞杂，书中有许多人和事无案可查，或者有案也难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了不少知晓有关史实者的帮助，特此致谢。

译 者

1981年9月

前 言

我过去在中国所建树的一切显然正在遭到破坏，而我的国家却委派我去担任驻华大使，我感到这对我不仅是一个极大的嘲弄。不过，我所受的挫折、我的失望和不安仅仅是精神上的；我知道，我的许多同胞和另一些国家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是自愿去中国的——这时正困在中国，遭到粗暴对待。他们有的受到凌辱，有的遭到监禁，有的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受到折磨，有的甚至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折磨，有的则给剥夺了与他们的中国朋友或别的朋友接触的权利，几乎所有的人都丧失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还有少数人就这样迫害死了。千百万中国人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处死的、饿死的比比皆是。最近我听说，强制劳改的人不下四千万。许多人宁愿去过痛苦的离乡背井的生活，还有很多人也希望能走这条路，但是一直无法脱身。

在共产党人当政之前，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自从共产党人接管之后，前者少了，而后者却增多了。过去，我和那些与我一道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的伙伴们作了毕生的努力，就是要使好的东西更好，使不好的东西减少。而今，这种努力所创造出来的、能见得着的东西（包括工厂及其设备、教堂、学校、大楼和医院），有相

当一部分已摧毁掉了，更多的是给共产党人按其需要改作了它用。不过，我认为中国的传教、教育与医疗事业资助人的投资，以及那些献身于这些事业的人的投资——他们的影响——大部分并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掉。

投资者和受惠者的心里仍然牢记着投资和受惠的好处。基督教徒仍然保持着基督教教义和习俗。那些由于教会的传教士、牧师、教会的医生、教会的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以致身心更加美好的千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仍然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即使在中国大陆所作的其他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实际并非如此），“中国教会学校联合会”高举的中国教会教育的火炬，仍然在台湾和海外华侨中放射出光芒。我一生的心血，我的传教士同事，我的中国同事以及我们前辈的心血肯定没有白费！

我也不承认中国（大陆中国）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共产党人已经在大陆站稳了脚跟，现在确实好象牢牢地控制着它。但是，谁能讲中国的任何政权是永世长存的呢？人们如果想一想自孙逸仙以来中国和整个远东所发生的一切，谁能说中共政权会维持下去？共产主义思想同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共产党人办事是粗暴的，不顾人权的，强制性的。共产党一大批一大批地雇佣俄国顾问和技术人员，必然会引起内外摩擦。共产党人丝毫不顾中国的国际义务，蔑视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更有甚者，它还悍然入侵邻国，向联合国开战。

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政权会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我确信要不了多久，这个极其可恶的魔鬼就会走完它自己的道路；

在人们经过权衡，发现它的缺陷之后，将迫使它放松其控制，结果它也就会从此完蛋。我还有这样的信念：基本上具有民主的社会风尚和政治理想的中国人，当他们从冒牌的“人民政府”的暴政下获得解放之后，将重新向着国家的统一、民主、安全，及和平、进步的目标前进，出色地履行其作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好邻居的职责。这一进程始于1911年，之后曾数度中断和恢复。

本书试图叙述我一生的经历。许多年前我就动笔按时间顺序撰写这本书了，现在我把它赠给那些愿意关心它的人。所以，本书不是在付印前的短暂时期里一气呵成的，而大体是按日记的体裁，或以一个作家在一段长时间里写一系列文章和随笔的方式，一章一节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章节是回顾了往事写成的。一些章节是在它们所阐述的事件正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写成的。最后三章则是我在1949年回美国以后写的。

我要感谢斯坦利·霍恩贝克博士，他同我合作写了最后三章。霍恩贝克是我的老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象我一样，他在进入外交界之前也是一位教育家，长期以来我同他有过多次愉快的接触，并和他多次有益地交换过意见。这三章中的第一章讲述的是我离开中国后的种种活动（和闲散生活），与我有关的政治事态的发展以及我根据各种变化——我本人的变化、政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得出的结论；第二章记录了我对过去的回顾、对当前时局的考虑、对将来的探索，并重申我仍怀有信念和抱有希望，它们仍然鼓舞着我；第三章是对人们反复向我

提出的，也是我自己经常想到的关于美中关系问题所尽力作出的回答。三章都是由我叙述的，不过，由于我体力不支，许多文字都是由霍恩贝克博士根据我的笔记，和我们的多次谈话写成的。他不断把写好的文章送交给我看，由我反复审阅多次，并完全征得了我的同意。文稿准确地反映了我的回忆、想法和观点。那么，同其他各章一样，这三章的文责还是由我来负，完完全全由我来负。

我还应当感谢其他朋友们的帮助。毕范宇博士亲自为我的全部手稿作了修改和编辑。毕范宇博士在宗教界和其他各界里是十分知名的，是我很早以前就认识的朋友。他的父亲菲利普·弗朗西斯·普赖斯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兰登出版社编辑部的戴维·麦克道尔对本书编辑和出版问题的处理是令人鼓舞和放心的，并且帮助很大。

不用说，我应该感谢乔治·马歇尔将军慷慨地为本书写了序言，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我们彼此之间美好的情意，以及他对本书的兴趣。我俩都清楚，而且本书的所有读者亦将了解到这是事实。我还要感谢胡适博士为本书写的导言。他花了许多时间，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天才，分析和评论了我力图讲述的事件。

最后，我还要感谢傅泾波先生。由于他的帮助我才写成了本书，并正在将它付印出版。傅泾波对本书的内容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俩人甚至对有些实质性的问题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这部手稿；无法同人们进行交往、谈话和通信，而这一切正是完成和出版本书

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虽然我是前台的表演者，但是全部的赞誉应当归于作为总指挥的傅泾波。

我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给予我上述的帮助、鼓励以及其他一些在这里不曾提及的善意的表示。

约翰·司徒雷登

1954年5月25日

于华盛顿特区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言	1
一、祖先与早年	1
二、大学与神学院时代	15
三、回到中国	30
四、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	44
五、燕京时期的个人经历	77
六、中国舞台上的人物	95
七、日本占领与自由之岛	118
八、监禁与释放	129
九、应召搞外交	152
十、未曾实现的梦想	168
十一、日益加剧的困惑	208
十二、在竹幕后面	233
十三、返回华盛顿	253
十四、退休中的回顾	277
十五、美国和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291

一、祖先与早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跃而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如今仍处于不幸的国家。

中国历尽沧桑，我在它的土地上见到了古老衰败的满清帝国、理想主义者孙逸仙早期创建的共和国、一个后期建立的连军阀和贪官污吏也无力对付的共和国、着手进行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工作的国民政府、骄横的日本人在中国部分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短命的统治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为患的中国，以及当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中国。通过现代史上这些不同的时期，我看到一个古老而又是崭新的文明正在经历着日益加剧的痛苦，它努力使自己适应二十世纪的新情况，而且它也必将跻身于那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很强大的世界民族的行列。

回顾自己近八十年来的生活，我深切地感到，神圣的上

帝就是我的引路人。我还发现，在我个人生涯中，许许多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都是在受到外部束缚并与个人心愿相违背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一股并非属于我自身的力量，一再驱使我去经受磨炼和从事一些我不曾企求或预见到的冒险事业。不管今后情况如何，我深感安慰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对发展美中之间文化与精神方面的关系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如今这种关系虽然明显地破裂了，但我相信，它将在正在出现的民主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格局中，作为一股牢固而又绚丽多彩的联系纽带而得到恢复。

(一)

我的父母亲出身于两大英勇无畏的开拓者家族祖系。美洲大陆上的斯图尔特这一家族的祖先是阿奇博尔德·斯图尔特。他原是出生在爱尔兰伦敦德里的苏格兰人，据说他是奥基尔特里勋爵的一位贵族后裔，后来做了斯图尔特堡的伯爵。他因参加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起义运动，而逃亡到宾夕法尼亚州。跟他一块出逃的还有他的两个兄弟戴维和约翰。事过七年之后，他的亲属也跟着到了那里。当时，阿奇博尔德定居在弗吉尼亚州韦斯博罗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的四个孩子长大后也各自建立了大家庭，散居在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州里。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大·斯图尔特，他先后担任过菲尔莫尔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和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校长。另一个儿子是斯图尔特将军，他在联邦军队中曾是一位勇猛的骑兵指挥官，相传当他作战受伤被抬下战场，他的部下向他挥手告别时，他却大声勉励他们说：“回去吧，回去吧！要象我一样

去履行你们的职责。”

约翰·斯图尔特原先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县的沃克湾，后来迁居到斯汤顿镇。他的孙子罗伯特·斯图尔特是一位长老会的校长，他早年曾乘坐一辆带有顶篷的四轮马车奔走于弗吉尼亚州河谷与肯塔基（当时仍是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荒野之间从事开拓性的工作，并为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城创办法兰斯斐尼亚学院出过力。他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语，曾一度担任过院长。

罗伯特·斯图尔特娶了汉纳·托德为妻，她是亚伯拉罕·林肯夫人玛丽·托德的姨母。罗伯特的长子（即我的祖父）就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罗伯特·斯图尔特的次子约翰·斯图尔特从中央学院毕业后，迁到了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镇，后来同林肯一起从事法律工作。对斯图尔特和林肯两家族的关系，我是在十一岁上回到美国后才知道的。当时，这一情况使住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城的我和我的弟弟极为震惊，因为我们感到，在我们南部的朋友们看来，我们来自中国已很引人注目，这种家族关系更会招灾引祸：甚至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了。^①

戴维·托德·斯图尔特倡导妇女教育事业。他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城斯图尔特女子学院的创建人，又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的儿子，即我的父亲约翰·林顿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杰弗逊学院和肯塔基中央学院，并于1861年毕业于该中

^① 当时南部是蓄奴州，而林肯是反对奴隶制的，他在南部的亲属自然会有不测的危险。——译者

央学院。他教了四年书以后，又进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于1863年毕业。正是在普林斯顿时，倪维斯博士从中国写来了令人兴奋的信，促使他把心思转移到了国外传教事业上。1868年，新建立的南长老会海外执行委员会将他和另外两位同伴作为第一批传教士派往中国。他们取道纽约，经巴拿马地峡到了旧金山，从那里再往上海，一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开始在杭州工作。杭州在上海的西南边，与该市相距一百二十英里。斯图尔特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涯一直是在那里度过的。

(二)

1868年我父亲只身一人到了杭州。他发现他的前任因斯利牧师相信，可以通过“同中国人一起生活”来学会汉语。于是，我父亲便在一座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住处，并雇了一个没受过正规训练的厨师为他照料生活。后来，经过五年持续不断的劳累、奔波和生活的煎熬，他的身体垮了，遂被送回祖国休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更为重要的是，玛丽·霍顿做了他的妻子，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她为他以后的身体健康起了最大的保证作用。玛丽的父亲古斯塔夫·霍顿法官是莫比尔市现行教育制度的倡导人，一度当过该城市长。玛丽·霍顿（那时人们称呼她“玛丽小姐”）在战后贫穷的南方创办了一所以她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并在亚拉巴马州享有名气的私立女子学校。它不仅受到南部各州，而且还受到北部观察家们的广泛注意。在一位现代评论家的笔下，

“玛丽小姐”是“一位才智非凡而富有社交天赋的小姐”。她有着美丽的歌喉，人们曾劝她到德国去接受专门训练，但是她没有去，而是跟随丈夫去了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她把女子学校移交给了她的助手玛丽·巴格比小姐。玛丽·巴格比小姐以巴格比女子学校为名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了二十多年。

我的母亲曾许配给联邦军中一位海军军官，后来这位军官在莫比尔湾的战斗中阵亡了。这也许就是我母亲不顾朋友们的劝告决定到国外当传教士的原因，尽管当时他们认为她这是一种狂热的念头。常和她通信的教会海外部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建议她出席总务委员会会议，去见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青年传教士，说他可以向她提供布道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她接受了威尔逊博士的意见，未料，她这样做正好促成了威尔逊博士为那位独身传教士所作的婚姻安排。我父母亲给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约翰·雷登，或许就是出于对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的感激吧？对年轻的传教士们来讲，威尔逊博士是一位有感召力和富有魅力的人。南北战争前，他在非洲做了多年的传播福音的工作，是一位传播福音的先驱。他在那些新的领地内进行了探索，曾经捕到一只大猩猩，并将这只活猩猩带回美国。后因身体状况不佳，他不得不留在国内，起先任全国长老会海外部干事，后来在内战时国家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便担任了新建立的全国长老会南方分会的干事。

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偕同新娘于1874年夏天乘船前往中国，定居杭州。

(三)

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在马可·李罗的笔下，杭州是一座景色无限优美的城市，他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运河、桥梁和街道。杭州在宋代朝廷为逃避“北方蛮人”的侵扰而南迁后，曾一度是它在南方的国都。中国有一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

在我父母定居杭州时，他们见到的是一座仅于十年前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被劫掠破坏无遗的城市。不过，周围乡村仍保留着原有的美丽景色，这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上贸易正开始得到恢复，丝、茶和扇子是这一地区著名的特产。

南长老会布道团最初在杭州建址的时候，它的地产在市内城隍山上。山坡上是一排排的庙宇和政府官员的住宅。布道团所在的地点居高临下，碰巧正对着省财政厅厅长的住宅。那时，每当这位厅长的儿子患病，医生和占卜家们就把病因归咎于一股邪气，说是由于外国人住在山上造成的。于是地方当局便挖空心思，编造理由，要求传教士们搬迁到城市的另一头，换一块较大的地方。这一要求被接受了。新地点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

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

我父母除了在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中做传播福音的工作外，对兴办学校也抱有兴趣。我父亲办的一所男子学校，后来给布道团关闭了，布道团的成员们认为他的正经职责是传教而不是搞世俗性的教育。不过，我父亲把几个尖子学生挽留了下来，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在后来的许多年间，他们成了布道团里出色的中国工作人员。我母亲办事则更为成功。她帮助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学校的人数和影响不断扩大。她任该校校长多年。后来，这所学校并入了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

(四)

斯图尔特夫妇在杭州生有四个儿子：约翰·雷登（生于1876年6月24日）、戴维·托德、沃伦·霍顿和罗伯特·柯克兰。

我和这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因此，我们也就备受宠爱。我们成年后，总是怀着敬慕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我们的父母。他们教子有方，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的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有一年夏天，我们到了山东的青岛，

暑天是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度过的。有一次，我们乘坐骡轿到登州去看望我父亲的朋友、著名的传教士学者马蒂尔博士，他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我们小时候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同我们讲中国话并为我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回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我们极喜爱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尤其是当时盛行的为举行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虽然我弟弟沃伦随家里的人回美国休假，重返中国后曾上过中国学堂，但我们没有读过中文书，这是我那些年莫大的憾事。后来，我这位弟弟回到中国做传教士，他还记得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这为他学中国话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尽管我们与外界不来往，但当时人们在新年里吃年夜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以及类似的尚未受到现代交往影响而仍具有中国生活特色的场面，如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留有許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

在我十一岁离开中国之前，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母亲。她确实教子有方，我和戴维在莫比尔上公立学校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跟上班里的功课。在杭州，除了举办家庭全日制学校外，我们还有主日学校，并经常举行家庭祈祷。有时，我跟着父亲到街上或到庙会上传播福音。如今，我还记得在父亲讲道时，有些“听众”就他的衣服和外表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时我就怀疑是否值得向那些人传道。

后来，我在美国对这种传教活动也就产生了厌恶心理，而这种厌恶心理正是我自己在下决心从事传教工作之前所要克服的。

1887年，约翰·林顿·斯图尔特牧师和夫人在中国传教十三年后，乘船回美国休假，随身带着四个孩子，年龄分别为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

(五)

那一次回美国给我留下的某些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记得，那是一次新奇而又相当可怕的危险旅行。海船上的女服务员说，我们是她所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许多别的孩子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父母向我们说过美国生活水平较高，因而当我们在旧金山码头见到衣着破旧的报童时，我们就感到惊异——怎么会有贫穷的“外国儿童”呢？火车头和列车对我们也是新奇的事物。当时中国仅从上海到吴淞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然而，由于中国农民怕他们祖坟鬼神的安宁受到打扰，就将它拆毁了。

一到达亚拉巴马，我就陷入了激烈的矛盾心情之中。为了激起人们对中国进行传教的兴趣，父母就采取了人们所普遍采用的做法，把我们兄弟几个当作可居的奇货而加以利用。他们从中国带回一箱箱的“珍奇”，多半是中国人日常的服饰、餐具和敬神用品之类的东西。我们小孩都穿上中国服装打扮起来，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唱圣歌——特别是唱“耶稣爱我，这我知道”这一句——把我们当作陈列品来展示。后来，当我和我大弟弟留在莫比尔时，就感到更难堪和

丢脸了。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英国人在上海开发初期的老式样。我们讲起话来，就跟我们早先在中国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人讲话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们的语言、习惯、兴趣与爱好，我们简直无知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的堂表兄弟姐妹一方面为有我们这样一些奇怪的亲属感到难堪，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的关系而得到乐趣或受到人家的恭维。在这个小小的最南边的州府（我母亲就是在这里干了那桩极端愚蠢的事，要献身当一个传教士的），我们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连我母亲以前的朋友和学生也向我们提出一些令人恼怒的问题，诸如我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是吃耗子吗？我们讲不讲中国话等等。尽管提问人并无恶意，这些问题终究使我们感到不胜其烦。有的来访者甚至这么不得体地冲着我们说：“天哪！他们看上去多么象中国人呀，是吧？”

1888年秋，我父母亲回中国，把我和我的弟弟戴维留在莫比尔，寄养在姨父母家。姨父母有一子一女，与我们大致同年。姨父母非常和蔼，对我们关怀备至，待我们犹如他们自己的亲骨肉一样，可是，规矩却不小。他们把苏格兰长老会那一套严厉的教规承袭了下来，并用之于我们，尤其是他们认为，传教士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严格的管教。尽管他们自己未能去中国，他们却模仿国外教会，在莫比尔市一处远离其他教会的地方为我们建造了一所家庭教堂。为了使们不致有愧于“正在一个异教国度里作出牺牲的圣洁父母”，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上那个教堂。尽管每次上教堂都从城里穿过，却不准坐有轨电车或乘坐别的什么车子。上午我

们只能走着去上主日学校和做礼拜；晚上，还要做一次祷告。整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用来背诵圣经和唱圣歌。令人甚为伤心的是，由于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便禁止我们跳舞或上剧院看戏，而表兄妹却多半能享受到这些人世间的欢乐。我们还有两位姨母，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另一位住在遥远的乡下；她们与那位严格管教我们的姨母不同，她们怜悯我们这些孩子。

我们只享有这么一大权利：每年夏天到莫比尔湾彼岸的姨母家去避暑。姨父在国内战争年代曾是一位海军上尉。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就在莫比尔湾里钓鱼、捉蟹、游泳或驾驶帆船。如今，我仍可清楚地记得一件与一位黑人小伙伴有关的事。他是厨师的儿子，跟我们同年。他不会划船，我们为此经常取笑他。有一天，他说：“我会把船划回去”。当时，表兄和我已跳入水中，准备在四周游一会后再回到船上去。想不到那位黑人小孩以为我们这么做是在故意捉弄他，从而刺伤了他的种族自尊心，他就把船朝岸边划去。我们呼喊着他把船停下来，可是他以为我们仍是在捉弄他。于是，他便一个劲地划他的船，最后把船划回了家。我们着慌了。我们越往回游，就越感到精疲力竭。约莫一英里长的水面成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我仿佛看见：我们的遗体在水中漂流，人们悲伤地为我们出丧，在家族墓地为我们修筑墓穴，报纸对我们的不幸作了描述，路上要走一个多月的写给我父母的信，以及可怜的双亲的悲哀与眼泪。然而，我们总算游到了岸边，要不，我今天也就不可能动笔来写这些事了。在我童年时代，还有一位叫人敬爱而又厉害的黑人

保姆，我们得叫她“乔治亚阿姨”，要不，就得挨她揍。不过那时，当地存在着的种族之间严格的社会界限，在我们看来还是理所当然的事。

自那时起，我便懂得了国外传教士所要实现的理想，以及要在亚拉巴马把我们抚养成人的艰巨责任。我们的保护人对我们十分疼爱。他们活得年岁很高，晚年充分享受了后辈对他们应予以报答的一切情意，并完全消除了子女们幼儿时对他们的一切怨言。我的两位表兄妹自幼就一直与我们保持着亲兄妹一般的真挚情意。然而，我在莫比尔同许多同伴——包括我的一大群表兄妹——正常愉快的生活，却反而使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烦。不过，我自小受到的这种训练（连我们这些幼小的牺牲者也能明白其纯正的动机），以及生活处处是温暖，夏天还能在海边进行有益健康的体育活动等等，总算使我克服了本来会对整个宗教产生极度厌恶的心理。

（六）

1892年9月，我年满十六岁，被送进了当时南方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那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所附属中学，座落在一块高地上，原是托马斯·杰弗逊的地产，主人取名为“全景台”。可以从各个方向一览蒙蒂塞洛和拉皮丹河一带的美丽景色。

在莫比尔时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把上学当作一件不得不加以忍受的灾祸，从不在学习上卖力气。在四、五十人的班里，我的成绩一般是排在头十名的后几名中，从未榜列过首

位。当时，男生私立学校被认为是供富家子弟和那些被开除出公立学校的学生上学的地方。学校教学平淡无味，总是千篇一律，我回到家里也很少做作业。当时由于自己年岁小，不懂大孩子们的游戏，同时又因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或兴趣，所以我常常把空闲时间用来看沃尔特·斯科特、布尔沃·利顿、查尔斯·狄更斯以及其他一些名作家的小说，而不是和别的孩子一起玩。

转学到潘托普斯学校，其效果是很显著的。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学校里其他五十个孩子都是从南部各地来的，唯独我来自亚拉巴马。我那来自中国的可怕印记已全然消失，后来当同学们逐渐知道情况时，他们只是出于关心偶然提起这段往事。当然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当地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景色；学校招生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经过严格的挑选；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水平高，而且每个老师都对学生很关心。校长桑普森是一位极能干极称职的人才。其妻（她的三个兄弟：亨利·伍兹牧师、埃德加·伍兹博士和詹姆斯·伍兹，都在中国做传教士）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我成年后，这种影响还久久地存在着。他们夫妇俩对我特别疼爱；后来，我的两个兄弟随我之后也去了那里，他们又同样地疼爱他们。夏天，当我们需要一个家时，他们那里就成了我们的家。

我进入潘托普斯学校后发现自己很喜爱学习，并能把功课学好。这部分地要归因于那里的气候好，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由于有两位刚从汉普顿-悉尼学院毕业出来的、十分令人敬佩的老师。还有一位老师名叫乔治·丹尼（他后来当

了华盛顿-李氏大学校长，再后是亚拉巴马大学校长），在他的影响下，拉丁文和希腊语成了两门吸引我的课程。另一位对我很有影响的老师是教英国文学的詹姆斯·贝尔先生。那一年，我轻易地就取得了第一名，获得了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潘托普斯学校有着相当严格的宗教校规，不过，由于我在莫比尔呆了五年，就不感到它的严格了，好象对一切自然地就适应。健康的生活、校长的人格、从传教士家庭出身这一不体面的名声中摆脱出来所产生的喜悦心情、与同学们所建立的种种愉快的友谊以及学校当局在严格执行宗教校规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合起来使我的宗教习惯稳定了下来。也许，我对宗教的态度是相当消极的，不过我在精神上并不感到有压力。那是个非常愉快的一年。

二、大学与神学院时代

1893年秋，经我喜欢的老师丹尼先生的介绍，我从潘托普斯学校转到汉普顿-悉尼学院插班读二年级。我还加入了由他组织的学生联谊会 and 文学社。这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轻人一心所希求的。

汉普顿-悉尼学院创建于大陆国会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是以约翰·汉普顿和阿尔杰安·悉尼这两位开明的英国爱国主义者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创办人中有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在该校校友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议员，八位州长，二十位大学校长和院长。现在，汉普顿-悉尼学院的学生人数已接近四百，而它早年的招生人数还不到一百五十人。可是，如果对列入1931年《名人录》的大学毕业生作一番考察，就会发现：汉普顿-悉尼学院列入名人录的大学毕业生占百分之七点四，居首位。阿默斯特学院第二，占百分之六点六。此事引起了报界的广泛评论。诺克斯维尔《日报》发表评论说：“汉普顿-悉尼学院比绝大多数学院的历史更悠久，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它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校风，在南部教育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对我来讲，黄金般的大学生活，主要表现在个人之间的友谊（尤其在联谊会会员之间）、学校高尚的传统及其欢乐

的气氛上。但在当时,汉普顿-悉尼学院已处于衰落阶段,学生人数在下降。学校的校址因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广种烟叶致使土地贫脊的地区,那些较有魄力和较富有的家庭都搬迁到北部或西部定居去了。在我进校的那一年,一位教英国文学,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才华横溢的教授离开了,接替他的是一位极端愚钝的人物。教师中最杰出的是一位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但我对自然科学只是老师教一点我才学一点,能敷衍及格就算了事。整个讲来,临到毕业时,我对自己在汉普顿-悉尼学院的生活并不感到后悔,尽管学校为我的学习提供了奖学金,再学一年我就能取得硕士学位,我却并不想在那里再多呆一年了。

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特林克尔和我两人的学习成绩,在同年级的学生中似乎是逐年轮着为第一名。汉普顿-悉尼学院时期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我们两人之间所结下的友谊。特林克尔和我同年,都是联谊会会员,又同住一个房间。由于我们两人谁也没有参加任何体育活动组织,所以下午我们常一块散步。我们甚至一块去拜访我们的女朋友,但从未因之争风吃醋。我们在弗吉尼亚西南部韦塞尔城他的家里汇合,一块去上学,而后在暑假分手之前又回到那里。我一般是在他家过圣诞节。毕业后,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法律学,我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两人仍继续保持着友谊。后来,他当了谢南多亚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和州教育局局长。1921年,他以历来州长选举中最多的票数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任期四年。他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地区第二长老会中是一位热情的有着多年资历的老会员。直到1939年他

去世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我每次回美国，最乐意做的一件事便是去拜访他。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时期，我们班高材生是比较多的，在同年级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在毕业那一年，毕业生中第一名由另一个班上的一位同学夺得，特林克尔和我的成绩紧随其后，居第二。毕业典礼时由他作了告别演说。在接受学位那一天，为了让我们两人都能登台演讲，学校特意恢复了用希腊语作演讲这一早已废弃的传统做法，并指定我做演讲人。亲切、和蔼、博学的布罗克教授帮助我撰写了演讲词，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在那些汗流浹背的听众中竟不见有一个对讲词表示不满的人。当时，正值我年满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接受了学士和文学士学位证书。

在我念书的那些日子里，汉普顿-悉尼学院里的生活是很独特的。协和神学院（不久后迁到了里士满）就设在它的附近，它几乎成了汉普顿-悉尼学院的一所附属中学。大学生中准备当牧师的人数很多，整个气氛表现得热烈又虔诚。在我看来，这似乎又向我提出了宗教信仰的问题。我们这些学生对大多数准备当牧师的学生的学识和社会出身并不感到羡慕，对他们的品行也未必推崇。圣经课是必修的，但极端枯燥乏味；做礼拜和安息日祷告仪式也勾不起人的兴味。可是人们却并不因此感到厌烦或不满。

人们开展宗教活动是自发的，基督教青年会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弗吉尼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教派组织中开展了工作，对它们进行了有力而富有生气的领导。在我三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在青年会中多少算得上是

一名积极的成员，而且，在我进入高年级后的那一年，还担任了会长。政府当局把基督教青年会看作是一个从北方传来的新兴团体，因而对它采取了不赞成的态度，或许正由于这一点，反而扩大了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在大学生中招募传教士，并使人们对开展世界性的基督教运动发生兴趣，使得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组织的影响犹如涨潮一样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当这一组织的干事们来到汉普顿-悉尼学院参观时，我显然就成了他们发展的对象。鉴于我父母正从事着传教事业，我个人身体健康，又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障碍影响我报名参加海外布道运动，他们就选中了我。

后来，那些干事——来会理、弗莱彻·布罗克、哈尔·卢斯——都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当时，我从他们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宗教方面所面临的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即缺乏当传教士的热情。我在童年时代从父亲当传教士的经历中所获得的印象，我幼小的心灵为此而感到的苦恼，我在弗吉尼亚的生活，以及从事教书这一职业对我产生的越来越大的魅力，这一切使我对海外布道事业极为反感。而另一方面，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又提出一些近乎公理式的口号，要虔诚的基督教青年男女教徒说明，他们为什么不愿到海外去当传教士。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十分烦恼。我可以顶住要我签署当传教士保证书的压力，但我却无法回避不时萦绕在我心头的忧愁。我得对我个人的终身事业作出选择：要么教古希腊罗马文学，要么就当牧师。我希望这两种选择都能使自己留在弗吉尼亚不走。我之所以不愿意从事牧师这一职业，那是因为一旦做了牧师就免不了要去中国。我向往去弗吉尼亚州立

大学读书（我的几个兄弟在那里读书），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去德国进修。不过，我并不真的打算以攻读古典文学或以神学研究来建立我个人的事业。我作这种选择无疑主要是传教士问题使我感到烦恼。

由于我在毕业进修问题上犹豫不决，也就产生了一些怪诞的念头。我若是能预见到自己后来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那我肯定会到某个在中国也享有名气的大学去读书，至少要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再去。但反过来讲，我要是这么做了，我今天就很可能不会信奉基督教，不可能以牧师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去中国了。我始终认为，凡是按照我的意愿去行事，我是从不后悔的。

（二）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敬仰的老师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李氏大学的教职。随后，我即被邀请到潘托普斯学校去接替他的职务，教拉丁文和希腊语。我自然以一种求之不得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工作。我在那里连续教了三年书，三年的教书生活给了我莫大的快慰，弗吉尼亚也就随之对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魅力。在潘托普斯学校，我离我的两个兄弟很近，同时，由于我在那个大学里还有其他许多熟人，以至自那以后我一直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大学一样。我在潘托普斯学校生活头一年下来，就想呆过第二年，而后又想呆第三年，主要是为了拖时间，延缓我所要作出的困难决定。在学校的第二年，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波洛克·吉尔摩成了我的同事，那一学期他作了当牧师的决定，并于第二年开始学神学。我

们就神学问题经常在一起展开讨论。他的决定无疑也影响了我。过了一年，我进入协和神学院，我们又同住一个房间，直到他毕业为止。

我在潘托普斯学校里被人称为“孩子气的老头”，从而使我在感情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有助于我去了解学校生活中一些独特的方面。当时，我还很年轻，比一些学生大不了多少。诚然年轻有它不利的一面，但好处是，它使我与学生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感情。课余，我与他们打成一片，有时我就当他们运动队的领队，一块到别的学校去参加比赛。在课堂中，我想起了过去丹尼先生给予我的使我潜移默化的教导，我也尽力把课堂教学搞得生动活泼。具体地说，就是“你是教拉丁文呢？还是教人？”这么一个老问题。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教人，因而，即便是教基础课也不会使人感到枯燥无味。比如我撇开传统的《凯撒评注》（一位军事指挥员的战争札记，这当然不是那些对之容易感到厌倦的外国学生们要读的东西）不讲，只是讲授尼波斯专为罗马孩子们撰写的短篇名人传记，传记中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轶事，同时在拉丁语语法方面又能给学生提供充分的练习。

我与学生之间这种近乎天生的关系，后来从我在同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学生之间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中也表现了出来。把燕京大学的学生与南京神学院的学生相比较，后者显得纯朴，这就象他们有别于美国学生一样。

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夏天参加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主持召开的会议。我感到，人们在会上对宗教信念所作的一些带有

根本性的，实际而动人的阐述，给我以莫大的推动；同时，那些为促成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都同样给了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信念和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的、枯燥无味的信念和做法是绝然不同的。耶稣成了青年们热爱和崇拜的主，成了他们的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一种神学的体现者了（对这种神秘而又至高无上的教义抱有任何的怀疑，那是大逆不道的）。如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许应对罗伯特·斯皮尔表示最大的感激。正是由于他，我才对耶稣有了新的和深切的领悟。这就是在当时和今天构成我的宗教信仰的最本质的东西，尽管在中间的那些年月里，我经历了种种遭遇，神学观点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我的宗教信仰没有动摇，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在这方面的信念更没有任何的减退。

（三）

1899年秋，我进了协和神学院。那时，学校已从汉普顿—悉尼城迁到里士满市郊外一处令人愉快的地方。校长沃尔特·穆尔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办校人。崭新的环境和新栽的花草树木，使学校里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我在这里又呆了三个愉快的年头，这使我对神学院和里士满都产生了感情而久久不能忘怀。

当时除了要做传教士这一问题外，我还存在着一个对神学需要逐步培养信念的问题，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与那种进步的，表现无畏而又不带偏见的经学有关的态度问题。虽

然我在宗教方面的兴趣一直表现为好讲实际，然而通过对北部地区的访问，通过看书学习和内心激情的驱使，我越来越感到，南长老会的正统观念与当前人们倾向于自由探讨的主张是不相容的，而我是赞成自由讨论这一主张的。

另一方面，神学院的教授们，尤其是院长，无一例外都是一些为人真挚，信仰虔诚，富有才学，和具有普遍同情心的人。他们之所以受到聘请，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的牧师，他们的兴趣所在是培养有用的传道士，而不是神学上的论战。在他们身上我逐渐看到，忠于过去，忠于传统，成了他们做人的第一美德，这是南方人普遍具有的。他们不仅在宗教方面是如此，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决心学习他们做人的品格，从他们的教导中获得教益，同时自己对事物又不失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我备课一般不占多少时间，因此我便尽量腾出晚上的时间，从办得出色的图书馆里借书来看，主要选读一些关于宗教、科学之类问题的新书，从而帮助自己把那些在说法上和论证方面叫人无法信服或者相互抵触，然而基本上似乎又是真理性的东西与宗教教学在形式上协调起来。这样，个人内心的紧张心情与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缩小到了最低限度。之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我向来认为，就信仰与宗旨问题而言，我和南长老会的同事们一样，都是极为重视的，同时也是相一致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必要去同父辈那一派教会断绝关系，而且在彼此间，双方都怀有真挚的情义，又互相信赖。

在神学院的头一学期，莱西·莫菲特，因办理教务方面的事从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出差来到这里。顿时，我们

相互间都被对方吸引住了，部分地由于这一缘故，他便于次年转学到了里士满。那时，他已作出了当传教士的决定。在波洛克·吉尔摩毕业之后，他就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们之间亲密的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们两人又同一对姐妹联姻成亲，加之我们同去中国之前和到了中国以后，两人终身来往不断，我们的友情也就更加增强了，至今仍继续保持着。

进入第二个学期后，我当传教士的问题就到了作抉择的关头。象往常一样，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干事长巡视来访，这一次是那位在印度当传教士归国休假的阿瑟·尤因牧师。事属凑巧，我是学校青年会的会长，因而由我负责招待和为他安排接见事宜。在他发表讲话时，也由我充当他的大会主持人。在他快要离开时，他问我：“司徒，你个人是怎么考虑的？”我对他说，我知道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了。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别的任何人都帮不了我的忙。同时，我还对他说，我完全意识到了他所要我考虑的问题。他很老练，也很通情达理，满怀深情地跟我握了一下手，就丢开了原来的话题。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要回避也是不可能的了。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直至翌日凌晨五点才慢慢入睡。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厌恶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里并非是我所设想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

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由于我是传教士家庭出身，背景特殊，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影响到我，使我自童年时代起就经历了种种的烦恼，因而我就更加不愿去中国过那种不正常的脱离人世的隐居生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弗吉尼亚有着令人愉快的生活，南部各州的生活情况也是这样。当然，我之所以产生上面那样一种想法，那是个人的变态心理和情绪不正常所致。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后来在中国的生活情景，我又该怎么想呢？如今推想此事，是饶有趣味的。

幸而我父母从未向我提出过要我当传教士的问题，他们也从未劝说过我。我当然知道，令我父母感到喜悦的，莫过于让他们的孩子们追随他们的业迹。我的大弟戴维当时是一名医科学生。他曾十分肯定地表示，决不屈从于我父母的这一意志，然而他最终还是做了传教士。1909年，他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身亡，生前曾在苏州博习医院以传教士身份做了两年外科医生。我的小弟沃伦（他在中国一直呆到十五岁）没有经受我和我大弟戴维小时候所遇到的那些烦恼和由此所带来的种种紧张心理。他好像是命中注定了要干传教士这一职业似的。他先后在一所中国大学和神学院里教了十几年的书，一直教到1927年大革命那一年。

回过头去再说一下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夜晚。我天生来就不喜欢做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地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耶稣信徒，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他就应到国外做一个传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应召”。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是不是我在美国得到了

上帝的信息，在摒弃物质因素的情况下，为了基督和精神的无上价值而宁愿作出牺牲呢？基督教义真正成了我一生中所追求的最基本的和最大的目标了吗？如果情形并非如此，我能否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从事基督工作，甚至就把自己称作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呢？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来回思考这样一些老问题。

考虑结果，我决定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作一番最后的考验，我将作出当传教士的决定，并要满意地向自己表明：信仰基督教对我是一件有着无上意义的事。如果上帝已为我在国内的工作作了安排，或者知道我不能满足要我去中国生活的要求，那么我就必须信赖他，让他给我引路……我在疲乏中进入了睡乡。起床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波洛克·吉尔摩（他和我同住一室）和莱西·莫菲特。他们对我的话都不感到意外。我个人则觉得心满意足，轻松愉快，对生活也有了热情，在心情上也不再自暴自弃了。我对自己作这样的决定是决不会后悔的，因为它使我确实相信宗教这一实体的存在，确信自己睿智卓见，做事能把握时机。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事业的，从而使我对基督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并从中得到了更多的生活乐趣，而本来这一切是不可能获得的。

（四）

由于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开展了有效的工作，青年人情绪热烈，纷纷报名要求参加海外布道工作，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各个教会的接收能力。这又反过来要求人们给予教会

更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北长老会和北公理会中，人们“全体出动”，为地方教会筹集了足够的经费，促使教会去支持每一个传教士，于是发起了一个“奋进运动”。这一形势也影响到了南长老会，它在国外布道团的经费已有好几年没有增加，在人员上仍保持其原班人马，几乎没有增添新的志愿人员。莫菲特、普雷斯顿和我于同一年在普林斯顿学院毕业。我们三人异想天开，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采用北部“奋进运动”最成功的发起人威沙特的整个宣传方法，在他的指导下，在我们的教会内也照样发起了一个“奋进运动”。

教会当局对我们的主张表示赞许，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情况，并暗中给予帮助，只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牵涉进来，避免承担任何公开的责任。有几个商人为我们提供了活动经费，数量少得可怜。我们都无薪俸。为节省经费，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住一下旅馆。我们四处活动时携带着地图和入会申请书，在各处建立地方分部做接收申请书的工作。开始，我们只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工作，每人在自己有根底的地方着手。普雷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开展工作，莫菲特和我在弗吉尼亚河谷。对我的第一次考验，发生在我从华盛顿特区神学院毕业以后的头一个礼拜天。当时，我跟中央长老会牧师年老的教长皮策商量，请他同意让我对他的教民试作一次讲道。他听了我的计划后，从卧榻上坐了起来，拍着膝盖说：“那没有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教会不试着这么做呢？”我说，“莫非这是一种过激的想法？”他却说：“没有问题，小伙子，放手干吧。但愿你在这里能多筹集一些经费，上帝保佑你。”我就在这个教会里作了讲道。当全

体教徒前来选派他们的“出国牧师”时，他们议论说，既然他们已让我作了讲道试验，他们就有权挑选我。这么一来，我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美好的关系，并使之保持了许多年。伍德罗·威尔逊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是中央长老会的一位会员。有一次，我从中国回到国内休假讲道，很荣幸，他也在场。

由于考虑得周全，做法新奇，我们的“奋进运动”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吸引了不少男女青年。他们都热切地要求投身于传教事业，但又苦于没有钱，去不了。这主要是人们对传教需要系统地建立起一套组织普遍缺乏认识所致。在世俗的人看来，国外传教是一种商业活动，而在其他一些人看来，这又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情。我与教会的关系，并非出于某种含糊不清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体现为到什么国家和由谁去传教的问题。“奋进运动”几乎是自然而然获得了成功。总部源源不断地收到了捐款，据我的记忆，第二年的春天，教会最高当局总务委员会一致通过有关安排，要我们三人当干事，不但给予工资、经费，还授予正式职称。要是我们三人中能有一人在夏天到指定的工作地点去，那就再好不过地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我们选定了普雷斯顿。他作了几次旅行，旅行中附带的一个收获是，他与一人订婚并结了婚。我们参加了他的婚礼，婚后新娘就跟着他赴朝鲜去了。当时，莫菲特和我要留下再呆一年。我们认为，到那时就可建立一个臻于完善的永久性机构了。我们的职务期限是不定期的，不过我们坚信，在经费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讲信义，跟那些志愿者一道去当传教士，那就会使整个传教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原来的目的，并满意

地看到，我们那个极端保守的教会正式批准了我们的做法，并指定了一个常任干事来帮助开展工作。

回顾那一段经历，从宗教上来讲，对我个人的价值在于：它为我所追求的新目标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我并非是出于想像中的自我牺牲，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才去追求这一新目标的。犹如在大学时代一样，我从神学院毕业时，学校要我写毕业论文，并特地为我提供了奖学金，但由于某种原因，我谢绝了它。一方面我错误地认为学位对传教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同一学校多呆一年是没有多大益处的。也许我在这后一点上是对的。不过，我实际上是想积极地去从事一项像我们小小的“奋进运动”那样带有冒险性而同时又是有益的活动。通过不断宣传传教事业和对一些不同意见进行反驳，我体会到了这一运动的意义，并对之产生了热情。在我最后走上传教道路时，这一运动给了我莫大的好处。我如此全神贯注于人们职务的晋升和行政管理事务，以致把个人学习和神学方面的问题都给默默地撇在一边了。我曾有机会走遍了南方各州，原来对弗吉尼亚所抱有的那种强烈感情也随之加深了。当时，我把我的宗教工作集中在一点上，即同那些不断与我交往的牧师和教会领袖们搞好关系，尽管我们在教义上存有分歧。在和地方教会许多成员相处的关系中，我同样与他们建立了愉快的友谊。我在内心深处感到，在基督教基本教义问题上，自己与本派教会变得更加和谐一致了，和其它大部分教会也取得了一致。

(五)

莫菲特和我在神学院毕业后都被长老会评议会授予圣职。经过两年“奋进运动”的生活体验后，我们准备一道去中国做传教士。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单身去呢？我们决定如要结婚就两个人一起结婚。在新奥尔良访问时，莫菲特和我遇见了几个表姐妹，她们是我的远房亲戚罗德夫妇的女儿。我们逐渐感到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念头：“是这个姑娘吗？我们事先有约怎么办呢？”1904年7月，我们到查塔努加的洛克奥尔特山参加一次会议，当时我建议：把我们两人抱有好感的表姐妹也邀请上。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在她们来后，我们两人都各自看中了一个。我们决定两人同时向她们求婚，两人的要求都被接受了。于是，两人在同年11月17日同时在新奥尔良举行了婚礼。我的新娘是艾琳；莫菲特的新娘是凯特。她们的三妹弗洛伦斯后来到中国做了传教士，第四个妹妹到了非洲。原先，艾琳并未想到要做传教士，只是后来在其他三个姐妹帮助下她才下了决心。

直到艾琳于1926年在北京去世，我和她一道生活了二十二年，一直过着一种传奇般的生活。

三、回到中国

1904年底我父母专程去上海接我们，并于新年除夕同我们一起回到杭州。莫菲特一家派去苏州，我们双方都大为失望。

我看到父亲一生碌碌无为，仅吸收了寥寥几个地位低下的教徒，这时，我原有的厌恶之感又油然而生。其中也带有我投身“奋进运动”期间，对海外布道团的多少有点天花乱坠的鼓吹的反感。幸亏我的当务之急是学好汉语。我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我感到汉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在过去的十八年间，我幼年时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几乎全忘光了。不过，我不仅在学习成语方面，而且在听力、发音上无疑都有着有利条件。当时尚无通晓汉语的长者出来开办语言学校或语言学习班。

教我的“老师”是一位年轻人，可是他不会教书。过去他从未与外国人接触过，连我们的茶也不敢喝一口，他曾听说我们往茶里放一些药片，会把喝茶的人变成基督教徒（此人后来却成了虔诚的信教人）。不过，我们很快就学会了相互进行合作。一旦他了解到问题所在，便尽力给我帮助，使我收获极大。在他的帮助下，我掌握了许多谚语和当地的日常习语。那时我如果要在杭州继续住下去，就一定会成为一个

能讲一口流利杭州话的西方人。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江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象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许多杭州人，包括那些跟第一批传教士一道来到杭州的人，都是宁波人。由于这一关系，加之我被派到杭州和湖州之间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广大农村教区去传教，我对上述各地区以及上海、苏州一带的各种吴语都相当熟悉。那些乡土话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又各有其特点，尤其是人称代词。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

出生在中国还有一个奇妙的好处，那就是：在中国的传道士、教师和其他雇员们看来，我懂得他们的语言，能了解他们的观点。于是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是那些在布道团里工作的年长的传教士们所不曾有过的。由于我父亲的关系，他们还把我看作小兄弟或求教人一样看待。我很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优越条件使我能够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心里所盘算的事、他们的烦恼和对教会政策的误解。由于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丝毫不能归功于我，我总是力求得到中国同事们的信赖，从而得益不浅。以上这一情况也就帮助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外国人，何以对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与语言，有那么一种特殊的直觉和领会能力。

经过一年左右的汉语学习之后，我便开始在杭州北面广大的农村地区从事传教活动。我父母过去曾在这里住过多年。一条当地的住家木船既是在纵横交错的河道上行动的工具，也是抵达城镇时的栖身之处。在我父母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去管理当时许多很快发展起来的教堂，学会如何主持福音传教聚会，以及如何到人们家里去结识他们。对农村的走访以及在同城镇居民进行类似的接触中，我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为我后来负责兴办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还开始对传教的做法作研究。接受洗礼主要是履行一种简化了的信教形式，也就是星期天去教堂作礼拜，严格遵守那天的教规而已，它并不涉及福音伦理中所包含的有其社会意义的一面。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其敬祖的习惯，否则就会使他们感到为难。做礼拜主要是讲道，没有壮观的宗教仪式，也没有艺术装饰之类热闹好看的场面，而这一切正是中国人天生喜爱的。总的做法是朝着肃穆、压抑和拘泥于形式的宗教概念发展。那是接受父辈教规的必然结果。后来，大多数的布道团都在这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变。

当时一个更为严重而又糟糕的情况是，传教士滥用其所谓的幕后支持者政府的世俗权力。罗马天主教通过它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契约，为其僧侣等级制度获得了正式地位，并使其教徒在政治和法律上受到保护。入教就等于在政治、经济上有了保障。这样讲并非是要责难天主教僧侣们的传教动机，更不是要对他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提出批评。对他们的这种精神我是极为钦佩的。但是在中国，教会滥用世俗权力

所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入教并非出自真心，同时，由于中国官吏害怕触犯列强国家而常常不公平执法。过去列强为了得到更多的领土和通商便利，不知捏造了多少借口！新教布道团里的中国工作人员常受亲戚和友邻之托为他们办些为难之事，那些人也乐意从中斡旋捞点外快，以添补其微薄的工资。对于这样一些情况，传教士们却误以为是当地人觉醒的表现，希望从罪孽中得到拯救，可是后来他们才发现背后有不良的动机，而且那些得到他们信赖的当地传道士常常是参与其事的。传教士们，特别是那些满脑子生意经、强调实际买卖的美国人，自然倾向于追求入教人数、新近组织的圣会次数以及从组织宣传工作中直接取得的类似成果。作这方面的统计并不难，也便于有关资助团体作了解。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察颜观色，总是想方设法讨好你。那些帮助你的中国人就是以此为生的。双方都说不上是在有意弄虚作假，因为一般讲来，传教士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在人为地追求教会的实际利益，还以为是在揭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可是这么一来，在各个小小的基督教团体内外造成了误解却是很不幸的。

在写了我早年的这些印象之后，我还想借此机会来说明一下我当时已开始形成，并为以后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所进一步证实的结论：传教士们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目的高尚，坚韧不拔，为人真挚，对宗教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这是我在后来态度变得更为超脱、旧有的偏见已得到纠正之后才这么写的。传教士们总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比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出许多。我不久就意识到，能同这样的一些优

秀人物共事是值得骄傲的。我不但开始对一般的教会政策、行政事务以及正在逐渐取得进展的联合计划发生兴趣，而且对分配给我的各项琐碎工作也真正发生了兴趣。我不只一次地胡思乱想，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能作为一个典型的“福音传教士”，愉快而又成功地度过我的一生呢？

我对大多数具有很高水平的传教士们所作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许多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当中确实有人曾出于不应有的动机去追求教会的发展人数。但是，成千上万的殉道者和更多的人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以及在社会和家庭的敌视下所表现出来的坚贞的信仰，却使我们深为敬佩。在今天的基督教运动中，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就是出自十九世纪基督教徒的家庭。

(二)

我返回中国后不久就开始的一项联合事业：南方长老会布道团和北方长老会布道团（或美利坚长老会布道团和美国长老会布道团）在南京合力兴办一所神学院。经过内战后四十年漫长的岁月，太平洋彼岸这两个同出一宗，至今仍然分离的两个教派最终携手合作，这说明了教会联合之艰难，同时也表明，只要我们有耐心、讲策略、能更深入地了解宗教的本质，那么，教会的联合仍然是可以取得进展的。这是增进人类友善的最难能可贵的行动，尽管看起来不是这样，但实际上确实如此。

在神学院向我发出邀请时，院方成员中已有上述两大教派各自推举出来的一名资历很深的传教士和一名年轻的中国

人。我推辞再三，让我所属的布道团去作决定，结果除一人外，全体投票赞成我接受这一邀请。这个例外的人就是弗兰克·普赖斯牧师，他反对把年轻的传教士从福音传教士工作中调去搞教育工作。事隔数年之后，我高兴地欢迎他来到同一所学院。他在这所神学院里工作至1941年退休，一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和一位受人爱戴的牧师。我搬到南京后不久，搞联合计划的行动就扩大到了（美国）北方卫理会，后来还有（美国）南方卫理会和基督弟子会。如果不是为了保持教派的统一而让（美国）南方浸礼会教友——他们在神学上甚至比南方长老会教会表现得更为保守，脱离他们自己设在上海的协和大学和神学院的话，那么，我们本来还可以把（美国）北方浸礼会吸收进来。

大家同意由我主持《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研究那些过去我一直没研究过的书籍了。长老会的信条是强调《圣经》的最高权威，而奇怪的是，我在神学院时，课程表上只安排了少量的圣经课程，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和教会史却备受重视，那也许是以为学生们对圣经已经很熟悉的缘故吧。不管怎样，我很快就发现我的知识贫乏得可怜，而这门课程却是那么迷人。我收集了凡是能弄到手的对研究这门课程最有帮助的一切材料，并且几乎象一个探险者一样怀着强烈的兴趣极力去熟悉《新约》经文、历史和哲理等有关的文献资料。教学中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采取何种教学法才能在学生中激起同样强烈的求知欲，同时又不超出他们的理解力，不扰乱他们的原来信仰。当时那所神学院里还没有大学毕业生，即便高年级学生，其知识水平也多

半只是相当于现代的高中，而低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只是相当于中国私塾的一般水平。孟子（原文如此，本应为孔子——译者注）的因材施教倒是一个好主张，因此，我根据学生水平，按现代需要去组织教学，做到粗浅而又实用。

在金陵神学院，我的时间是排得非常紧的。一般每天要上四个小时的课，除了要和同事们分担一些杂事外，我要作一些必要的备课，还要经常不断地学习汉语。迁到南京就得学南京话。那是一种变了调的南方普通话，也是整个中国最难听的一种方言。它接近吴语，又带有卷舌的北方语音，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在教学上虽然全用汉语，但生活上却与普通百姓的接触少多了。我还讲道，有时候也公开演讲，还有社交往来，我在这些场合基本上总是讲汉语。

后来，我试着写些文学作品，为长老会的一个周刊写些向上帝献忠心表示虔诚的文章（该周刊在其教派内外有广大读者）。我也曾为哈斯丁的《圣经字典》撰写过文章（这本字典正在译成中文，有的地方作了改写，有的地方加了评注）。我还用英文为《国际宣教评论》、《教务杂志》（每月出版一次的记载传教活动的刊物，由各教派联合创办），以及其它期刊写专论。我们的住地靠近南京大学，所以常去那里讲道、教圣经课，并常与一些宗教研究小组的成员见面。我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中国的传道者，尤其是那些不懂英语者（懂英语已成为现代教育的象征），如果能阅读希腊原文《新约圣经》，那是大有裨益的，将使他们更好地体会到译成中文的难处（再没有比这两种语言差异更大的了），使他们感到阅读原文的亲切和它的真实性。麦考利（英国小说家——译者注）曾

讲过一句在文化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名言：一个人只有懂得至少另一种语言时，他才能真正懂得他自己的语言。那些掌握了英语的人就有了“面子”或声望，表示他们在语言上有专门的造诣。所以我先后出版了《新约希腊语 初级读本》和《希—英—汉字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许多古希腊语在《新约》中都给淘汰不用了。在我编写字典时，正好埃及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了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新约》完全是用当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希腊语写的。这说明《新约》虽然偏离了古希腊语，但并不损及作者学问之高深，也不碍于将它译成较为流畅的中文，反而使字义更丰富、更有生命力，给许多词语增添了清新的色彩。

进入神学院不多久，我便对基督教牧师中缺乏大学毕业生一事深为关切。我研究其原因，并试图寻求补救办法。经过数年的物色之后，终于喜出望外地迎来了第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生，金陵大学的李天铎。十五年后他当选为这个学院头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院长。在这之前，为选拔牧师，一个以美国学生海外布道运动为楷模的中国学生立志布道运动已经组织起来了。我是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山东的一位福音传教士（丁立美牧师）担任干事。他奔走于全国各地，在地方上组织学生团体。学生立志布道运动也就随之扩大，发展成为献身基督教事业的运动，后来因该运动失去其原来的宗旨而衰微了。不过，它曾一度吸引了不少值得选录为牧师的人，并提醒人们注意教会领导问题的重要性。

(三)

在杭州的三年半,以及随后在南京的十一年期间,我还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在来会理和弗莱彻·布罗克曼等人卓有见地的领导下,基督教青年会不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能及时满足年轻知识分子渴求学习西方知识和进步思想的欲望,为我的传教活动打开了路子,且它又不同于当时盛行的福音派的传道方法(包括培训中国工作人员)。基督教青年会能招聘到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留学生。他们完全被当作同事看待,并在政策事务和财务方面和一些外国传教干事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作为听命于国外教友会的雇员。我们强调,并且公开讨论,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问题上。在开办圣经学习班和举行宗教聚会的同时,基督教青年会还提倡体育活动,召开科学报告会和开展社交活动。我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在僻静优美的山林之处举行的夏令讨论会。这样,我观察事物的方法也就进一步受到了影响。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会上,我和吴德施主教初次相见。有好几次我们俩是会上仅有的来自西方的“外人”。我们的关系也就随之更为亲切起来,从而为我的传教生涯带来了最愉快的友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便服,因此,后来初次见到他衣冠楚楚,一身主教袍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初到南京的数年间,我认识了正在协和医学院任教的伦道夫·希尔兹。该学院后来迁到了济南,改称齐鲁医学院。

我们从初交发展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是我一生中结下的第三次最深厚的友情。后来，我们同住一栋楼房，我们的妻子彼此亲如姐妹。他的女儿同我的儿子的生日只隔一天，他们一起玩、一起学习。后来伦道夫成了中国医学教育界的一位杰出的学者。

(四)

在神学院教学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去考虑那泛称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正统还是现代派的争论。在我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和公务来往中，我所接触到的问题按其性质来讲是前一方面的，而由于我对现代主义抱有同情心，生来就有着明敏好学的精神，这就使我对后一方面的见解持支持的态度。我在弗吉尼亚当学生的那些日子里，和我在离开美国去中国之前为海外布道团的事业四处奔走的那一段期间，由于我对老一辈教友的信仰和品行抱有本能的尊重，由于我对他们怀有真诚的情谊和谅解之心，那种原先出现在不同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大为缓和了。我总是竭力把虔诚的宗教信仰与人们对事物所发表的见解和学术研究区别开来，因为人们在这方面多半是受传统思想、个人天资与阅历和地区环境影响的，也许这是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所不甚充分认识到的。在那些把本来可以协同工作的人分成敌对派别的争论中，尽管人们情绪激奋，往往把那些造成分裂的争论与宗教教义混为一谈，但在我看来，那些争论多半是由后一方面的问题引起的。

虽然金陵神学院接受了新教学说的保守教义，但是它却

从未完全摆脱那些更顽固地坚持其“完美的”或保守神学见解的人的批评和怀疑。这一情况在南长老会的所谓苏北教会中表现最为明显。我们当时有两个教会，一个设在长江以北，一个是在长江以南。我属于华中布道会，教会成员基本上都有着相同的神学见解，不爱好争论，也不是那么容不得人。在我一生经历中，我还从未见到过有哪一个教会象北部教会的成员那样，因意见不合，相互仇恨和争吵，竟致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这一现象说来是奇怪的，因为作为个人，在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许是苏北那个地方一贫如洗，治理不善，交通闭塞和生活艰难，使他们感到不如意，以致变得冷酷无情，从而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一种类似的心理状态。赛珍珠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成人的。她只是在结婚之后才对其他传教士的情况有所了解。她的父亲，即她笔下那位“战斗的天使”，原先就是我们布道会的成员，他是后来才转到苏北去的。由此或许可以大体上说明赛珍珠对各个布道会的看法。

北部教会总是不停地对我们学院里的人逐个作调查，调查我们每个人是否纯正，我尤其受到怀疑。有些人在神学信仰上无可非议，只是因为对于观点成问题的人采取了宽容态度而不断遭到北部教会的种种非议。幸而我们学院本身是和睦的，人员之间相互信任，不因遭人攻击而使彼此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在我最后辞去学校职务迁往北京时，我丝毫没有逃避这类调查的想法，不过，回顾当时苏北教会作调查的做法，以及随着好斗的原教旨主义者在中国传教士成员中势力的增长，我或许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有可能

把神学院卷入这场可恶的神学争论之中。

事实上，在我离开南京之前我已经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尽管我几年之后才知道此事，我不妨在这里把自己当时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遭到的非难记载下来。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基督教青年会曾请我在他们召开的干事会上就基督教的几个主要方面——上帝、耶稣、圣灵和《圣经》——用汉语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为此还特地邀请了一些年轻能干的中国干事们出席。所有演讲都没有用讲稿，只是在演讲中作了速记。事后，基督教青年会征求我的意见，速记稿不予公开发表，但是否可以由他们刊印出来自己用。我当时正在为邀我去北京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我连清样也未曾过目就同意了。如果我当时不同意，事情是不是就会有另外一种情景呢？那也未必。

就在那年，有两位客人从美国来访，表面上是要召集传教士在他们的夏令避暑胜地举行神灵启示会，但是，附带的使命却是要在中国教士中察看现代主义的表现情况。我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记录不知怎么落入热心的原教旨主义者之手，而且还为这两位来客提供了一份。后来《普林斯顿神学评论》发表了一篇由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撰写的言过其实的文章，题名为《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该文大量引用了我的演讲记录稿，同时还摘引了其他一些与之有关的书评和油印材料。后来，我在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资金开展活动时，曾收到海外布道团一位年迈干事的来信，要求我采取行动帮助他们消除掉由这篇文章给他们的机构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早先曾受命担任过圣职，曾是里士满东汉诺佛长老会的成员。

尽管按照当时正在试行的把美国长老会成员转为中国长老会会员的做法，我已经同它脱离了关系，但是我仍要求让我参加东汉诺佛长老会的春季会议，为此我特地从底特律作了一次专程旅行。

不管宗教评议会可能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对我个人都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我有燕京大学的支持。如果弗吉尼亚长老会对我宣讲的教义的“可靠性”作出不利的裁决，我在北方各州和中国教会中的威信丝毫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过我急切地想弄明白，那些保守的南方人——他们从早年与我结交以来就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同学或年轻的同事——在一些基本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是否对人们在学术研究中事物所发表的见解表现有更大的兴趣。我一方面自愿接受他们对我的审查，另一方面，从心里也在审查他们。

他们问我愿意用什么方式对我进行审查，我回答说，我愿意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或者采取任何他们感到满意的方式，对我在基督教青年会上发表的那些惹出事来的演讲记录（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人已经散发了许多份），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是我本人希望向委员会全体成员申述，以便说明我过去论述四个基本信条的见解。后来我这样做了，使用的是他们熟悉的语言。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我进行了质疑性的诘问。结果，他们一致起立对我所发表的看法表示赞同。一位身材瘦高的教友曾提出异议，要求采用北方人所使用的不记名投票方式（过去就是这些北方人谴责我违背君子行为，更别说是违犯基督教义了），但是他的提议未被采纳。

可是，在费城和普林斯顿两地对我发起攻击的人却不同

意宗教评议会的决定。他们鼓动那些在看法上与他们相同的南方人把问题提交给弗吉尼亚宗教会议，甚至扬言要提交总务委员会来对我进行审查。从办事程序上来讲，宗教会议只能处理宗教评议会方面的问题，不能处理我，同时又由于它完全信赖宗教评议会，便拒绝了那些人的要求。至此，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在我再次回到美国时，我又到了里士满要求把我的长老会会籍从中国转回来，以便将来一旦有人对我提出类似的指控，他们就有权对我进行正式制裁。我的要求获得了一致同意，这样，我在东汉诺佛长老会中又成了一名“合理合法”的成员。

1926年9月29日，《南长老会》杂志在一篇有关的社论中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司徒博士那样把自己的神学观点提交给宗教评议会进行彻底的审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能更有力地说服过宗教评议会，使他们相信他信奉的是南长老会的信仰。宗教评议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攻击不但完全不当，而且丝毫没有根据。他表现了崇高的基督教的品德。他没有进行公开的争论，而是把事情完全交给宗教评议会去处理。与此同时，他默默地在遥远的中国继续执行他的伟大使命。”

我认为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如果在宗教信仰上彼此信赖，在人的关系中有揭示圣灵的共同目标，那么，抱有不同科学见解的基督教工作者们是能够愉快和睦地一道工作的。

四、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

1918年下半年，来了命令，要我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还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

自1900年义和团的灾难以来，北京的两所小神学院，汇文大学（英文名称叫北京大学，属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北通州协和大学（属长老会和公理会）一直想联合。他们终于同意这样做了，而且还在该城的东南角上，原来的卫理公会大学的后面临时凑成了校舍。但是有些问题争执不下，尤其在联合机构命名问题上，对立情绪很大。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分歧得不到解决，不能出现新的起点，那么，要在北京兴办一所有影响的教会大学似乎根本没有希望。

汇文大学理事会的一位理事，当时住在西雅图的一位退休牧师，从北京回国途中来南京访问时就住在我家里。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这所新大学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以任何最有效的方式为中国的基督教事业服务，但是我又说，我不具有适合于那项任务的行政经验，我感到我现在的工作各方面都合意，因此，他不应当把我看作适当的人选。不久我了解到，他去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两所小神学院之间的僵

局，为了推进它们的联合，他正在物色适当人选，以便事先提供有力的领导。

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出任汇文大学校长的正式聘请书。所有的朋友都劝我避开那个他们认为是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只有哈利·卢斯博士除外，不过，他也提醒我，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过去已有许多别的人先后谢绝了向我发出的这一聘请。普遍的意见是，这位校长必须是一个局外人，与有关的问题毫无牵连。我至少能符合这一要求。可是一想到当初自己在当传教士问题上的种种经历，我就不敢仓促从事。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是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1919年1月31日我到了北京，雇了一辆黄包车，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到了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我马上意识到两派之间的分歧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看来我要是会见另一方的代表团也将碰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了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在两种情况下，我所会见的都是双方毕业生中一些主要的人物，他们许多人在教会工作中表现都很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从而显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

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可是，如果新大学的中文名称仍叫汇文，却又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当时清王朝已经灭亡。在传教士们正为他们自己创办的大学的名称争吵不休的时候，一所中、英文都叫做“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已经创办起来，并且正迅速地在国内外获得名气。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曾获得旧科举制的最高学位，同时也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学者，那时他正把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卓越的年轻学者吸收到他的大学里，其中有当时就很著名的胡适博士。这些学者正在出版有关革新的书籍和期刊，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正如一份最著名的刊物名称所表明的，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还在南京的时候，我就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复兴的过程。两个教派争吵着，妄图把理应属于中国人的北京大学的校名安在他们默默无闻的小小的大学头上，实在令人好笑。中国人正在使北京大学成为他们国家的知识源泉。

当我与全由外国人任职的董事会面谈时，我说，除非他们自己使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就无法决定我是否接受聘请的问题。他们明白了我所说的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于是各方推选出了十个人，五个外国人和五个中国人，以谋求达成协议。他们要求我担任主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他们为校名和其他事项激烈地争论了三天之久。有一次他们甚至争论到吃过午饭很久以后，接着又争论到午夜之后。我听出来，他们显然都拚命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又过分纠缠于各种诺言，各种矛盾和派别之争，致使他们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同样也很明显，如果这场争论的后果是我

拒绝他们的聘请，那么他们就再不会有联合的意愿了。我还在心里思考着，是否能在这座一度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迷人而古老的城市里，通过集思广益，通过自由地进行新的教育试验的办法去兴办一所教会大学。

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得到了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耶和華（即上帝——译者注）的启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接受这一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他们的最后人选；同时还因为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虽然问题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解决不了的）；与其他地方相比，北京也应有一所与传教事业相称的大学。我请求指引的祈祷已经得到回答。所以，当他们再度聚会时，我就冒昧地提出建议说，如果他们愿意按我的建议办，我就准备接受他们的聘请。我建议他们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对争论之点作出决定，有关各方应当把它当作最后决议。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倡议。整个气氛为之一变，他们立刻变成了朋友和同事，这正是他们心里早就盼望的。

但是，该委员会屈从于中国人惯于妥协的习气。他们提议一方作出某些让步，另一方也作出一些让步，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泥坑。我返回南京等候结果，却接到了董事会的董事们和校外其他朋友的一封封电报，要我刻不容缓地再到北京去一趟。那时已是三月，我已尝过北京早春风沙的滋味。对北京居民来讲，要是没有从戈壁沙滩刮来风沙，他们那里的春季气候该是十分宜人的。

我又见到了神情沮丧的董事们，我向他们表明，照我

看，他们有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1）把问题再次提交给专门委员会，并提请他们注意，其使命以原定宗旨为限；（2）放弃为联合所作的一切努力；（3）各方放弃所坚持的要求，只考虑对新机构最为有利的事情。我还表明，如果他们在这次会议上仍不能使问题求得解决，我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年迈而可亲的刘海澜博士当时站了起来，满面泪水地说，他对各种委员会已经领教够了，放弃联合的主张是不可想象的，并说他也许一直是最执拗的一个，愿意开诚布公，重新作起。

这正是所需要的东风，原先那种似乎一直无法解决的分歧很快就迎刃而解了。大家一致同意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仍用原来的中文名称，而新名称则委托我去考虑。诚静怡博士（他或许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提议用“燕京”，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中国人把它视为富有诗意的北京的代称。它很快就成为中、英两种语言的名称，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整个经历说明了两校联合是何等艰难，同时也说明了一旦实现了联合，就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老问题既已令人愉快地获得了解决，我便宣布正式接受他们的聘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校址的问题应当重新考虑，旧事不再重提；第二，我不管经费的事。我当时还以为这一着十分聪明、十分有创见呢，后来才知道，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而且是一种愚昧的见解。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卢斯陪同，我推荐他担任燕京托事部（美“在华教会联合委员会”设在美国的下属机构——译者

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事务。他是这方面的开拓者,曾为山东的齐鲁大学筹集资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次该如何开办燕京大学的问题上,他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二)

做一件事能看到成功的可能性对人才具有吸引力。当时学校一点现款也没有。四个布道团的管理委员会曾各自向我们提供过五万美元经费,这笔款项已经全部花在购置和修建准备用作校址的零散地皮上了,一想到那么一个不好的校址,我一开始心里就沮丧。当时的支出预算虽然够小的了,但已是收入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而且多数是没有培养前途的。他们大多数都靠奖学金。学校合并之后,只留下了两名中国籍教师——李荣芳博士和陈在新博士。许多外籍教员都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不管是在北京或是在纽约,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分歧问题上,因而没有作出任何计划,甚至根本想不到再去筹措资金,或者采取其他改进的措施。另外,我知道自己是教学管理上的新手,既不熟悉华北的情况,也不熟悉未来的同事。我很留恋南京的安稳工作,在那里不用操心行政事务,除了教授合意的课程,从事同样合意的研究工作之外,别的什么事也不管。我这个传教士似乎在走下坡路——原先,我离开了讲道去教书,现在又撇开了教学去搞行政事务!我不知道,在新的冒险中有多少是信念,有多少是蛮干。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关心

的学校。中国人一直在忙于用他们的资金去购置地皮，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我很快就发现，燕京托事部主要是由各布道团管理委员会选出来照看各教会自身利益的人组成的，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筹措资金的责任。哈利·卢斯博士是唯一的例外。董事会同意他担任副主席，但是纽约托事部的理事们却都反对他。我寄去了一封辞职书作为回答，但是他们仍然反对他，也未提出别的建议。我随即将董事们召集到北戴河，把来往的信函给他们看。董事们又紧急地联名推荐卢斯博士，结果理事们同意了。

卢斯博士立刻动身前往美国，开始在美国各地不停地奔走，拜访他过去就已争取到的朋友，并通过他们再结交新朋友。他正在为一个完全不知名的甚至连修建校舍都还没有地皮的机构卖力。他写信抱怨说，这是他最大的不利条件。我们似乎是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

(三)

那时，我们已经同意在城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找块地皮。但是，结果证明这是一桩为难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外省驻京的官吏需要为他们的家族成员买茔地，买光了城边的地皮。北京的近郊到处是这类互不相关的私人坟地，许多已经年久失修，查不到原主人。我们每次费力去买一块足够大的地皮，总要牵扯到一处或多处这样的坟地。中国人反对迁坟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确实成了一道难题。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

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座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英里，由于那条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那块地原是满洲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在那里建有夏令别墅和祠堂。我们熟悉的一位官员说，他愿意帮忙为我们买下这块地皮。我向董事们和理事们提出了这块场地，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次年夏天我去陕西省城见了陈督军。这位督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以六万中国大洋将地产卖给了我们，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开初买了四十公顷，过了些时候我们又在附近买了些荒废了的园地，结果总面积达到了原来的四倍多。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校内水塔的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式宝塔，这也许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修复了旧花园的景色，此外，我们还自己种植了草木，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纪念哈利·卢斯博士的湖心岛后来也成了这些景色之一，那是由他的儿子亨利·卢斯倡议的。另一处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这铜钟现仍在校园里鸣响报时。后来，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以致我们自己也逐渐

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现实变得比我的梦想更更好了。

(四)

不过，我也逐渐懂得了梦想的实现是要花费金钱的。卢斯博士在美国到处奔走，既无人指点，也无人支持。第二个人的情况亦然，筹集到的资金甚至不敷他个人的支出。

1921年，由芝加哥大学欧内斯特·伯顿教授率领的一个教育委员会到了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代表教会的各个团体来调查中国教会的教育情况，并提出意见。三位中国人和三位传教士被请来同他们合作，其中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和我。我们走遍了全国，调查结果，发表了一份关于教会大学、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办学原则的详尽报告，并制订了一项适用于整个中国教育的计划。

1922年，我应召回美国向教会团体的各理事会作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部的人。那次经历最令我失望。在他们的会上，我听见一位理事挖苦另一位理事，因为后者似乎不知道这个托事部属于他们供职的许多类似的理事会中的哪一个。只要证实下面这点就够了：没过多久，由于有的理事辞了职，另一些理事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强烈地要求我提出新的人选，同时变得积极主动和愿意合作共事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说到我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其情景却是凄凉的。卢斯博士不知疲倦地想方设法使那些可能给予资助的人了解

燕京，结交了许多朋友，他播下的种子，为后人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筹措到的资金实际上却很少。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威廉·亚当斯·布朗博士的家里听见康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的一位教师同布朗的儿子约翰谈到通过专门的商号筹措资金的事。在我离开朋友家的时候，心里便感到有办法了。理事们是靠不住的。开初的资金从何而来呢？一位理事抱怨海外布道团商业化了。这家商号从来没有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开办过任何企业。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只好与坦布林·布朗商号签订了合同。

该商号明确规定必须由我出面。他们从经验知道，美国的“主顾”有一种心理，想和有关机构的首脑打交道。所以，在其后几年里，我一直往来于北京与纽约之间，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干些不适合我的事，而对我本来该干的主要事情却忽略了。在中日战争前，我先后十次回到美国。我的一位同事如今还记得我从一次筹措资金的旅行回来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那是一件既缓慢又艰难的事，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赠给的，美国政府没给一分钱。

坦布林·布朗商号手法高明。他们雇用年轻而机敏的大学毕业生，把一切事情办得妥妥贴贴，而他们自己却从不出头露面。卢斯博士和我，随同燕京的一些中国人和其他一些和燕京有来往关系的人常常出现在某一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演讲，并常常以我们的名义举行招待会。然后，我们去拜访那些指定要拜访的人。这样做收到了效果，在第一个季度之后就得到了证实，然而，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有关

安排也就中断了。向别人学会干这种事之后，我决定最好还是按我自己的外行办法去做。几年以后，在另一家商号的安排下，采用了更为直接的办法，把我和一个来自西部的极其能干的人派到波士顿。那人满有理由地提出，筹措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去要。他带着我在波士顿拜访了一连串的文人雅士，其中有些人我过去就见过，对所有这些人他都采用了高压推销术。我感到极为懊恼，就离开了那个城市，并决定，即使我的大学再需要钱，我也不再采用那种办法了。

要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要向他们乞求，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使人紧张而又疲劳的事情。我甚至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次总是在我旅程完结时就消失。不过，这倒也使我同许多人建立了愉快的友谊，增添了一些有趣的经历。我努力遵循两条指导原则。一条原则是，不管是否从捐款人那里得到赠款，一定要使他成为我们机构和中国的的朋友。另一条原则——我敢说我从没有违背过——就是不过问款项的来历，只要捐款人不限制大学当局的使用权，只要他们充分了解学校的政策和目的，就一律接收。我认为，从这两个方面来处理有关道义和权利的问题，似乎有助于我克服将来随时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数年后，我开始在中国作同样的努力去筹措资金时，我也就老练多了。

筹措资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权衡鲁莽冒失与明智谨慎的利弊，这个问题使我更为发愁。学校的物质设备不仅包括教学楼和宿舍楼（为它们筹措资金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而且还包括象价钱昂贵的发电厂这样确实需要的设

施。燕京取得的实际成就越多，要获得额外的资金也就越容易。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使人们相信，我们的经费开支是保有自主性的，诚然，这么做带有风险，需作精心考虑。

（五）

有一个名叫黄国安的中国人，他是新加坡的一位富家子弟，从小就到了美国，毕业于俄亥俄韦斯利安大学，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返新加坡之前，他家里的人曾带他在欧美作了一次豪华的旅行。然而，他却接受了美国人办事朴实而又有事业心的思想，愿意回到他的祖国去做一番事业。他家里的人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跟他们一起回新加坡，他们就剥夺他的整个继承权。他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作了回答。他确实没回新加坡，因此，他得干点什么事为自己谋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坦布林·布朗商号听说了他的情况，他们正打算为一所中国大学发起筹措资金的运动，于是就招收他为雇员，不过，对于如何使用他，却还没有定见。

这时，卫理公会海外布道团决定在燕京校园里修造一座建筑物来纪念贝锡福主教。他曾经积极地说服他的华北布道团接受了联合计划。黄在俄亥俄韦斯利安大学当学生时，贝锡福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卫理公会教会可以按照一定的手续，利用在特定的地区所筹集的剩余资金来兴建这一纪念性建筑物。由于我们使用不上黄，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专门派他去征集牧师们的签名，筹措资金，如果他们捐助的资金有剩余，就作为建筑费用。黄十分喜爱这项工作。鉴于乘火车太费时间，他要求拨给一辆小汽车去办这件事。可是没有多

久他就把车使坏了，商号感到很不高兴，可是资金却滚滚而来。我便出面为他求情，换了一辆新车，条件是他必须更加仔细地使用它。由于损坏的车辆越来越多，超出了卫理公会当事者的预料，使他们感到恐慌了。然而，他们毕竟是一些真正懂得干事情的人。他们提出了数量和时间上的限制。黄答应他们将严格遵守这两种限制。

限期越来越近，为了完成任务，黄先后培养出一个中国小伙子和一位十分迷人的姑娘作他的帮手——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一位董事长曾把他的私人轿车供给那位姑娘使用。我们校园中央美丽的贝锡福办公楼就这样建成了。黄因超速行驶曾被交警扣留过大约五次，但一看他是中国人，他又自称是为某主教办事的，所以每次都放过了他。黄在紧张的奔忙告一段落之后，告诉我说，他一直在不停地为燕京商谈事情，谈得他自己也想留在燕京了。我回答说，我们唯一的空缺是体育。他对体育并不特别喜爱，不过，同意以此开始他的事业。他是我听说过的唯一担任过一个美国大学棒球队教练的中国人。他开始干了起来，然而，中国球队宁愿退场不参加比赛，也不愿吃败仗丢面子的做法使他大为惊讶。他还发现，如果一个球员看到自己的敌手当选了队长，他会破坏对方的得分以此进行报复等等怪现象。在同这种缺乏体育道德的现象屡经斗争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相信他能为他的国家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培养学生具备他在美国学到的那种体育竞赛的好品德。不过他又说，他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要求我允许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学习，以便取得体育博士学位。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学位。黄博士不仅在燕京建立了

体育系，而且还树立了新的体育道德，即所谓的“燕京精神”，使之传播到了整个华北高校之间的运动比赛中。这种精神对学校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仅仅为增进学生体质的范围。

(六)

唯有在美国才可能出现的那种在工业上蓬勃发展的局面，对燕京也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一位化学教授在当时的奥伯林学院作实验时对他班上的学生讲，他的实验很可能导致发现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金属产品。查理斯·马丁·霍尔按照这一提示继续实验，生产出了铝。他曾经使用过的那套简陋的设备，现在陈列在奥伯林博物馆内。霍尔在遗嘱中规定，他的遗产除了赠给许多个人之外，将余下的三分之一赠予奥伯林学院，三分之一赠予南部各州的中学，三分之一赠予美国人在亚洲或巴尔干地区主办的高等院校。他的两位密友，美国铝业公司的总经理及该公司的一位法律顾问，是遗嘱的执行人。所有有资格接受遗产的人和许多没资格的人都去找他们，要见到他们是极为困难的。

具有不懈的毅力并待人友善的哈利·卢斯博士早就把那位克利夫兰的律师争取过来了，并且把我介绍给了他。卢斯安排我和阿瑟·戴维斯先生以及他本人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问我，我也完全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戴维斯先生说：“今天下午我就动

身去巴黎，但是我会同意我同事的意见（约翰逊先生已经答应给五十万，如果他能使戴维斯先生信服的话）。不过，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扰我们。你回去，办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再见。”过了一年左右，当我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他说：“我们已经决定给你一百万——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打算把数目增加一倍。”后来，我提出切实理由，要求他们把数目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他们同意了，然而，我却又因此经历了一次难堪。

他们对整个亚洲作完分配之后，账面上还存有大约四百五十万，虽然其中的一半当时没有利息。他们打电报同我商量如何处理这些尚未分配的余款。我感到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位美国大企业的代表人物和一位典型的大公司的律师竟然想到共同办一所大学，用西方研究外国文明的仪器设备和技術，去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学生学习中国的文化，以便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他们承认他们的想法还很模糊。但是不管怎样，最先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他们。哈佛企业经营管理学院院长多纳姆一直在设法为他的学院争得一份霍尔遗产的赠款，但是没有成功。他碰巧是那位律师约翰逊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约翰逊他们便派我去哈佛，要我同那里的人一起按照他们的想法拟定出某种方案。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来历。戴维斯和约翰逊主要依靠多纳姆的帮助。多纳姆曾经是一位银行家，能同戴维斯他们谈到一起。他无意之中投入这一新的事业，多年来一直是燕京托事部十分

积极而又能干的主席。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

托事部的出纳是麦克布先生。在筹资运动的早期我曾到他在伍尔沃思大楼的住处去看望过他。他一开头就说：“我看你是来贷款的吧。”

“不，”我回答说，“贷款的事我全交给理事们了。我来的为了一件私人的事，就是请您辞掉托事部的职务。”麦克布先生大吃一惊。我继续说，“让我解释一下。你对这项事业显然不象你对别的事业那样热心。你为什么不辞去这一职务呢？”

“你有什么根据？”麦克布先生问道。

“处在你的地位，你愿意给什么就给什么，可是除了哈利·卢斯用来买火车票的二百六十美元之外，你什么东西也没给燕京。你是托事部的出纳。你知道我们是需要钱的，因此，我不相信你关心这件事。这不怪你，不过，我认为你应当摆脱这一负担，这样我们可以另找一个对别的事情不那么感兴趣的人。”

麦克布先生开头非常生气，在椅子上如坐针毡，极力为自己表白。末了他说：“咱们讲好：要么我用实际行动使你相信我是热心的，要么我就辞职。”

在我回中国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答应拨给十万美元，后来又说，他希望立即动工修建一座建筑物。我以为这可能意味着改变原计划。“不，不，”他回答说，“这是外加的。”后来他多次向我提到其他理事，说：“你为什么不象找

我谈话那样去找他们谈谈呢？”

讲完这一桩桩走运的事情之后，我可以接着用一整章的篇幅来写我在筹措资金的努力中所遭到的叫人泄气的事。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筹集资金也是一项乏味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失望的差事。我在一些“可能的资助人”身上浪费了许多时间，这些人不是失去了兴趣，就是失去了钱财，或者由于一些小事而同我们疏远了。对专职从事筹款的人来讲，最捉弄人的也许是你成功地和这些诱人的“可能的资助人”交上朋友，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因这种关系而“付钱”。比如，我曾趁傅泾波担负国民政府的一项使命之时，通过他认识了亨利·福特和埃德塞尔·福特。我同他们搞得相当熟，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们就会请我去吃午饭，直率地向我提出一些有关燕京大学的问题。任何美国大学校长都会羡慕我同福特这样接近，要是他们的话，一定会大肆宣扬一番。但是我遵循我的直觉，我知道，如果福特不主动开口，他就不会答应我的要求。

在我摸着了这些富翁的个人癖性之后，再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打交道时就感到愉快多了，对于他们来讲，唯一的问题是要有一项具有充分价值而又符合他们计划的事业。那样，你肯定会受到友好的接待、谅解和同情。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讲，我是他们的常客，我对他们内部的活动方式越了解，对他们办事的宗旨和所采取的使之得以实现的方法就越佩服。

经过数年的努力，我们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为学校的校舍和设备，为日益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筹齐了资金。到

1937年，给燕京大学的捐款额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万美元。

(七)

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最后一方面我已经叙述过了。

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在选择教员时，校方将为那些热心于宗教事业的学生创造有利条件。因为，所有的教会学校都有一个由积极从事于宗教活动的学生组成的核心组织。校内的一切成员和社会公众，不管他们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如何，一般都把燕京大学看作教会学校。我们试图证实下列三点：(1)正规的大学标准同公开的宗教目的并不是不相容的；(2)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观的人组成的团体会产生一种行善的共同生活气氛；(3)那样一所大学还可以证明，信仰基督教对人类各种各

样有组织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在我对那些迄今为止从未听到过福音的人宣讲了一段时间的福音之后，我感到在许多情况下，传教士们完全可以壮起胆子去宣扬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燕京大学的校园似乎就为我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当时的宗教生活组织是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由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领导。加入团契的条件是，要立誓信奉耶稣本人的教导，以他为榜样，象他那样生活，而不是恪守什么信条。这样就可以将宗教活动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区别开，也可以避免联合机构里出现宗派问题。那些按自己的意愿举行自己特有的仪式的人，与团契也不会产生矛盾。这种纯粹出于自愿的做法也就避免了问题的复杂化，否则就会触怒中国的公众舆论，他们会指责说，我们利用精心制定的教育计划去进行宗教宣传。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它的自发性和现实意义。只有那些真正感兴趣的，而且与团契有切身关系的人才参加它的活动。

鉴于我本人很少参与教育工作，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有水平的。我的任务是让教师们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仍然热衷于研究教育计划的所有细节。我已经谈了我们的汉学系在霍尔遗产的赠礼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激励下所达到的高水平。我还想改进英语教学。在中国，没有必要让人们都普遍地掌握外语，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学生为媒介，通过他们把西方的知识介绍给中国。我们的学生确实是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他们一入学就能听懂无论用那种语言讲授的大学课程，教师们也可以随便讲那种语言，或两种语言都讲。外来的讲

学者从来不用翻译，虽然听众中总有一些听不懂的。我向学生讲话时，是用汉语讲，还是用英语讲，也往往会在台上临时改变主意。这就是说学生们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那些继续在国外求学的人们似乎也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偶尔感到一点语言上的障碍。

北京协和医学院甚至在未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之前，就已经成为当地传教士联合起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它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这一点。另一个范例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那是为中国女孩子办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尝试，这应当首先归功于卢拉·迈因纳小姐。学校人数不多，教学水平也不太高，但它是一位具有罕见的洞察力和工作能力的女性所作的重大创举。我到职后没过几个月就决定把这所女子大学合并过来作为燕京大学的女生部。为此还专门举行了一次合并仪式，主持人和主要发言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人们开玩笑地称这次仪式为圆房的婚礼。结果证明，合并以后华北女大和我们相处得极为和睦。

看到我们的理学院取得进展，那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晚才受到十九世纪唯理论的影响。唯理论是相信科学而不信奉宗教的，因而在一些教师们认为科学和宗教没有矛盾的教会学校里，强调科学课程是特别有益处的。燕京大学早就同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们几乎成了协和医学院的分校，我们的学生在医学院学习一年后即可获得他们的理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备班也一样。北京协和医学院早就感到需要培养一批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护士。但是按中国的传统观念，一个上大学的女孩子去当高级

的老妈子那是丢人的。一旦打破了这一观念，我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材，而且也为中国女孩子打开了另一种职业的大门。过去在上工业化学硝皮课时，我们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体力劳动一直是一个有损于学者尊严的问题。再说：硝皮又是肮脏的劳动，我们的男孩子有谁愿意干呢？他们岂不会在同学面前丢面子吗？没想到这件事进行得那么顺利，我们不禁大为惊异。

我们的法学院是根据普林斯顿公共国际事务学院的名字取的，其主要资助者是那所大学的毕业生组织的一个校友会，称作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费补助。普林斯顿的教授或刚毕业的学生常到燕京讲学一年或数年。我们的高材生也常去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再返回我们的大学。这种情况是经常的。法学院包括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所有这些系科对中国的现代化都是极其有用的。也许私人 and 政府机构最需要的是那些主修社会学课程的毕业生。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照搬美国的四年学制是错误的，教会学校也有部分缺点。从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其他一些因素看，理想的做法是把高中的最后两年和大学的最初两年合并到一起，然后，所有的课程再分专业。大多数学生都没钱上文科大学，所以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就把这种大学教育当成了英语职业训练。不管怎样，我是十分强调这种训练的，特别是那些能表达基督教精神或满足社会需要的职业。这儿所提到的几项职业训练，很有前途的一种似乎是利用科学方法去恢复中国古老的制陶业。可是后来日本人毁坏了我们的设

备。我自己的特殊爱好也许是新闻。燕京托事部的理事们曾授权我增设新闻系，但是有言在先，他们没有为它提供经费的义务。后来尽管这个系的成立有些贸然，可它很合我的心意。由于报纸在中国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在这项新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反复强调编辑水平和新闻道德的问题似乎尤其必要。从一开头新闻系就是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常常与经济专业在招生名额上争高下。有一段时期，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中的地位也同样突出。

在燕京大学从日本人的占领下得到恢复后，我们的技术课取得了一项极为令人满意的进展。在天津一带，中国的一些头面人物向我们提出了开设工程课的建议，经费全部由他们提供。他们解释说，他们需要的人，用不着象去国外学习过的留学生或者象一些中国大学里的学生那样，经过精心的培养，那些人学那么多的理论，还要高工资。他们一直在观察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要的正是这种人材，既具有必要的技术知识，又愿意在工厂工作并在那里学习实际经验。后来我们对课程作了这样的安排：学生先学两年的工程预备课程，后三年一半在校园里上课，一半由专家指导去工厂实习。这一专业立即吸引了许多优秀学生，可惜后来都一一成了国民党失败的牺牲品。

我过去在神学院任教多年，对建立神学院自然就特别感兴趣。神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主要任务是培养出大学毕业，与其他院系有着同等的学历要求。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成了学院中的主要成员。幸而这是一批优秀的人

材，他们的学术水平与我们这所大学里和别的任何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水平是不相上下的。他们可以绝对自由地按照中国的传统做法做礼拜，讲授教义等等，也可以完全自由地去撰写有关中国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他们酷爱这种自由，并很好地利用了它。不过，他们多半是按西方的模式，而不是以任何更新的形式来表达这种自由的。他们彼此之间无拘无束，工作中表现了中国人的责任心，这对基督教事业，尤其是对我们学校的宗教生活显然是有利的。

(八)

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去到北京的，其中最为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事业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划分开的。让中国人和外国人享有同等的地位参与学校的一切事务，住同样格式的房子，彼此相依为邻。这些想法在当时都是激进的。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燕京就当即作了登记，表示接受教育部所作的一切有关规定。不过，所牵涉的多半是学校本身的内部事务。我开始结识那些处于当权地位的人，包括那些过去居于要位和日后有可能取得重要地位的人。除了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外，许多人还可能给我们以重大的帮助。这样一来，他们对燕京必然就会变得更为关心，燕京也就能更加适应于中国的生活。

通过在美国大力筹措资金把燕京建设得具有相当的规模

之后，我就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使它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是想在一种受人猜疑而又可能引起敌对情绪的环境里去赢得人们的善意、良知和同情，另一面也是为了着手在中国获得经费支持。我和傅泾波走访了包括满洲在内的这个国家的所有重要地区，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显要以及教育、财政和工业部门中的许多知名人士。由于四处走访的结果，我们同许多人建立了长期的友谊，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友谊，也有对燕京的友谊。一个立见成效的附带收获，是使中国人至少有可能把燕京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学校，值得他们大力支持，而不是把它当作由外国人替他们主办的事业，不管这些外国人是出于多么美好的动机。

我原来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让人们仅仅在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来。就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办事才能，就他们对这所大学的理想和办学原则所表现出来的赤诚之心来看，我的梦想已全部实现了。燕京的第一任校长是吴雷川先生，他是一位成了基督教徒的翰林学士，我校多年的名誉教师。这之前他曾是教育部副部长。他的中文头衔是“校长”；我的头衔是“校务长”，但两者的英文名称是相同的。在华北被日本侵占之后他就去世了。抗战胜利之后，董事会推举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博士为吴先生的后继人，我仍保留原头衔，只是在担任大使期间我告假离职在南京。

不过，我也看到了增进国际了解对保障和平，并最终实现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极端重要性。我感到，大学应当

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燕京创建的环境也许可成为一种长久的财富，来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的梦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要完全成为现实尚有待于将来。那就是说，燕京在比现今更为彻底地成为一所中国式的大学的同时，应当具有如其所声言的更为广泛的国际性。

就燕京而言，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头一步。燕京主要由美国人兴办，靠美国的资助，但它也带有某些英国的特色，而且是抱着使它永久地和更加彻底地中国化的目的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兴建的，其国际性已经初具规模。此外，我们还开始发展其它方面的关系。我们在优等生的课程里试验性地采用了牛津大学那种由指导老师作个别指导的方法，这就是有名的“当代牛津伟人”教程，这一试验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大力支持。领导这一试验的是前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的儿子林迈可，他过去亲自听过这些课程。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同英国原有的关系。几乎从我们建校一开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就派了王克私博士夫妇二人来到我校。法国政府答应给我们提供一份去巴黎学习的研究生奖学金，第一个享受奖学金的学生已经在那里学了四年，并准备来我校任教，但不巧，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过去每年都向我们的西方语言学系捐赠一笔小小的资金，一直持续到1941年秋（后来他们又恢复了这笔捐款，我们愉快地接受了）。那年春天，意大利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八份研究生奖学金，几乎包括去那个国家的全部旅费和住宿费，而且还予以特殊照顾，学生可以在那个国家任何一所得官方承认的大学里任选课程。八个学生选出来了，他们努力攻读意大利语。但是那年夏天，在他们

正要起程之前，国际形势极度紧张，迫使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我特别希望与日本和俄国建立类似的关系，但是由于战争和共产党人从中作梗，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成了泡影。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我这种发展关系的想法是对的。要是燕京有朝一日能在其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开办，我的希望是能够实现的，这就是说：尽可能与更多的国家（首先是日本和俄国）建立起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尤其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学、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作这样的安排，就能使学生专攻某一种国外的文化，或者研究一项几个不同国家也同样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将与有关教师取得个人联系。

这种作法的主要好处也许是使学校形成了浓厚的国际主义气氛，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志趣相投的人可以共聚一堂，结为团体，这样整个校园的生活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眼界更加开阔。在中国进行这种试验似乎尤其合适。哪一个国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不如中国的包罗万象。如果中国人并不因为自己不幸的遭遇而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是他们民族生存的唯一希望，那么他们的那种道德观念与当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矛盾。燕京大学可以在各个国家的友好交往中发挥巨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这似乎并不是过高的奢望。那么它的外国根源也就不成为一段必须忘掉的历史，反而是一个永远有利的条件了，可以利用这一条件给中国本土的青年带来许多去国外留学的人所追求的东西。

(九)

我到燕京工作数月之后，查尔斯·科贝特、傅晨光和我碰了碰头，准备制订一个校训。我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一致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他们两人之中有一人主张采用耶稣所说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句话（《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译者注）。我回想起了托马斯·杰弗逊刻写在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译者注）。这句话也同樣刻写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门的上方。然而，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灵感使我们把耶稣的这两句伟大格言结合起来，于是把他的教导总结为：“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这一校训很快就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这不仅见诸于学校的精神方面，就连学生的出版物、象征性的图案、人人都爱唱的校歌，尤为可贵的是在每个学生的心灵中，都见有这一校训的深深的印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校训集中体现了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哲理，他们不仅自己立志要去实践校训，而且还以此为尺度去衡量其他同学。我的一些学生到了共产党那边之后，回来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忠诚地履行了这一校训，为普通百姓做了哪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十)

在兴办燕京大学的过程中，同事们不断地给予我鼓舞和帮助。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这种友谊给我的帮助和欢乐是说不尽的。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听见小约翰·洛克菲勒讲了一件关于他父亲的轶事，大意是，人们问他父亲取得成功的秘诀何在，他父亲回答说：“依靠我的伙伴们。”我当时听起来似乎觉得那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谦虚，但是没过多少年我就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可以在小得多的范围内以最大的诚意讲同样的话。我希望有足够的篇幅来提到每一个人的名字，并说明他或她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

必须讲一讲高厚德博士。他除了受过神学教育之外，过去还专门攻读过教育学，曾经担任过北通州协和大学校长。在他来中国的前后，还有办理实际事务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汉学口语和书面语两方面都有深刻的造诣，这在传教士中是十分罕见的。在学校生活中他积极参与了各个方面的活动。在我外出期间，经常由他代理我的职务。他几乎一直是燕京大学房地产委员会的主席。尤其是在建校时期，这一机构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他写的《燕京大学史》不仅证明了他的斟酌字句的才能，而且也证明他对燕京大学的事务有着第一手的了解。然而，该书对他本人在我们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为人谨慎而又保守，办事惯于墨守陈规。这样，他就经常对我那粗枝大叶，莽撞冒失的性格起了保护作用。对任何一个新的建议我们往往各持己见，而结果总是达成一致，避免了两种极端。我们一贯

互相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便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丝毫不受影响。一个主管人能有这样一个明智、毫不自私而又忠诚的同事，那是很幸运的。

还应当赞许的是刘廷芳。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接受这所大学的管理职务后，他陪伴我从南京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学习成绩和演讲成绩均为优等，在美国留学的成绩几乎是外国留学生中最好的。他上过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照美国人的做法——象他自己所讲的——与一位同学在美国成了家，而且尽管东南大学竭力想把他要走，他仍然回到了金陵神学院同我一起工作。当我着手兴办北方的联合大学时，我对他说，同他在一起工作我将很高兴。不过他得自己作出决定。金陵神学院和东南大学都争着要他，而且提出来让他在这两个学校各工作半天，这就使他们的要求更加难以满足了。但是他仍然决定跟我走，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人忠实于朋友的一个突出例子。不久，他就当了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而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加入该院。他对那些愿意加入文学院（燕大的另一个学院）的人也作了同样的说服工作。他同所有这些十分称职的中国人争论说，尽管他们持怀疑态度，但它毕竟是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地参与一切事务，他们应当帮助这一新的试验成为成功的范例。他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刘博士作为一名教会领袖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无法在这里一一叙述的。由于他有着少见的

中文表达能力，说话充满激情而又雄辩有力，他在宗教集会和各种各样有组织的活动中都表现出是一个突出的人物。直至他于1948年去世前的二十年间，他一直是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上的著名人物。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同我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也是因为他象征着自兴办燕京以来我与中国同事之间的友谊，他们在学术上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有着不寻常的天赋和才能。这些中国同事与刘廷芳相比，只是他们在燕京的时间长短以及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有所不同而已。

(十一)

在前面几章里我已经从各个方面讲述了我梦寐以求的燕京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必须用来进一步讲述燕京的学生。学生毕竟是一所大学的主体。有些学生是令人失望的，大多数学生也许只是在某些方面令人失望，可是就我对中国学生的一般了解来看，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况，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了远非我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以及启发人们个性的教育事业的有效性。美国人民通过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帮助它进步，同时也增进了思想上相互间更加友好的交往。该校宗教目的很明确，是实现这些成就的有力因素，而且使学校在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我在中国的一生中，看到了学生生活中那种被形象地称

为“风潮”的不良现象。那都是些有组织的行动，它们通过爱国主义的示威获得力量并巧妙地从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在全国各地好斗的学生发现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开始把罢课作为解决他们真正不满或自认为不满的问题的手段，从校长的个性到饭菜的味道等一切问题都可以成为他们罢课的借口。一旦听人演讲，受人煽惑，或者被人加以巧妙利用，那么即使那些最循规蹈矩、最友好的学生也会不顾一切地参加那种群氓运动，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出乱子，而致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幸运的是我们燕京从未发生过一起无法控制的“风潮”，不过也几乎到了爆发的地步。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害怕群众的心理，尤其是当风潮影响到那些本人有弱点并对社会有所顾忌的中国学生时，我更害怕。

就我个人的心绪而言，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任何外国人，不管他教过多大年龄或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中国学生，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体验。师生间令人愉快地表现了由衷的尊重，它比学生对教师单纯尊敬以至崇拜更富有温暖的人情味。我在燕京的头几年，学生人数尚少，我也知道大学校长应该切实地做些什么，所以认识他们每个人并不难。可是后来他们的人数增多了，我的事务也繁杂了，加之我又经常离开学校，再要认识每个学生也就不可能了。我徒劳地想通过各种办法来弥补这一损失，结果成效都不大。然而说来也奇怪，我似乎感到我认识学校招收来的一千多名学生中的每一个人，而且还敏感地觉得学生们也了解这一点。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无论是在校园里或是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常常以中国人那种体贴人的礼节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使我不致感到窘迫。

纵然我同学生们的接触不多，然而他们似乎理解我的主张，理解我对他们大家的感情。在当时经常发生席卷中国学生界的抗日爱国行动中，鉴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一般都能同他们的领袖相处得很好。给学生团体演讲并得到他们积极响应，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联合学校的生活中有不少恋爱之事，我经常被请去为人们主持婚礼。这些婚礼虽然不总是，但多数是按基督教的仪式而且是在我自己的家里举行的。顺便说说，在这些婚约中，不管是否由我主持的，我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起是不幸的。它似乎证明了通过这种办法来找到合适的伴侣是可取的。师生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即使象这里笼统地讲的那样，也许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见到，而且对一个美国人来讲则更有意义。无论我走到那里，在我收到的无数封来信中，我都感到了这种亲密的师生情谊。

我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是颇信得过的，对那些到国外获得了高级学位之后再回校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尤其如此。我们知道，过多地吸收他们会在学校内部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对一所为了特定目的而由外国人创办的，而且在不失其明显特征的同时正在逐渐中国化的学校来说，再没有比留用本校的学生去实现这一转变更好的办法了。他们赞赏，而且本人就怀有学校创办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回忆起早年的学生生活就有一种别的中国人所不容易具有的忠诚感。

燕京精神是否能象它过去从日本恐怖统治下恢复过来那样也能熬过共产党排除异己的统治，那只有时间才能加以证

实了。共产党解放的头两年里，人民政府把燕京大学划为“进步”学校，允许它继续办下去，很少进行干预。1951年燕大被迫同北京的其他一些大学合并，改了校名，不再作为一所私立教会学校。现在它虽然已经失去了一种最大的动力——自由，但是我感到为它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是相当值得的。三十年来，它通过自己的教育体制和学生生活显示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在各种对立的思想竞相统治中国的复杂斗争中，这种作用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掉的。

五、燕京时期的个人经历

一到北京，我就有机会学习纯正的北京官话了，那时正是这一方言开始得势并成为国语的时候。可是，我却很快就钻进了繁琐的、多半是用英语进行的行政事务之中，加之，我经常在中美之间来回奔忙，花费了大量时间，结果忽视了对学习北京语音。同时还因为北京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我就更无法与真正的“北京人”友好交往与攀谈了。燕大中国教员的力量一直在不断地加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留学国外，他们运用英语比西方人运用汉语要熟练自如得多，这是由于后者只是在成年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在我们对英语教学作了改进后，学生们就学得更好了，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时也用英语，从而给了他们进一步练习英语的机会。教员和学生一样，大多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方言，发音都不相同，对那些热衷于学北京话的人来讲也就成了障碍。我经常呆在流行讲英语的燕京校园里，不然就离开北京外出。不过，我仍然希望在国语学习上能取得某些进展，尽量做到能听懂和讲好那清脆、悦耳的语音。国语作为国家语言，是完全有资格的。

研究汉字和阅读书籍自然是语言学习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我发现学习与研究汉字是一

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但又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能因侧重汉字而偏废口语。当然，要学好口语，也必须懂得汉字。我极力把每一个汉字写出来，以此来检验自己的识别能力，并努力了解汉字的构词原理和笔划顺序。不过，我从未用中文写过文章，那样做势必要花大量时间去掌握那些连中国人自己也难以掌握的东西，何况这对外国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必然是外国式的中文。

学中国文学当然是学习语言最好的继续。原先，我们布道团的语言课程是学《四书》（儒家经典著作）和一本小说《好逑传》。这些必读书籍使我对中国浩瀚而伟大的文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布道团采取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它无疑是要在人们中间造成读书风气。但是，来自实际方面的压力却与此相抵触。美国人关心实际成果的心理以及对宗教使命的歪曲理解两者合在一起，迫使大多数传教士去忙于布道活动的琐碎事务。不幸的是，由于我们都普遍抱有民族优越感，不懂得即便为了眼前的目标，我们能对那种丰富的文学那怕有点肤浅的了解，也是极有价值的，这一点使得传教士忙于琐碎事务的情况更为严重。中国丰富的文学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反应，以及他们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态度。一切荣誉应归于少数几个一反常规行事的传教士。他们锲而不舍地刻苦攻读，精通了中文典籍，从而对中国人民的文化渊源了若指掌。我自己也曾想这样做，还下了决心，可是常常实现不了。一则忙于自己所谓的紧急“任务”，再则是缺乏见识，不懂得对中国典籍进行系统学习的好处。

在古典文体（文言）与现在已经完全通行的浅易的“白

话”或口语之间，我必须承认，我个人喜爱前者。我完全明白，这种喜爱带有复古倾向，不合时宜；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与其他人不同，常常好站在人家的对立面。从胡适和他的同事勇敢地发起文学改良运动开始（这一运动在一个难以置信的短时期里就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成功），我就以满腔热情希望他们成功的心情注视着这一运动。正如每个欧洲国家的学者们完全停止使用拉丁文或希腊文，而用他们自己的本国文字来写作，从而创造了意大利、德国、美国和别的民族文字一样，这一运动也是必然的和进步的。我说我欣赏文言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极其精练、优美、富于表现力的文学体裁，它能够表达精确的思想，文思敏锐，寓意深邃，其本身就为最高的文学技巧提供了材料。无怪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有才华的人为了掌握它耗尽了毕生精力，且不谈它还能给人带来高官厚禄这一点。对我们外国人来讲，我认为问题不在文言本身，难就难在它充满了典故。不了解所用典故的原意就无法领会文章本身。然而，为了把那些典故所牵涉到的意思弄明白，即使借助于词典，也需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讲，在未能与中国人学同样课程的情况下，要了解那些典故是不可能的。

回顾我在中国的生活，我没有对丰富的中国文学宝藏中那些最精华的东西进行系统而又广泛的研究实在是件憾事。在我所读过的书中，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著作”之外，还包括一些伟大哲学家的部分或全部著作、一些最著名的近代小说和其他作品。这些书足以使我对这样一种被保存下来的成熟的文化及其伦理道德和精神理想有了一定的了

解，这些理想至少在理论上不仅已为学者们，而且也为那些地位最低下的、目不识丁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哲学家中，我最喜欢的是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孟子和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王阳明。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去不远，他在婚丧问题上要求人们办事从简的主张，几乎象现代人的观点了。荀子用字乖僻，他的著作很难读，比正统的儒家更儒家——而且更有逻辑性——荀子为自己的论点辩解说，既然人的本性并非天生下来就是善的，那么就只得求助于适当的教育和整治。

我认为，上述阅历不但使我对中国文化更加敬佩，而且还铸造了我的性格，尽管我难以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其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它使我做人更具有忍耐力，使我对基督教的社会和伦理价值更关心。总之，我欣赏中国文学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欣赏它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即人既是社会单独的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应力求和睦相处。

(二)

我提到中国的文学艺术，不是说我有这方面的专长，因为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它；我之所以提及它，只是对那些我特别欣赏的某些带有特色的方面表示赞美而已。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只要对它稍加研究，就能欣赏它的书法。绘画与书法是密切相联的。我对中国画虽然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但我却热烈地爱上了它，尤其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山水

画似乎以明代的水墨画为鼎盛。我十分喜爱青铜艺术制品，几次想收藏一些，只是由于公务繁忙和财力有限，不能如愿。瓷器不需要特别的赞赏力；我所收藏的大部分瓷器，是中国朋友精选相赠的礼物，都有其内在的美，件件都是珍品。

中国的戏剧曾给我留下了一段奇怪的经历。由于一切民间演出通常都是朝山拜佛性的，中国的基督教徒们都是要避开这些场合的，传教士们也不能过分公开地沉迷于此。听到那吵吵嚷嚷、没有意义的音乐伴奏，我偶尔也瞥眼瞧过，多少引起我一些乐趣和好奇心。当宗教的偏见不再阻止我们去观看时，我却又太忙，或失去了兴致。可是在我迁到北京之后不久，在慈善机构举办的演出招待会上看到梅兰芳演了一出京剧后，我顿时被他那精细优美的动作吸引住了。我能真正欣赏这位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演员的唱腔，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由于中国一直到最近才允许妇女登台演戏，所以梅兰芳总是扮演女角。后来我们也就由相互认识而熟悉了。他要制订赴美演出计划，便同我商量事务安排上的问题，而且还就剧目选择，以及如何使它们适合美国人的口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再向他声明，我对中国戏剧一窍不通，对美国戏剧知道得也很少。不过，在他的坚持要求下，我盛情难却，不得不去观看他的演出，而在一些新添加的剧目的熏陶下，也就使我学会以赞赏的眼光去观看他的演出了。在那次极为成功的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梅先生听从了我的意见，这一点虽然显得荒唐可笑，但是却使我读遍了有关中国戏剧的所有英文资料，在内行的指导下观看了最优秀演员的演出，从而也就使我与这位当今舞台上的偶象建立了意料不到的个

人友谊。

我们决定按一种经过修改的中国建筑式样来建造燕京的校舍，建筑学便成了一个实际问题。过去我除了注意到杭州西湖附近异常优美的宝塔和有着美丽自然环境的寺庙外，对中国的建筑艺术我一直是不怎么留意的。但是，一到北京我就会被那里许多非凡的建筑物吸引住了——所有的参观者都是这样。北京西山一带的宫殿和寺庙，飞檐连绵，色彩绚丽，说明这一艺术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不过，在我看来，高超独特的地方，是它的对称性和线条安排。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比通往紫禁城的天安门更好的例子了。还有另一个平素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特点：通过搞所谓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在搞这种自然建筑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意散乱地分布着，或依傍于真假山岭，或座落在山谷之间，或畔以池塘水面，不讲方位，不拘一格。在燕京，我喜欢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同现代化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办法，想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

在结束这些有关中国艺术的评论时，我得提一提人们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其他一些巧妙的艺术手法，诸如为建造寺庙或宝塔而选择风景名胜地的诀窍、“巧夺天工”的技巧、男人服装剪裁的优雅、简陋的店铺和家庭所作的井井有条和美丽大方的安排与陈设、任何严肃作品都各有独特的文体，或是在心情愉快时个人随意的遐想。人们从中得到一种印象：艺术鉴赏力是一种民族遗产，它已渗透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

1913年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搬到南京和我们同住，随后跟我们到了北京。起初，她认为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因而想与外界断绝来往，哪里也不去，但实际上她却成了我们国外侨民中一个最忙的人。她消息灵通，从不漏过一次她能参加的会议，她也喜欢同我们家各式各样的来客交谈。她是1874年圣诞节那天到上海的，不久便帮助兴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当时，穷人中只有那些真正赤贫的人才肯把他们的女儿托付给陌生的外国人，衣、食、书籍和笔墨等一切都免费供应。教学内容是最基本的。学校只规定了两个入学条件：不许缠足；学校有权否定一切婚约（当然是指由父母包办的）。在我母亲到达中国的第五十年，我妻子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庆祝圣诞节那天，我们整天敞开着家门，让学生们在这一宝贵的纪念日来拜见我的母亲，向她表示祝贺。当那些大学派头十足的女孩子们在各自的男朋友（其中许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世家子弟）的陪伴下，踏着轻快的步子迈进门来时，就象揭开戏曲的帷幕一样，将那些起始于杭州的女子教育的进展情况，一幕幕地展现在我母亲的眼前。

两周后，在她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病倒了，没过几日就去世了。由于我怀有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双重感情，我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将我母亲安葬在杭州我父亲和我的一个兄弟的墓旁。那时正值内战，我们不得不取道天津，由海路走。

（中国）政府友善地给我提供了一节原为慈禧太后而设计、带

有几条巨大金龙浮雕、装饰豪华的私人车厢，一直送到天津。我曾幽默地想，要是我母亲九泉之下还有在天之灵，知道她在中国得到了这样的送终，一定会欢笑的。

燕京的一位教师包贵思小姐是这样描写我母亲的：“她那和蔼可亲、愉快开朗的性格对我们这些认识她的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魅力。甚至在她八十高龄时，她似乎还有着无穷的精力，而又从来不庸碌奔忙，换句话说，她忙的都是慈善性的事。为此，我们大家都深情地爱戴她。我记得在整个燕园里，不管是教师或是学生，人人都同声称她为‘司徒妈妈’。不知道这称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是谁带头这么叫的。”

一年半后我的妻子去世了。她生孩子时身体受了损害，一直未康复，是个半残废，她最关心的是不要让她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影响我的工作。她与我的母亲和睦相处，互为补充，相依为命，生活得犹如一个人一样。我母亲的兴趣是精神上的，或表现在公共事务方面。我妻子的兴趣是操持家务，特别是能做一手标准的新奥尔良甜食，她喜爱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乐于为受难的人们做一些好事。那年，我们早就打算提前举行毕业典礼，以便在夏天雨季到来之前将学校迁到新校园里去。我的妻子知道她自己已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但坚强的意志力还是使她活到了毕业典礼之后。6月6日，在上学期结束后一周，正当燕大往新校址搬家的时候，她去世了。葬礼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医学院的小教堂内举行的，主持人是刘廷芳博士，仪式安排得体而周到。灵柩下葬在新校园附近的新燕大公墓里，她的坟墓是公墓中的第一座。

我婚后的美满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不想再结

婚了。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燕京已经成了我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家庭。学生们自己常常讲，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几位教师的妻子轮流帮助照管我的家务，我可以毫无牵挂地经常去国外或在中国旅行。

燕京最使我感到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修建校长住宅，这是费城乔治·柯里夫妇的赠礼。他们规定要按中国样式建造，位置要靠近湖边，居于校园的中心。我的妻子已经去世，我恳求他们让我住在学生宿舍里或教学楼里，可是柯里夫妇却坚持要建造一幢校长住宅，否则什么也不捐赠。后来我自己想出了一个主意：客厅、饭厅、两间卧室可以为大学公用，而我自己只留一个小套间。对这一安排大家都很高兴。这以后，每当我去费城，我总向他们说明柯里夫妇赠送的住宅就是我的家。这样，我们燕京获得了一幢非常漂亮舒适的校长住宅，我也结交了我一生中两位最要好的朋友——柯里夫妇。

我的独生儿子与我同名，他去美国上大学后，就在那里留了下来。他未曾经历我幼年时代从过中国生活又改为美国生活那样的不幸，这不仅因为我事先就下决心为他在这方面作好了准备，而且也是因为那时的南京和他生长的北京的情况与我幼年时代杭州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同时还因为美国人以四海为家的思想更为普遍了。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那一敏感阶段，他同中国的关系仿佛使他在同学和朋友面前显得得意和新奇。他对宗教的信念在静静地、正常地增长。刚进大学不久，他就问我对他毕生的事业，尤其是当牧师有什么

么意见。我劝他至少要等到他的大学课程学得差不多时再议论此事。他说他已经倾向于牧师这一职业，我警告他不要那样想，那是他祖传的职业，他应当处事谨慎，不要轻易接受上辈的事业。然而，在我确信他已经懂得了他所要做的一切时，我才告诉他我对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让他继承这一事业。

“杰克”（作者对其儿子的爱称——译者注）似乎通过华盛顿-李氏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弗吉尼亚里士满）上学，把教会的正常举止同年轻人健康的嬉戏玩乐和一般的人情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他对当时神学上各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传教士的使命所持的态度特别使我满意。他的个性，更别说我自己的偏见了，似乎表明他宜于留在南方。他同我的接触以及北京的环境使他有了比较宽阔的眼界，倘若他生长在典型的南方，他就做不到这点。同时他还学会了独立思考。我也曾经试图把我的一些思想和经验传授给他。结果他接受的只是争论双方属于真理性的东西，他所要强调的又恰到好处：按民众的需要讲道，还要宣讲牧师的天职。至于传教士的天职，这当然是他必然要正视的，他在这一点上，没有我当初那样的反感；另一方面，他所记忆的东西都是相当诱惑人的，虽然这些东西没有多少典型意义。不过，当时他已不象我过去那样，他似乎不再把对海外传教的褒奖作为圣职的理所当然的最高标准了。我认为，从我儿子的特别的资历和中国形势已有了变化的情况来看，他决定留在祖国工作是明智的。当然，他并没有象我过去那样经过了那么多的斗争。尤其是自从他母亲去世之后，我们是经常分离的，但是我们彼此的思想却一直十分接近，我们定期地互通书信，我感到

我不但对我孩子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他的思想境界都了解得非常透彻。我过去的许多理想在他身上得到了继承，他开头是在弗吉尼亚，目前是在密西西比萨密特“最南部”的一个教会里。

(四)

我经常回美国去，这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寻常的有趣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我在燕大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幸会见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次见到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那是在我在南京任教的时候。他听了我在华盛顿中央长老会的讲话，叫我去拜访他，给他谈谈中国的一些情况。我是带着九岁的儿子一道去的，他又高兴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根据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起的吗？”“不是的，先生，是根据我父亲的名字起的！”孩子这么回答说。威尔逊总统待人十分厚道，态度和蔼可亲。他给了约翰一张名片。名片上亲笔题了字：“送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他的朋友伍德罗·威尔逊赠。”这张名片约翰仍然保存着，配了镜框挂在他的书房里。

1933年我抵达美国时，正好听到了新总统就职后所发表的第一次炉边演说，那时正是银行倒闭，经济萧条发展到了惊人的严重地步的时候。没过两个月，我被召到了白宫，一定是罗斯福总统听人说了，有一个长期住在中国的人正在国内。那是在日本不适时宜地进攻上海使中国和国外舆论哗然之后不久。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正当经济萧条极为严重的时候，总

统却在考虑遥远的中国问题。他待人接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我坐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总统向我询问燕大的一些情况，然后谈了谈德拉诺氏一家与广东剪刀生意关系的问题，顿时使我心情轻松下来。我回答他说德拉诺夫人已在大约一年前不幸去世了，她是海军陆战队一个上尉的妻子，我曾在北京附近一座凄凉的日本人的公墓里，在极为凄惨的气氛中，为她主持了葬礼。谈到这里我已经不再感到紧张了。总统想了解，除了进行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入侵整个中国，他强调说要是发生战争，就会打上五年，因此必须尽量避免。由于话题逐渐深入，我反而感到我呆的时间过长了，真不知该何时或如何离开。但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外边的一个南美代表团也许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特·特罗布里奇院长所念的褒奖稿是这样写的：“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种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之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五）

我的生日通常都是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在

燕京时，在这日子，一些关系亲密的教师总是把我带到西山我们喜爱的一座寺院里去小住三两日，或者，由于有别的活动，他们就带我去昆明湖泛舟野餐。

我的六十岁生日就是由我的朋友们按照中国传统热闹地庆祝了一番，一个人不需要任何成就，只要活到六十这个年纪就可以享受一番这样的喜庆。

我不打算自己来描写那次做寿的情景，而愿厚颜不断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傅晨光所写的题为“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的报道。

傅晨光博士写道：

“在中国，六十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远自商代起它就是用来记载中国历法的一系列干支名称的结尾。那些用来表示年、月、日、时的六十个干支名称多次出现在殷墟甲骨上。殷墟甲骨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物，在燕京的哈佛-燕京学社博物馆中藏有一块刻着全部六十个干支名称的这种甲骨。人们看重这一轮回在中国思想和生活传统中的重要意义，所以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们的整整一年来一直在盼望着他们敬爱的教务长约翰·司徒雷登一生中这样一个轮回的到来。那些精心的准备工作在1936年6月24日教务长生日那一天，和23日在燕京举行的盛大寿庆会上达到了高潮；燕京的校友们在中国其他许多重要市镇也举行了集会来庆祝这个日子。其中最突出的是上海校友会的聚会，为了使其成员到会更方便，那次聚会是在6月21日星期六那一天举行的。到

会人数达二百五十人，由商务印书馆的国外部编辑张天泽主持。

“燕京的寿庆活动是从6月23日的盛大宴会开始的。博伊德体育馆是这一聚会的理想场所。一长排U型餐桌的四周共坐有二百八十六人。参加宴会的人包括大学的全体行政和教学人员、大学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以美国纳尔逊·约翰逊大使阁下及其夫人为首的几位贵宾，同时还包括北京各大学的校长及其夫人、北京各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中华医学学会的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家首席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

“送给司徒校务长的很多对联和锦旗，一律是鲜艳的红色（表示喜庆的传统颜色），其书法均十分优美，装饰在墙上十分得体。一共有四十九幅这样的表示庆贺的对联和锦旗，首先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的一幅，同时还有全国各地校友会送的，全体学生送的，女学生们还别出心裁地送了一幅。长茎的彩色蜀葵花（这种花校园里很多）与锦旗交错地布置在墙的四周，在主席座位的后方是一大枝美丽的开着金色花朵的灯笼树。

“客人们进场时由接待委员会迎接，他们送给每一位客人一张作为纪念的当晚的节目单，单子上有我们的美丽的宝塔剪影，注有客人餐桌的座位号码，还印有司徒博士一生的简历，这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由刘廷芳教授依着一年一年的顺序编写的。头顶上挂着中国式的灯笼，红烛和花束交错地放置在餐桌上，使整个筵席既显

得美观又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大家围席而坐，谈笑风生，人人都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恭贺喜庆之情，这种心情在当晚两位代表的祝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代表西方人致词的是美国大使阁下，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致词的是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最老的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校长的祝词是用中文讲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是因为客人们都会两种语言。他以严谨贴切的言词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一些突出的品质，特别指出他生性热情开朗，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就象春天的太阳使万物苏醒一样，他这种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友谊。蒋校长特意谈到，宗教精神在司徒博士的性格中占着主导地位，但没有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种表现在传教士身上的狭隘性。他钦佩司徒雷登真正代表了耶稣精神，赞扬他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司徒校务长有这样一个理想：要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和管理的中国学府。我们之中那些还记得早年反基督教运动席卷中国期间燕京情况的人们将会感到，这位不信教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在谈到促成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事们在燕京取得成就的宗教启示时，用语是那么亲切和真诚，这是很有意义的。

“晚宴的主人是燕大校长吴雷川，虽然在蒋校长致词之后他就打算宣布散会（显然是按预先的指示做的），但是客人们拒绝在听到司徒校务长亲自讲话之前离开。

最后司徒校务长不得不站起来，作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回答，他说，大家对他的赞誉他实在受之有愧，因为他很难相信自己是这样一个受人瞩目的中心。他说，整个事情只不过是按照中国的美好礼节，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和关切，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正是这种关切使人只要活到六十岁就有机会受到恭贺。也许，宴会的所有参加者——更广义地说燕京大家庭——自发而出自内心的喜悦，比任何正式的恭贺更好地表彰了司徒校务长的生活与其做人的品德。

“6月24日，大多数人开始到校务长家里去向他祝寿。他那美丽的中国式的三合院装饰得很美观，门的上方贴着一个大‘寿’字，意思是长寿，寿字的四周是放射光芒的彩带。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电灯使一切装饰显得更美。那些装饰品，尤其是彩灯，是发电厂的职员送的生日礼品，突出地说明了燕京生活中教职员和学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那天下午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学校里的勤杂人员赠给司徒校务长的一块‘匾’——中国人用来表示赞美的一种典型方式。那是一块刻有贺词的油漆木板，书法极其优美。赠‘匾’仪式结束后，就挂在受‘匾’人住宅门楣的上方，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受人尊重。在赠送仪式之前，通常是由人们排队抬着‘匾’，带着乐队，穿过大街到受‘匾’人住处去。这次，‘匾’是由人们抬着在整个校园绕一周，由乐队开道烘托气氛，使整个场面变得有声有色。领头的是学校工人里的工头和一个住宅区的看门人，几乎全校的勤杂人

员，学校里和附近村里的孩子都参加了，愉快的行列绕着校园和住宅行进，最后到了校务长的家，在一片爆竹声中，赠‘匾’仪式圆满结束。工人们被邀请入客厅饮了酒，这同半小时后去那儿饮茶的有身分的校长和贵客的待遇是完全同等的。接待委员会的女士们讲，有史以来没有那么快地饮用过那么多茶水。‘匾’上书写的是‘有教无类’。

“工人们赠完‘匾’后，紧接着，两位打扮得象中国小乡绅的小学生领着学校的孩子们又赠送了一幅对联以表示他们的恭贺。

“寿庆日是以贝公楼举行盛大文艺演出会作为结束的，节目丰富多彩，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校务长手捧鲜花由人们陪同着走到大厅前面，戏幕随即徐徐升起。第一个节目当然是致祝词。祝词首先赞美这位校务长说：正如他成功地筹备资金创办了燕京大学一样，他的品格也代表了燕京的精神。接着，致词者向校友们表示了问候，最后又向四年级学生告别，指出他们在这国难深重的一年里所起的重要带头作用，同时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很好地发扬光大燕京精神；祝愿他们象校务长一样成为开路人和团结合作的中心。祝词完毕之后，校务长亲自登上舞台，学生团体向他赠送了一幅精美的象征‘壮心不已’的刺绣像，由两个女学生举着穿过了甬道，之后，座无虚席的全场观众起立，恭敬地向校务长行了三鞠躬礼。校务长用中文作了恰如其分、措词得体而又谦虚的答词。四年级学生代表也致了词，然后

就开始演节目。

“演出从七点半开始直到午夜之后才结束。那天晚上，司徒雷登虽然劳累了一天，但他仍以经久不减的兴致坐着看完了全部节目，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例证来说明，正是他的谦恭有礼，处事老练，使他受到了中国人的如此爱戴。大约十一点半左右，断断续续参加整个晚会的笔者，在贝公楼的台阶上碰见了一位出来换换新鲜空气，负责这次演出的学生委员会的一位姑娘，在回答我关于节目的演出情况时，她带着敬佩的惊叹语气说：‘司徒校务长仍然在前排坐着哩。’”

应当说明，司徒校务长曾有言在先，他不要人家给他送礼，如果大家要为他祝寿，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向司徒奖学金会捐赠。这一要求无法劝阻人们赠送对联和锦旗。不过，教师、学生和工人都为该奖学金会作了大量捐赠。

六、中国舞台上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他们摆脱了原来的社会环境，同传教士结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的眼界通常是狭隘的，与其雇主相去不远，不过他们对教会内外的本国人倒有着切实的了解。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在南京市，我最初结识的密友自然是神学院教师中的中国同行。他们是教会培养出来的有才华的人，相互之间更为平等。我的私人教师或文书是一位典型的儒学先生，经过多年的密切交往，我们建立了愉快而亲近的关系。我不但逐渐熟悉了神学院和金陵大学的学生，而且也慢慢认识了金陵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南京的一些市民。神学院有位教师，一位第二代的基督徒，曾是我幼年时代的伙伴。他在之江大学学完英文后进了邮政局，后来才决定从事基督教工作。

到南京不久，我认识了郭秉文博士。他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女总管的儿子，早年曾留学美国，成绩优异，是带着哲学博士学位回中国的。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他搜集了大约五十来名归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突出的专长。他是按美国的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但在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我简直不知道还有这一类中国人。差不多在这同时，我见到了王正廷（后来成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外交部部长和驻美大使），听过他的演讲。王正廷的父亲是宁波安立协会的传道士，他通过“帮佣”和“生意人”的门路进了传教士的家。他所受到的低下待遇最初使他对基督教极为反感，虽然他后来成了坚定的基督教世俗领袖。

在我迁往北京之前的那些年里，我结识了不少从西方回来的留学生。我与他们志趣十分相投，不过，我也不是不了解他们的缺点，不是不知道他们由于学到了人们所渴求的新知识，或获得了可以借以取得高报酬工作的学位而在中国社会上享有过高的虚名。这些学生学了一些在中国用不上的理论知识，追求高职高薪，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有时也吃苦头。不过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男女为国效力，也很难想见中国怎么会取得今天这样的进步。

（二）

我作为传教士，从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其民族主义

的觉醒。过去她可能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是在屡遭外来的欺凌之后，她苏醒了。海军被日本击溃，义和团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去到中国的前十年。当时人们普遍担忧国家会被列强瓜分。如今我们差不多把那时完全可能发生的事都忘记了。这主要是由于海约翰^① 为美国制定了政策才阻止了这一事态的发生。这一点却是当时人们不曾充分注意到的。

日俄战争结束于我到中国传教的第一年（1905年）；中国青年普遍在探求有效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他们大批地涌到日本留学。清王朝已变得摇摇欲坠。

我搬到南京那年（1908年），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继承王位的是一个与我三岁的儿子同年出生的幼儿。生活中飘荡着一股革命的气息，人们进行着秘密活动，并不断地遭到镇压。但是这种活动仍在继续扩大。三年后（1911年10月10日），时机尚未成熟革命就爆发了。它没有周密的组织计划，却轻易地席卷了全国。当时唯一有阻力的地方就是我所在的南京。我们经历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学生们大多数都剪了辫子，可是一旦被发现，就有立刻遭杀头的危险。每天，在靠近长江的那扇城门放行的时刻，所有教会学校里的西方教师就齐心协力把那些没有丢掉的辫子逐个地别在男孩子们的帽子上，领着他们从守门的卫兵身旁通过，将他们安全护送出城。由于找不到搬运夫，同时孩子们也得当心不要弄掉了那些别得不太牢的辫子，所以我

^① 海约翰，1899年美国臭名昭著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炮制人，当时任国务卿。——译者

们常常帮他们扛行李。

孙逸仙来到南京后，我临时担任了合众社的记者，有幸经常见到他。

我是1912年南京临时国会唯一在场的外国人。孙博士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谢绝了总统职务，原因是他久居国外，不宜由他出面来主持政府工作；出于同样原因，他还主张由袁世凯（他曾说服皇帝退了位）担任这一职务，条件是袁要保证支持共和政体。孙博士的年轻的追随者激烈反对这一主张，他的老同志也忧心忡忡，但他的主张还是勉强为大家接受了。后来证明这些人是对的，因为袁世凯背弃了他们。袁在亲友的怂恿下，妄图当皇帝（但未得逞）。我认识袁的侄女袁宝琳，她曾把上海报纸上一些捏造的社论文章念给我听，这些文章敦促他伯父登基当皇帝，使袁认为那是“人民的愿望”。

在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我一直同那些胸怀革命理想的核心人物保持接触。我深信孙逸仙是绝对诚心诚意的，无疑也是大公无私和爱国的，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间太长了，对国内的事情生疏了。不过他的影响却使共和政体在各次内战中保存了下来，他于1924年发表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成了他的助手蒋介石领导的1926——27年革命的宪章。1925年，孙逸仙因患癌症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为他举行的殡葬仪式是基督教式的，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

孙逸仙夫人（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的。后来她感到她的亲属违背了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现在她在该政府中担任

着一个很高的，但只是名义上的职务。

(三)

1919年春，我们访问了北京。那时，民情沸腾，学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5月4日，一批学生代表冲击了三个官员的住宅，这三个人由于帮助日本人而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他们仓促地收拾好细软，带着家眷逃到了安全的使馆区。学生领袖遭到了逮捕，关押在一所临时改作学生监狱的法学院里。他们的同学呼叫着要同他们一起坐牢。这一运动顿时在中国各地蔓延开来。地方监狱很快就出现了人满之患，而更多的学生仍在要求进监狱。风雨飘摇的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如果政府将参加这场真正的爱国运动的学生当罪犯处治，那么，它实际上就宽恕了亲日的卖国贼，那将是舆论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确认学生的爱国行动，那么它就否认了自己官吏的忠诚，同时日本人也可能施展其可怕的力量进行报复。于是那位年迈而又诡计多端的总统遂命令将学生释放，可是学生们却象腓利比的保罗^①一样，声称如果不正式释放，并撤消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就拒绝出狱。而那样一来，政府势必丢面子。

当时我已答应去北京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并在附近一所卫理公会的大教堂里向毕业班学生讲道。那时徐世昌总统已经妥协，答应派两名高级官员去“慰问”学生，然后就释放他们，而且正好选定了我讲道的那个星期天上午作为举行

^① 基督教使徒圣保罗。详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译者

释放仪式的日子。在被捕学生出狱时，所有的同学都要去迎接他们，然后在凯旋声中护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原先是准备给毕业生讲道的，这下不得不仓促应变，在寥寥无几的一般学生集会上讲道。这是我首次与我未来的学生打交道。第二天早上，当我真个与他们相见时，我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明确地表示了我由衷的同情。其后，在所有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求参加类似的示威活动时，他们是知道我的态度的。在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那个时期，我与学生在思想上有了共鸣，这对燕京大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

到北京后不久，我就努力着手同中国官员交朋友，让他们了解我们办这所教会大学的目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捐款，以使他们表明对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善意。许多官员都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大财之后告老还乡的。在明清时代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官的都可以捞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惯例的限制罢了。共和国初期，这种传统和习惯继续存在，除了敌对军阀的威胁之外，不受任何妨碍。日本人为了在中国制造混乱，便有意地助长这种腐败行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健全了政府组织机构，也改进了税收和财政管理方法。在那样一个各种利益相冲突的时期内，我感到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结识他们的各个劲敌和近侍。

颜惠庆博士是一位主教派教会牧师的儿子，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曾留学美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位杰出的人物。

他曾到许多国家当公使，还担任过北京政府的总理。他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品格远远在一般人之上。他担任过多年的燕京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也曾当过董事长。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力促他帮助我们筹集资金，以便建造一幢男生宿舍。正当我们往燕大校园搬迁的时候，1926——1927年的革命爆发了。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很快征得了颜的同意，由傅泾波设计，把筹集的钱改用来为校园修了一堵围墙，以便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保护好校园。

我早年认识的另一位完全不同类型的官吏是内陆省份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将军。燕大的校园就是他卖给我们的。他还免除了三分之一的价款，条件是我们留出一块地方给他年迈的父亲修建一座别墅，以便日后改成一座纪念堂。他建议我到西安去一趟，给临时分管教育的人出出主意；我也十分渴望去那里冒一下风险，于是，1921年初春，我就出发了，对此行可能产生的结果心里充满了各种天真的想法。我随身带了个佣人。我们乘京汉路火车到了这条铁路线和正在修建中的从海边通往西安新线的交叉点，然后沿新线一直到头。从那里又取道陆路走了一个星期。由于我们要通过一段土匪出没的地区，督军事先派了一班士兵来护送我们。他们为我们备有一顶骡轿（两头骡子架着几根杆子，上面安着带有顶篷的框架，框架上铺着褥子，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下一两名乘客）。我和我的佣人很走运，督军还额外为我们配备了一匹马。我乐意骑马，我的佣人则喜欢懒洋洋地躺在骡轿里。这样，我一路上就有机会看到中国这一尚未受到外来影响的农村地区的生活情景。

作为督军的客人，我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这一古都的名胜古迹，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省长和督军联名为我举行了一次正式宴会，两位主人并排而坐，各吃各人专做的饭菜，以防被对方毒害，坐椅后面还恭恭敬敬地站着各自的卫兵。有一名卫兵不小心把枪掉在地上，顿时引起了一阵惊慌。随后两位地方长官又亲切地攀谈起来，好象是最要好的朋友似的。

我被唐代古都及其郊外的景色迷住了。我考虑着如何发展这一处女地的教育事业，如何在这位督军办的中学与燕京大学之间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我离开时，督军送了我一匹马由我随身带回。但是在我尚未抵北京之前，就听说那位省长把他的同事推翻了。不久督军就回到天津当了平民，我常去那里看望他。整个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时局的混乱和毫无意义的个人权力之争。

（五）

内战时期的另一位省长是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随伯顿教育委员会前往观光的时候。后来我曾去拜访过他几次，对他的能力和品格留有一般的印象。他开初想当“模范省长”，后来幻想破灭了。人民还没有作好改革的准备，加之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戏弄他。他宣布山西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分治的。他一度反对过蒋介石，因而曾不得不逃往日本。嗣后，日本人采取笼络手段企图将他拉过去，可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转而效忠于国民党的事业。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助他打开该省工业发

展的道路。正在拟定某些计划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孙传芳是江苏省省长，曾经同毗邻的浙江省省长打过仗，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被蒋介石击败。他在一次谈话中问我：“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我说：“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多谢你的好意。可是你的来意是什么呢？”

“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

当时孙将军对捐款之事显然不感兴趣，他站起身说道：“日后再找个时间见你吧。”不过他还是给燕京捐了一百美元，后来又捐了二万美元。孙将军的一个儿子随后上了燕京，学习很刻苦。在日本发动入侵时，他离开了燕京，去从事爱国活动。后来孙将军本人退职隐居了，一次在佛教寺庙里拜佛时被一个女人枪杀，这个女人的丈夫过去就是他杀害的。

韩复榘是一位闹独立性的省主席，在国民政府属下继续掌权。他肃清了山东的土匪，尽管有些专制，但在许多方面他是进步的统治者。日本人经常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想对日本人采取强硬态度，但是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支持他。

1935年，韩主席请我和傅泾波去见委员长，以弄清他的态度。蒋一上来就大发雷霆：“地方省主席无权过问全国的政策，他们应该做自己份内的事，全国性的事应交给适当的权力机构去处理。”

我回敬他说：“那都是抽象的原则，中国数百年来一直是由个人支配的，而不是按法律行事。所以，对个人的忠诚是最要紧的。如果你愿意建立个人关系，眼下就有一个人会成为你的真诚朋友。”

蒋又发了一通火，不过最后松口说道：“好吧，你们去告诉他，只要他坚决顶住，我是不会让他失望的。”

我们一返回济南就劝韩去见蒋。韩果然去了，同蒋谈得很投机，并取得了谅解。后来蒋派了他本人的代表去山东，以便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对1937年日本发动的进攻，韩不是坚决顶住而是动摇了。他带着部队撤到西边去了。蒋委员长派人把他召至南京，由军事法庭审判后把他处决了。

宋哲元省主席的遭遇也差不多，只是他最后被迫自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他管辖河北省(北京的所在省份)期间，不断地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左右摇摆。我想说服蒋委员长，只要给以适当的支持，宋就会忠于他，就会抵抗日军。卢沟桥事变之后，蒋催促他带着部队到河北省会保定府去立足。可是在遭到日本人的闪电袭击之后，他在夜里溜走了。如果宋听从了蒋的命令，华北的形势就会完全是另一种局面。后来宋后悔了，他向入侵华北的日本人进行了抵抗，可是已经晚了。

(六)

在张作霖元帅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张学良时代，我曾多次去满洲访问，父子两人对我都很友好，对我们燕京捐款的呼吁有求必应。我初次见到张作霖时，他坐在一把宝座似的椅子上，旁边有两只形象逼真的布做的老虎。张个子矮小，却

有一双清澈、乌亮而敏锐的眼睛。他原是一个村落的民团头领，而后逐步建立了他个人的地位。他和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是从未完全屈服于他们。1928年4月，他一度占领北京，但随后又被赶了出来。

1928年6月，我取道欧洲和西伯利亚铁路急忙赶回燕京参加毕业生典礼。刚到沈阳就从苏格兰传教士朋友那里得知了这位未曾加冕的满洲国王的厄运。他从北京返回的途中，正当他的火车通过离沈阳仅几英里的一座桥梁时，发生了爆炸，他受了重伤。传教士们对我说，他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一消息是他们从医生那里打听到的，虽然城里还在传说他的情况有了好转，而且当局还下令要大家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他的年方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张学良飞回沈阳继承其父位。后来张学良告诉我说，那次他父亲乘火车返回时日本人三次想说服他签署一份文件，以便大大扩展他们在南满的权利。最后一次甚至警告他，他不签字就不能活着回沈阳，一位察看过爆炸现场的英国工程师从技术上向我说明了这一事件为什么一定是日本人制造的。当那位老师的死讯宣布时，日本人早已集结了四万大军在等候“恢复秩序”。

所以，不论张作霖有什么缺点，他是作为爱国者献身的，而他的人民正是通过虚构和传播他已康复的说法才挫败了日本人取而代之的阴谋。他的死讯是在我返回北京几个星期之后宣布的，少帅还告诉我日本人如何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前来吊丧，在追悼会之后他又如何秘密地拿出那同一份文件要他签字。张学良向我描述了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对方开枪。这些细节揭示了三年后的“沈阳

事件”（一次同样捏造的铁路事件）以及日本人对沈阳所进行的无耻劫掠的真相。

那次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转折点。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少帅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事情一拖，日方的四个上校耐不住性子了，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于是便凭着虚假借口，以天皇的名义一举控制了整个满洲。

当时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通过横贯大西洋的电话线就是否提出抗议的问题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进行了商议，可是后者回答说他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我是知情人，我相信如果这两个国家带头采取强硬措施，那么，日本政府本可能宣布它的下属擅自行动与自己无关，在那个阶段它是完全可以体面地这么做的。但是在国际联盟最后受理此事，派出利顿委员会去进行调查时，为时已晚。日本人已试探出列强国家不愿卷入，同时也缺乏团结。墨索里尼看到了这点，于是侵占了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内战是第二个后果。不久希特勒也借机效法。所以，这一切本来也许可以通过在满洲采取果断、严厉和一致的行动而加以避免。1931年9月18日，即沈阳事件发生的那天，成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学生）的国耻纪念日。从那以后，“九·一八”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特色。我感到从海外吹来了一股昏暗的瘴气，在华北的大地上弥漫，给人们带来了灾难。

1936年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扣，凡是了解少帅的人都感到，除了出于爱国的动机之外，他采取这一行动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不管是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交谈中，张学良都

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错了。这一点用不着再争论了。尽管他所采取的手段是笨拙的、不合适的，但他的本意是要结束一场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国内冲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七）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舞台上二十多年来一位有趣的人物，有时人们称他“基督将军”。他身材魁梧，面庞宽大和善，性格坚强，气质活泼，待人诚挚。他凭一时的激情成了基督教徒，一直是一个未成熟的，徒有其名的信教者。早期，他的部队就和克伦威尔的部队一样，组织纪律十分严格。基督教的随营牧师曾一度在他的部队里服务，但是在他被张作霖打败之后，所有的随营牧师全不见了。冯将军由信仰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然后又回到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抗日战争中，他是热忱的爱国者，但是从未担任过任何真正的要职。抗战胜利后，他又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心，而且十分蹊跷地死在去俄国的路上。

我初次认识他是在北京，当时他正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蒋介石政府。后来他到了南京，得到了一个职位，接着又牢骚满腹地引退回到山东省著名的胜地泰山去了。我和傅泾波曾去那儿拜访过他一次。他正在攻读一部古典著作，正练习他那著名的书法。“如果他们不计较分歧，我就回南京去，”他强调说，“只要他们抗日，我什么都愿干，担任最高职务或最低下的职务都无妨。”

另一次去看望他时，适逢我肩关节发炎，左胳膊挂着绷

带。他知道我的病情后，立即拿出两贴膏药，那是从北京一家有名的药铺买的，他一直带在身边。膏药是用熊脂和虎骨粉配制的，他坚持要亲自给我敷上。我露出肩膀，让他在肩膀前后各贴上一张，而且还让一名助手照了张相。或许这种膏药如他讲的那样灵验，或许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治疗有方，也或许是由于离开了南京那种潮湿的天气，待我回到北京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在重庆的一次招待会上冯将军十分幽默地讲述了此事，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我在重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的一生》的中文译本。他详细地谈到了我们那八个革命年头里的一些事，诸如卖国贼、债务、挨饿、受冷、日益减员的军队等等，同时他又补充说：“我们中国人没有经受过那样的苦难。没有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就不会走一段更漫长的路。”

（八）

1933年，李宗仁将军和白崇禧将军同广东的陈济棠将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陈及其一伙腐朽透顶，只想和南京政府实行权力分治，这样他们就可以大肆贪赃枉法。另一方面，李和白则是思想境界高尚的人，他们是爱国的，但是又怕蒋介石姑息迁就日本。那时我曾同李将军作过两次长时间的交谈。我说：

“如果你相信蒋不会向你进攻，而且他会抗日，那么你愿意支持他吗？”

“愿意。”

我继续说，“我是相信他会抗日的，白崇禧怎么样？”

“他是个更难对付的人。不过可以把他争取过来。”

“那好，”我最后说道，“我会以事实使你们二位心悦诚服的。”

回到上海后，我同几位国民政府官员谈了这件事。其中一位说：“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不断地派出特使去他们那里，可是，都没成功。”

我回答说：“我知道没成功。但是这件事必须办好。派宋子文去怎么样？我相信，如果去一个重要人物，你们就能够打破李宗仁、白崇禧同陈济棠的联盟，并能取得李、白二人坚定的支持。”

宋子文忙得不可开交。我问宋是否可以让蒋委员长走一趟，宋当即回答道：“那太危险。”

然而，蒋最终还是听从了李宗仁他们的安排，亲自去见了他们。从那以后，蒋同李、白二人便成了至交，在抗日期间合作得很协调。1948年，蒋介石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

汪精卫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人，他能说善写，待人殷勤周到，但缺乏基本的做人的道德品质。他从未摆脱他那革命家加冒险家的矜持心理。他是同重庆的国民政府决裂而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唯一国民党要员。他离开重庆去日本，失去了爱国的仁人志士的拥护，后来又同意领导设在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这是他可悲的错误。也许他还自以为是伟大的和平运动的英雄呢。就我所知，他这么做的动机似乎有三方面的原因：在许多问题上他同国民党首脑确实有意见分歧；对蒋介石极端妒忌；对战争抱着一种病态的恐惧心

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死于东京，落了个可悲的结局，没有任何中国人对他的死表示哀伤。

(九)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刚建立不久，我访问了南京，结识了新政府的领导人。当我通过孔祥熙博士第一次见到蒋时，他那好支配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也会见了新政府的大多数要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热切地希望实现孙逸仙的理想。这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那年年初，蒋委员长作出了一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孙逸仙看到共和国在军阀混战中遭到了削弱，决心从广东向北京进军讨伐，以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他向各个国家求援，其中包括我们的国家，但是没有得到理睬。只有苏联作出了响应，他们派出了以极其能干的鲍罗廷和盖伦为首的顾问们，并提供了其他援助。从1920年开始，他们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这一改组在1925年3月12日孙博士去世之后仍在继续进行。北伐就是他们规划的。他们隶属于沿广州——汉口铁路进发、并在后一城市建立了临时政府的那一支部队。那次进军伴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大肆烧杀。

委员长带领另一支部队沿着靠海的一条线路北上，在进军的途中他决定与俄国顾问们决裂，执行独立的政策。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殷实的产业阶级的支持。当然，委员长从此给了共产党人以现成的口实，指责他把自己出卖给了资本

家。这一事态的直接后果是，武汉三镇积极活跃的临时政府被解散，俄国人和一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被赶回苏联。其中有孙逸仙的夫人和她那位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男学生。孙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断定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灵验药方（尽管许多说法与此相反），于是又带着随员到了柏林，大约一年之后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们。

1927年3月24日，即委员长反叛的前夕，武汉政府中那些强烈主张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企图派遣一支部队去南京，把那里的外国人统统杀掉，以便使委员长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困难。大部分外国人都是传教士，士兵们发现他们待人友好、心无猜忌，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正义感，谁也不愿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我的弟弟沃伦代替了我在神学院的教职。他的妻子和其他妇女已经送上了停泊在江里的美国军舰，但是所有的男人仍留在各自的岗位上。沃伦正在他家的大门外同一群士兵谈话，劝阻他们不要采取暴力行动，这时远处一个士兵瞄准他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他身后的木头上，飞溅出好些碎木屑。在这紧要关头，人群中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上前去劝他逃离。这人是三轮车夫，以前生病时沃伦曾待他很友好，因而就跟着他走了。这人把沃伦带到了他那肮脏的草棚里，嘱咐他的邻居不要声张。他收拾好了沃伦的贵重物品，把沃伦藏在他自己的破烂被褥里，拿出他自己仅有的东西给沃伦吃。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向沃伦报告说，金陵大学的学生正在寻找外国人，要把他们送到学校里去，那里更安全。他归还了沃伦的贵重物品，并把他护送到学生那里。

金陵大学副校长，我的亲密朋友约翰·威廉斯被杀害了。另外还有五名死难者，分属四个国家。受重伤的也有好几位。最叫人吃惊的是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我父亲在布道团里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带领了一批人出逃，他们从清凉山翻越过了城墙。其中有著名的女作家厚巴德的丈夫，他从墙头上拉着绳索往下降时，落地松手的一刹那把脚脖子崴伤了。

整个阴谋真是野蛮之极，它的企图就是要使委员长受挫，不然，委员长的主意一变，中国的苏维埃化就必定要推迟二十多年。事有凑巧，在出事的前几天，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约翰·麦克默里先生邀请我下次进城时去看望他，就在出事的那天下午（1927年3月24日），我正好在那里。他打算向我了解，如果在长江流域这一敏感地区发生了地方性事件，我是否认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全国各地会爆发排外情绪。我说我认为不会。那天晚上，学校里一位中国教师打算在自己家里展出他所收藏的油画，要我前去参观。就在我要去之前，一位美国同事从城里给我带来了广播消息，说是在南京的一次大屠杀中所有的外国人均遭不测，他不知道我有个兄弟在那里。尽管我很悲伤，但还是决定去参加画展。第二天早上我才从麦克默里先生那里得知沃伦并未受到伤害。

还是回过头来谈委员长吧。从1927年一直到今天，他始终坚决反对把俄国的共产主义当作中国的政治哲学，反对把它当作政治纲领在中国推行。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尽管共产党挑起内战，日本进行侵略，但是中国仍然逐步取得了统一，在经济和其他方面也曾照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我逐渐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地产生了崇敬心理。1936年12月，委员长被莫名其妙地扣留于西安，圣诞节那天终于获释，我当时和中国人同样感到欢欣鼓舞。

(十)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好些地方都提到了傅泾波，而且往后还会更多地提到他。要是不用一节来写写他，也无法完整地叙述我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我与中国官方人士的交往。

大约在1919年我们迁往北京去的时候，一位即将离职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将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郑重拜托给我，他认为这孩子是他圣经班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大约一年前，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这孩子也参加了。在那遥远的年代里，在那样的场合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我也应邀发表了演说。虽说他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之间随后形成的亲密关系也未曾把这种光芒全部驱散掉。他成了燕京的新生之后，我的母亲、妻子和我自己都在尽量关心他。在他为了帮助他父亲去从事倒霉的商业冒险而不得不休学一年半时，我们更加担心。他复学时，身体十分虚弱，给家庭的事弄得沮丧不堪。他是满洲一支王族的后裔，清朝推翻之后，他的家庭失去了许多财产。他那不会做生意的父亲经营过各种商业，都不顺手。这孩子过分夸大了我们对他的精

神复原所起的作用，因而对我们感激不尽。

泾波六岁时，曾跟随当时还在当官的祖父到朝廷里拜见过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永清，意思是“永远洁净”，但也可以解释为“永远忠于满清朝廷”。这就是他在家和在亲朋好友之间的名字，而一般都叫他泾波。泾波是指甘肃省的一条主要河流，他的祖父曾经当过甘肃省的巡抚。他好象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我也由此受益不浅。曾经有人力劝他当牧师，但是我劝他不要这样做，我说凭着他特有的才能，他可以把基督教的教义贯穿到政府工作中，从而做出更大的成绩。

他的才干很快被政府官员发现了，他们都请他去帮助完成各种各样的使命。蒋介石在南京就职后不久，曾几次请他去秘密执行使命。其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少帅张学良从日本人的讨好卖乖中争取过来，把满洲纳入国民党中国的版图之内。泾波一到沈阳就被日本间谍盯梢上了，他们把他带进厕所，剥光了他的衣服要搜查文件，并且不断地追问他。1929年12月底，少帅在他的司令部升起了国民党旗，宣布了他的决定。泾波还数次受命去美国，见到了他所要见的美国要人，而且似乎还取得了他们的欢心。当时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为他安排了一次对胡佛总统礼节性的拜访，结果胡佛总统同他的交谈远远超出了预定的时间。他曾偶然对我讲起这件事，我问他是否了解到这是一种多么例外的礼遇，他显得十分惊奇。他第一次去美国时我碰巧也在美国。他问我他的名字怎么叫好，当时，按一般的拼法拼作 Fu。他说旅

店的服务员和女电话员总是问他，“Fu 什么？”我提议他告诉他们 Fugh。从那以后，他就再没碰到麻烦了，而附加的两个多余的辅音从此也就固定下来了。

泾波二十四岁上，由我做主婚人，娶了他父母为他选中的新娘。婚礼是在一家专门为此租用的大饭店举行的，把旧中国张灯结彩、设宴长饮的婚礼仪式同基督教简单庄严的婚礼仪式结合了起来，办得有声有色。

在燕京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努力为燕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争得一个受人欢迎、为社会公众承认的地位，使它的存在既不依赖于西方的条约，也不需要美国的保护。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想的不仅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想求得一批中国资助人。泾波迅速体会到了我的意图，主动帮我的忙。他不时从公务中抽出身来。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大交朋友的运动。我们从满洲到香港走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到了中国的大后方重庆和其他地方。我们打响了筹集资金的第一炮，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捐献资金的承诺。但是，对日本侵略的恐惧心理和后来由这一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现实，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然而，我们所获得的成功却在各个方面对燕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我们所到之处都有一些燕京的毕业生，他们总是给予我们热情接待。要不是战争中断了我们的努力，他们在我们后来打算开展的运动中都会发挥核心作用的。

我在燕京大学的同事们自然怀疑泾波对我的忠诚。怀疑

他一定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想证明他有当官的野心，想利用我去结识那些高官显要，以便为他自己谋个优厚的职位。他们经常警告我要注意提防。这种担心是十分自然的。可是，我知道事实正好相反，泾波不用我任何帮助就能轻易地找到差事。除了对我的友情之外，他对美国人和我们的国家都是很喜欢的。在他看来，增进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似乎正是他所能从事的一项爱国事业。而且这仍然是他今天的主要热情所在。政治上的机敏和完美的品格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带来找职业的机会，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叙述泾波在把我从日本人的拘留中营救出来，以及在我战后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十一）

还有一个人物，他使我想起我早年和晚年地位的变化，那是颇有戏剧性的。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人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的进行

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她矍铄的精力，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她已有十七个孙儿孙女去那儿学习过，而且还有更多的要去。

七、日本占领与自由之岛

中国历法的月份是用数字表示的，几起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双重日期上。比如10月10日的国庆节就叫双十节。所以，当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北京近郊制造另一起捏造的事端时，它就成了人们所憎恨的“七七事变”。也许日本人看到委员长的建国统一事业节节进展，感到必须立即予以打击，不能再拖延了。7月28日他们占领了北平。那天清晨，日本人轰炸了我们校园附近的一个兵营，把我惊醒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空袭，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校园里人人惊恐万状，连最荒诞的谣言亦信以为真。

我所面临的一个紧急问题是，跟其他大学一样迅速撤退到中国大后方某一地方去呢，还是不顾一切后果留下来。谁也无法预言日本人往后的做事行径。我曾同各方面的朋友商讨过，大家对问题的看法都很清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决定留下来。中断了的入学考试又恢复了。在我们那高高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过去我们只升中国国旗或燕大的三角校旗。

几乎每天都发生事情，尽管都是些小事，但总有酿成严重乱子的可能。尤其是双方语言不通，占领军是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土上，他们自然就会有一种狐疑心理，出乱子的可

能性也就更大。我很快找了一位我们的毕业生来帮忙。由于家庭关系，这个学生在幼年时代和大学毕业后都在日本上过学，他讲日语跟当地人一样流利。在我们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经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极宝贵的作用。我们在确定他的地位时碰到了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足够高的地位方能使他便于去同日本人打交道，而同时又不要伤害那些年纪比他大、学历比他深的中国教师的感情。教师和学生对入侵者的憎恨十分强烈，看见他同那些可恶的入侵者打得火热，几乎把他也当成了敌人。

在那种微妙的形势下，为了改善关系，我总是随时照他的建议款待日本军政官员。日本最高司令部不时安排一些本国的代表团到华北访问，以便加强文化上的控制，同时，也可能是要向他们国内的人显示他们自己的功劳。他们总是把燕京列在访问日程中；我不得不强求我的西方同事帮我接待这些来客。偶尔也请一些中国人出面接待，以此来表明我们的亲善超过了民族自尊心。代表团有商业方面的，教育方面的，甚至还来过一批基督教牧师。这些牧师吸收了不少虔诚的中国教徒，把他们从我们当中拉了过去。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消除了相互间的隔阂，那真令人高兴。

只有经过特殊的安排，日本人才进学校大门，而且总是由我的秘书或别的人陪着。我很快就发现了同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诀在于把坚定和友好结合起来。他们的军事威力以及使用这种威力的残酷性使得中国人在他们面前不寒而栗。不过，他们只能迫使极少数人屈服。尽管日本人耀武扬威，可

是他们内心空虚，对捉摸不透的美国人的态度也有些敬畏。因此，他们也就更注意以礼相待。我对他们的武装力量无所畏惧，同时在态度上又热情友好，这使我在多次微妙的相遇交锋中能自如地应付他们的挑衅，或打破他们神经质的吞吞吐吐。

学生们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受到保护，生活得很愉快，大家都懂得他们不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抗日活动。我不得不多次提醒其中的一些爱国分子说，他们或者离开学校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既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同时也不致于危及他们的同志。日本人密切注视着地下敌对活动，豢养了一大帮秘密警察和密探，他们的告密使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拷打。我们的学生尤其受到怀疑。他们通常是在周末进城的时候从校车里被抓走。但我的秘书非常机智，要不了多久，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

然而有一个男孩子吓得太厉害，即使他最终获释后，还一连几个月生活在悲惨的恐怖之中，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也怕。我去看望他时，他仍旧处于这种病态中。几年后，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仍然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遭遇使我在占领区继续办学的恐惧心理具体化了。还有一个男孩子带着满面愧色向我供认说，可怕的秘密警察审讯了他，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坐牢受刑，要么在燕京的校园内给他们充当间谍。他同意了后一个条件。他必须将学校的情况每周向他们报告一次。我对他说我既不责备他，也不反对他向日本人报告他在校园里所见到的一切，但是我要他将日本人的反应告

诉我。可是没过多久，他对我讲，日本人已经不用他了，因为他的报告里没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二)

学生们出于爱国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断地乘火车逃往中国非沦陷区，我同学校里年轻的教职员一起（他们过去也是本校学生）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出逃路线。一条是南下的陆路——京汉铁路，另一条通过上海，还有一条专门为女孩子们安排的、更安全但也是更漫长的线路，要绕道香港、仰光和缅甸。沿途都有我的朋友，我委托他们筹集资金和采取其他的办法帮助这些学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我被捕了，给日本宪兵司令部关押起来，他们对我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严密审问。他们最急于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秘密送走学生的经过。他们的特工人员侦探效率很高，已经摸到了一些线索，焦急地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以坦然的、无可怀疑的态度告诉他们说，我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迁往别处，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不过问的。日本人理屈词穷，答不上话来，但是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从我这儿打听出那些帮助我的中国人。我清楚地了解这些人会遭到什么恶运，便拒绝讲出他们的名字。我讲了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信任我，二是如果我反过来出卖他们，那么，连审问我的人也不会尊重我了。我还说，我已经是老人了，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关系不大。我愿意回答关于我自己的任何问题，我个人也可听任他们随意处置，但是我决不做任何危害我那些忠诚的朋友性命的事。

他们审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涉及燕京大学的办学性质和目的。我知道，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使日本军事当局迷惑不解，他们简直无法想象，怎么会仅仅是出于宗教和慈善的动机，仅仅依靠私人的努力，就能创办一所规模如此庞大的学校。我们在学校时，一名日本高级军官曾为一件重要的事要见我，这使我惶恐万状，生怕自己或我们当中有人做错了什么事。但是，他到达后仅仅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根据自己的需要接受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助年金，名义上就说是从当地中国傀儡政府那里领取的。我解释说，我们完全靠私人的自愿捐赠，美国政府从未补助一个美元，而且我们也不会从哪方面或别的政治机构接受补贴，他大吃一惊，以致把日本礼节也忘了，连句客气话也没讲就走出了屋子。我的审问人也流露出同样的疑心，他们对这一奇怪的现象感到非常有意思，以致不再探究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只是好奇地继续问些问题。

(三)

审问中追问得更为严厉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七七事变之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都要到香港去参加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给美国的庚子赔款）。我长期来一直是这一基金会的理事。这种会议以往都是上海或北平召开的。每年我都利用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往战时的首都，第一年是在汉口，以后是在重庆。这是从北京通往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路线，它穿过整个中国，从北京乘火车到上海，从那儿坐船到香港，然后乘飞机

西行，一路还要遭到日本巡逻机的追击和骚扰。

每年我这样旅行一趟，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则是为了向一切有关人士表示，燕京虽然在日本占领下继续开办，但是它仍然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再则我也想亲自了解这一事业的进展情况，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消息。可靠的消息会使学校的士气振作起来，如果这些消息得到证实（多半都得到了证实），则尤其如此。我随身带着给教育部的例行报告，不仅有燕京的，而且也包括其他处境相似的院校的报告。这样的旅行十分有趣。我总是能同委员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如果时间允许，还会同一些传教士、燕京的校友以及其他许多的人聚会。初到重庆那次，有一天后半晌，我头一次遇到了空袭。当时我正等车来接我去同委员长和蒋夫人共进晚餐。我看见二十七架轰炸机排成V字形从山头上飞了过来。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夜晚。次日早晨，当我走过那完全炸毁的一英里半地段时，烧焦的尸体、残肢断臂狼藉一地，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我初次旅行返京后，把我的印象告诉了我的老朋友、华北政府徒有其名的委员长王克敏^①。长期以来，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担任日本太君手下这一寡廉鲜耻的职务。他听我十分兴奋地讲述了各阶层人民在委员长有力的领导下决心抗战的情况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为我作安排以便将这些情况告诉日本首席军官。他们当然已经听说我去重庆的事

^① 1937年12月，王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两度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畏罪服毒自杀。——译者

了，但是他们无法制止一个中立国的公民这样做。王克敏的建议是挑衅性的，不过最终我还是同傅泾波（他同往常一样陪着我）和我那位勇敢的翻译一起去了。在我以后去重庆旅行时，我竟事先大胆地通知日本当局，问他们是否要我帮忙。

审问我的日本人特别想了解的正是我去重庆旅行的事。我告诉他们委员长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他正在捍卫自己的祖国使其免遭侵犯，我还提醒他们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日本人应当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好地了解委员长。我接着解释说，就我本人而言，我衷心希望这两个国家友好相处，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我知道，至少我的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想的。不幸的是，日本的决策人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政策。尽管如此，我同委员长和其他所有中国人的交往使我相信两国关系终究会得到改善。我完全了解，委员长和其他的人并不是那么反日的，他们只不过是反对武力侵略和武力征服而已。他们一再说明，他们的意图被严重地误解了，他们除了采取这种态度没有别的选择。

（四）

第四个问题是所谓我同日本人采取的和平行动的关系问题。日本一直有一部分人反对他们所称的“中国事件”，而且由于他们的军队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大泥淖，战争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所以许多政界和军界领导人都急于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同我进行过接触，实际上我的秘书已去过东京两趟，这是他主动去的，当然也得到了

我的同意。在日本人进行审问时，我的回答都是一些不致给人带来危害的笼统话，拒绝讲出任何人的名字和细节，而让他们去问我的秘书，我知道他完全能对付他们。然而，在我以后去重庆时，也确实受一些主和派成员之托，给委员长带过信件，询问他结束敌意的条件，同时也带回了他的回答——这种回答当然是非正式的。当时他的条件是极其通情达理的。

在上述四次审问中，日本人对我都表现得小心翼翼、客客气气。没有我常听说的恐吓和威胁；每次审问前都让我独自坐等一两小时，因而在有了头一次的经验之后，我也就看出了那是一种为了让我心情平静而不致紧张的技巧。桌上高高地堆着一大叠用日文写的关于我的记录，他们不断地提到其中的一份或另一份材料。最后一天我们友好地分手，审问我的军官对我说，他终于尊重我的观点了。

日本占领后不久，一个又一个的日本人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在我们的教师中增加一名日本教员，人选和经费开支均由日本政府负责。这种要求有时是以增进文化交流的理由提出的，有时又隐藏着威胁。他们是能够制造麻烦的，但我横下一条心，宁可关门停办也不牺牲我们的独立性。最后，在确信我的这一决心已被他们承认之后，我便和同事们商量，是否最好由我们主动聘请一位其声望可以排除任何政治嫌疑的日本学者。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人，一致认为这是符合基督教义的豁达大度的行动，这样还可以避免日本人的指责。

我们在三、四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挑选了鸟居龙藏博士，他在社会学以及后来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中

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受到高度的推崇。当时他已是七十高龄，精力仍然十分充沛，在日本过着闲静的生活，对日本政府的冒险丝毫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了日本使馆的一位秘书。他惊叫着说我们不可能聘请到那样一个人，我告诉他对方已经接受了这一邀请。鸟居龙藏博士只提出了一项条件，就是我们得保护他，使他不受日本军事当局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说，只要他留在校园里就行，这事容易办到。他有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女儿是他英文方面的助手，另一个是法文方面的助手。三个人都同他一道进行研究工作。他的独生子应征入伍了。尽管有种种反日的嫌恶情绪，他们在我们学校生活的小天地里仍能日益获得人心，这是叫人高兴的。他们是出类拔萃的有教养的日本人，是真正具有泛国家主义观点的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所顾忌，有着一一种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本能，同时又能避开那些棘手的问题。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能享有陪同鸟居龙藏博士和他的家人外出远足的荣幸，陪同人对他们都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其中一个学生同鸟居龙藏博士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住在城里，几乎陷于贫困，靠两个女儿糊口。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的帮助，如他所说，“既然成了燕京的人，就永远属于燕京。”和平恢复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校园，我用自己的汽车把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两个女儿——接回学校，并又特别高兴地把鸟居龙藏博士接出城，送到他原来的住地。年岁和战争给这样一个敏感的人造成的极度紧张已经损害了他的身体，不过，我们决定自始至终按他自己过去提出的要求对待他。

(五)

不久，周以德博士来校看望我。他是山西一位从事医学的传教士，他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野蛮征服行径，在那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仅仅在精神上为中国的基督教友和他所服务的整个团体分担痛苦那是不够的。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国人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有苦难言，因为日本人是靠着美国向他们出售基本战争物资进行战争的。他知道，他本人能够站出来讲那些不合常理的事。他必须向美国人民讲清楚，我们做那种不义的买卖，也等于加入了对中国的劫掠。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情况下，他就得离开中国，辞去布道团的职务，两手空空地回美国开展宣传运动，至于美国公众是否愿意听他的，是否能为他提供起码的旅行经费，他却毫无把握。他在学生时代曾在天庭广众之中作过几次成功的演讲，这一点，再加上他强烈感到的必须摆脱的内疚，就是他仅有的资产。这使人想起希伯莱的先知们，他们为追求信仰，曾经经历过一段壮观的冒险历程。他十分愤慨地向我讲述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以及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加制止而任其发展下去所带来的后果。他向我求教，我只好恳切地告诉他，不要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他应当向美国国内的人民作有力的申诉。他极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为他以后作为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而继续为中国尽力开辟了道路。使一切有关的人感到幸运的是，已经按他设想的目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待他到达时，他们就准备物色发言人。

(六)

四年多来，我们保住了我们这块小小的自由绿洲，没有受到日本人的压迫，从而增强了我们历来主张的反对以任何形式对人类精神进行控制的信念。这一点不但在当前这个切身问题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普遍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正常年头，我们的学生几乎来自中国各个省份，而且还有海外来的。可是这一时期，学生的来源几乎仅限于北京——天津地区。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想摆脱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我们不得不放弃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尽量利用我们本来就拥挤的宿舍去容纳他们。总而言之，那四年给人的经历纵然是严酷的，却又是令人兴奋的。

八、监禁与释放

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我们一直提心吊胆，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打破我们虚幻的安宁。我们只能就种种可能发生的事进行推测。华北已进入秋季，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天气逐渐凉爽起来，很少刮风。可是，我们沉寂的校院里却显出了某些不祥之兆。天津校友会一直邀请我去看望他们，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数度推迟之后，决定于12月7日去作一次短暂的周末之行，自以为这期间不会出事。但是星期一清晨，我正静静地为返校作准备时，日本人显然由于某种原因，迅速地采取了控制措施。不久，两名宪兵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北京。他们对我倒是相当客气，不过很明显，他们有严格的命令，要寸步不离地看住我。

在火车上，我忐忑不安地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可能很快就要面向行刑队或者遇到某种更坏的情况。北京车站紧靠那雄伟壮丽的南门——著名的前门。美国领事馆就在城门内不远的地方。两名宪兵叫我步行这一小段路（这多少让我安心了些），而且把我护送进我们美国领事馆原海军陆战队营房的大门。主楼里大约拘留了两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我被带到三楼，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这使我更加放心了。屋里约有五十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一群杂七杂八的人，

由一堵开有一扇门的隔墙分隔开。我很快就认出了亨利·霍顿博士、斯纳珀博士和特利弗·鲍恩博士。三位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也是我后来长期受监禁时的难友。我出于某种预感，选择了一张靠近他们的床位。

美国人当中还有一两名记者、一位孤独的传教士、几个可恶的贩运烟土的前海军陆战队员（通常他们自己就是烟鬼），和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十分明显，我们有一种不讨日本人喜欢的共同特征。当然，生活一开头就叫人感到不舒服，比如缺乏被褥和其他必需品。我们同海军陆战队员一起用饭。当初至少在这方面还算幸运。可是没过几天，日本人接管了伙食，饭菜的质和量越来越下降。在这种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美国成年人在真正缺乏生活必需品时的恶劣作风。

（二）

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发生了战争的谣传。起初谁也不相信珍珠港事件、马来亚海岸外两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和其他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灾难性消息。然而在经过了最初的一阵不安之后，我开始对日本人向我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事感到幸灾乐祸了。多年来，我先后就日本人的威胁以及我们应当趁早采取行动以防患于未然的建议，向燕京托事部送去过绝密报告。而且那些报告曾在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领导人中传阅过。看到我提出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实在叫人灰心丧气。不过，反过来想，要唤起我国人民奋起行动，正需要那样的灾难，一旦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就不担忧最后的结局了。可悲的是日本人不了解美国，不摸美国人的脾气。他

们的结果正如一句中国俗话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人则取得了可能是代价最大的胜利。

一个月相对平静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不过我们并非无所事事。在我们难友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闯了祸。消息一直很坏。圣诞节那天，我接待了几位来客，收到了许多愉快的贺信。头四个礼拜过得很快。后来，突然间其他的人都释放了，我和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看见一个身穿新军装的日本军官对那些被释放的人作临别讲话，我们心里纳闷，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呢？我们的命运会如何呢？

后来，就在当天，我们被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博士的家里。那是一所满清皇族迷人的住宅，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还有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我们在这个锃亮（即便不是镀金）的笼子里生活了四个月。除了共用的取暖设备、厨房、大院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屋子和洗澡间。偶尔我们还可以通过大门上的孔眼看到我们的朋友。霍顿博士生日那天，甚至还允许我们接待了几位来客。这算是一种高级监禁。虽然总是传来坏消息，但是并未使我们的希望完全破灭。我们仍然相信事情会好转，不久就会遣送回国。

（三）

突然间卫兵来通知，要把我们送到别处去。几经争论，他们才允许我们去察看一下不远处的新住房——一个英国商人荒凉的后院住宅——而且还允许我们随身带去霍顿博士的私人家具。有七名士兵看守着我们，他们占用了前排住房（那里有院里唯一的洗澡间），我们住后院的小屋，院里的

天井二十英尺见方，水泥地面已经破碎。这就是以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生活的天地。

斯纳珀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前荷兰医生，协和医学院的客座教授。在霍顿家里时，他的妻子可以随时去看望他，但是一迁到新牢房后，他不得不在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了：或者让他妻子进来跟他一起坐牢，或者两人再也不见面。他自然作了前一个选择。这样一来我们的住地虽挤一些，可是我们的生活愉快多了。我们由地下渠道得知，我们将由《格里普肖尔姆》号客轮遣送回国（后来经过多次耽搁之后，在六月间，《康特维德》号代替它从上海启航了），所以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忍受着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然而，时间到了，船开走了，我们却没有走。后来在九月间，斯纳珀夫妇乘一艘英国班船离开了。我们剩下的三个人又收到了一些秘密信件，安慰我们说，我们一定会赶上《格里普肖尔姆》号客轮于次年开航的第二期班船。这时，我们对严密的监禁生活甚感厌烦了。事后很久我们才了解到，我们的朋友们，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部，曾尽力营救过我们，国务院也把我们列在营救人员的前列，而且还宣称，如果交换名单中没有我们，就不再进行两国国民的交换工作。据说这个问题最后在东京达成了协议。

但是由于某种弄不清的原因，当地的日本军方拒不执行协议，而我们却以为留在那里只是“暂时的”哩。可怜的鲍恩不如我们其他两人的精神寄托多，他实在是硬挺着活到释放那一天的。直至最后他还相信，当班船启航时会用飞机把我们送去。我对他讲，虽然道理在他那一边，但是一切迹象

表明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担心在他看清我们的命运后，他的精神会崩溃。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平静地对我们说，他要学中文，而过去他对中文是丝毫不感兴趣的。自那以后，这位典型的纽约金融区的会计果然就孜孜不倦地学起中文来，就在我们获释的那天他还在学哩。给他当老师也为我增添了乐趣。不过，意想不到的插曲往往使人回忆起悲惨的经历。回想起来，要是我们当中有谁神经变得不正常，我们几个人的命运不知会落到何等悲惨的境地。再说，三个临时被迫成为朋友的人，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如果有谁形成了某种怪癖，那就叫人难以忍受了。幸而我们三人从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更为幸运的是，我们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友谊。

我们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下午遭逮捕的，那一定事先有预谋。华北地区的其他敌对国家的国民，直至一年后被关进拘留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偏要这样对待三个上了年纪的人呢？一直没有找到答案。负责看管我们的宪兵十分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的饮食起居也照顾得相当周到。但是他们似乎有命令，对我们要严加防范，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我们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他们在这一点上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对此，唯一站得住脚的解释是，看来日本军方根本无法理解，象协和医学院和燕京这样的机构怎么能靠个人的慈善或宗教热忱创办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机构一定是美国政府用以收买中国青年，作为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的工具。他们以为只要把这些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员关起来，就能达到消除其影响的目的。可是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要是当初他们不声不响地把我们遣送

回国，学校和我们的影响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同样，如果当时把我们送入拘留营，我们也可能消失在人群中，被人遗忘了。我们被隔离的哑谜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使我们几乎成了传奇人物。

我们被迫跟看守士兵吃同样的饭。对吃惯了西餐的人来讲，那简直索然无味，霍顿博士吃那种伙食是活不下来的。瑞士驻上海领事馆在北平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来处理我们这类事情，而且两位负责人碰巧过去分别在我们两所学校里担任过教授，同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说服了日本宪兵当局，允许他们为我们提供膳食，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经费由一位中国银行家提供。一位年轻的挪威女传教士（由于过去被认为是轴心国方面的，曾被拘留在城里）得到允许为我们采购，将她买到的东西送到我们住处外边的大门口。她每周这样送两三次，真是一个善良的天使。她偶尔还给我们写写信，送些纪念品，每个礼拜六晚上都给我们做一次美味可口的挪威式晚餐，因此我学得象小孩那样，每个礼拜六都眼巴巴地期待着这顿晚餐。我们获释之后最初和最愉快的一件事，就是会见这位未曾见过面的行好者。我们从霍顿博士家搬出来的时候，他的厨师和一个仆人随我们同住，他们答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跟随我们到底。后来，厨师不得不离开，但另外一个则履行了他的诺言。他每两周可以回家一次，而且不时地绕道去傅泾波家里。泾波自己也几乎成了囚犯，但他有一台暗藏的收音机，能听到很有趣味的第一手新闻。不过这对一切有关的人来讲也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在局势已经朝着有利于盟国方面演变之后——所以我们只好

以巨大的克制力放弃了这一取得消息的途径。

天气好的时候，我和鲍恩博士每天都在狭窄的小院里打羽毛球或者玩玩别的东西。霍顿甚至连这类轻微的运动也非放弃不可，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去仔仔细细地打扫他自己的房间——这种活动对我来讲比运动无聊多了。到了晚上我就同霍顿玩字谜游戏，在斯纳珀夫妇还同我们在一起时，他们也参加。我们获释之后，《时代》杂志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了我们当时的全部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四）

我们刚被监禁的时候，日本人还允许我在卫兵的押送下到燕京去取我所需要的东西。我的办公室当时已成为占领我们学校的日军指挥部，我走进去时，里面全是军官。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找到了前面一节提及的我给燕京托事部的报告卷宗，并把全部材料交给了学校的高厚德博士。他趁机把那些材料全部烧毁了。这事似乎未曾引起日本人注意。要是他们当时知道了那些报告的内容，可能早把我处决了。押送我的那个小军官没有严格执行规定，允许我留下吃了午饭，并且还允许我同学校的少数教师自由进行交谈。我与他交谈时，他只是坐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并未偷听。

只要美国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仍享有自由，我们就会十分愉快地收到他们的来信、鲜花和生日的礼物等之类的纪念品。实际上许多礼物是中国朋友送的，只不过他们不便直接送来，因一旦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就会遭到麻烦。我们最

喜欢的是书籍，即使在别的人被送进拘留营之后，代管我们的瑞士人仍然在城里为我们搜集书籍。不知出于什么神秘的原因，日本宪兵要他们的翻译写出每本书的摘要。翻译本人的英文程度不高，他经常拿着书来求助于我们，而后可能要过几个礼拜，这本书才能到我们手上。日本宪兵为什么对我们阅读的书籍如此放心不下，这又是我们在那种奇特的遭遇中所遇到另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如果我们的思想有被书籍败坏的危险，那么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使我们不能败坏任何其他人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的难处只不过是感到孤独、单调，当然也为焦虑所苦。但是同我们本来可能遭受的痛苦，以及同我迄今所了解到的其他许多人遭到的灾难比较起来，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了。冬天，我们并非总是温暖而舒适的。我们在没有暖气的过道里吃饭，常常是我们还在桌上吃着饭的时候，杯子里的水就结冰了。夏天，狭窄的小院十分炎热。天冷时我们就穿上中国的棉袍子，再罩一些衣服，而天一热就把它全脱掉。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不会来客人，每天的情况都完全一个样。

即使这样，情况也有变化的时候，其中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性别）的举世闻名的骨头原存在协和医学院，仿制出一些维妙维肖的复制品之后，只有专家才能分辨其真伪。某些日本科学家显然感到，他们国家在世界上（以及在北京）所处的新地位，使他们有资格享有这一史前时期的宝物。不管怎样，有一天宪兵军官们来向霍顿和鲍恩询问此事了。他们如实地回答说不知道这些骨头在哪里。事实上，为了安全起见，已把这些宝物装进一个宝箱送

到秦皇岛去了，一艘美国运输船预定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后去那里接运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分遣队。化石是交给了运输舰呢或是丢在海滩上了，或是遭到了别的命运，我的两位难友当然全然不知。

争论了很久，军官们显然不相信地离去了。几天之后，鲍恩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五天以后回来时，一切迹象表明，他经受了一番可怕的经历。他一到司令部，一切被认为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给搜走了，他被强迫从一个小洞爬进一个小得连身子也无法躺卧的笼子里。白天，一个不怀好意的看守看着他，连他把身子往笼壁上靠一下也不让。一条皮鞭挂在十分显眼的地方。他痛苦得连每天送去的两顿食物碰都不碰一下，只焦渴地喝几小杯水。经过五天这样的折磨之后，日本人显然认为他已失去了自制力，什么事情都会承认的，于是在放他回来之前再次追问了他有关北京人遗骸的事。

虽然回想起来十分可笑，但那次还发生了一件使神经过度紧张的鲍恩更不安地担忧了多日的事情。那就是在日本人把他押走的时候，他慌忙地随手抄起二百元钞票带走了。正如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身上有钱一般的说总会有有用的时候。他一到审讯室，钱就被搜走了。再把钱交还他时，日本人还追问他是怎么搞到这些新近发行的钞票的。由于我们的监禁期延长了，在我们原来收集的有限资金减少后，我们暗中得到了一个美国朋友的额外资助，鲍恩的两张钞票就是从那里拿的。如果再受到追问，我们商量好了，就按我们编造的似乎最合理的说法讲，而且还把仆人训练了一番。

日本人的兴趣好象纯粹是带有偶然性的，不然，要是他们知道鲍恩在事后好多天里听到任何可能又是来抓他的声响就吓得发抖时，他们会以这种虚狂为乐的。至于我们的经费问题，因我们都为那次不应当的冒险行为担惊受怕够了，一致同意再不干那种事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每月向我们提供生活费。宪兵给我们的选择是：或者吃他们的膳食，或者领取现金津贴。由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那笔津贴到月底只够给每人买一个鸡蛋。不过，在整个囚禁期间，我们领到了应得的原定数额，一个子也未少过。我们既不敢当面给日本人把钱扔回去，也不敢拒不接受。

鲍恩继续做我们的管事员，正如他过去给庞大的协和医学院当总管一样。他料理着我们简单的内务，关照着我们那两只金丝鸟，有时还弄几只兔子之类的东西来让我们消遣。

确切地说，曾有一个来看过我们两次。这就是我的日本朋友、长老会会员田川先生，他当过三十多年的日本国会议员。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允许他坐了十分钟。大约过了一年多，他又来了，由一名卫兵和一名宪兵军官陪着。这位军官把我们半小时的谈话全部记录了下来。田川先生多年来一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穿梭往返，试图调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那时，田川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他进行了他的第十四次中国之行。他的到来使我们在全面的战争和强烈的民族仇恨中，欣喜地感受到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过了一年半，在我获释之后，我听说他病了，住在南京一所医院里，陷入了穷困。后来，我设法帮助他返回了日本。这显然是由于他过去积极地从事和平事业，而受到了他自己国家军方的打

击。

(五)

下面转录我在囚禁初期所写的一些有关宗教方面的想法，这也许是有意义的。原封不动地转录原文，或许最能揭示出我当时的心境：“从我入教以来的经历可以轻易地看出，到目前为止，生活对我一直是非常仁慈的。不仅直接受宗教的影响总的说来是有益的，而且外界环境也始终是令人愉快的……后来突然发生了我所预感到的这场早就使我提心吊胆的最大灾难，毁灭了我前文所提到的一切。这不单单是一时的烦恼或惊扰，而完全可能是永久的毁灭……我们碰到了一场灾难性的风暴，跟其他无数的人一样（其中大多数更为不幸）被抛入了一股涡流，看不清何时或者如何才能挣脱出去。如要展望那摆脱的时刻，除非我能返老还童——这在我书写这一切的时候只有微乎其微的可以感到乐观的客观理由——不然我将成为一个老人，失去那唯一使我感到宽慰的家庭，再也不适合在美国从事普通工作了；我那微薄的积蓄实际上已被所发生的一切一扫而光，一度是志同道合的其他同志给驱散得天各一方，我们的有组织的事业无可挽回地毁掉了，我成了这一事业的孤独的幸存者。于是我想起了那个使受挫的灵魂得到安慰，对受苦受难的人更加体谅的宗教。我常常注意到，宗教书籍，尤其是那些信仰虔诚的书籍，不知讲述了多少人类的苦难、沮丧、失望，而且在我自己身上，宗教却成了我奋进的力量，它鼓舞着我去从事愉快的活动，使我摆脱了自私、鄙俗的做人动机。现在我就处在艰难的时

刻，面临一种捉摸不定的叫人烦恼的未来，得到经受考验并从基督教信仰中得到慰藉的机会。我经常在讲道时或私下劝别人说，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不幸或不愉快的事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去对待它。我现在就有了一个应用我自己的良药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简直太欢迎眼下这一经历了，我不能坐失良机。”

(六)

囚禁期间，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有关战事方面的消息。我们得到允许可以订阅当地的英文日报（由于日本军方的控制，内容十分干巴），还可以订阅一份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从那份报纸中我们了解到了许多东西。《大阪每日新闻》是给在中国的外国读者看的，编得很好，登有许多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消息。每天晚饭前，在我们称之为喝鸡尾酒的时间里，大家就聚集到一起讨论当天的消息，有时真喝鸡尾酒或喝一种代用饮料。我们之中的某一位（通常是霍顿博士）先将《每日新闻》研究一番，然后谈一些有关的段落作为讨论的基础。在我们从霍顿家里带来的杂七杂八的书籍中有一本很好的地图集，这下充分发挥了作用。我们十分尊重德国《公报》报，它的报道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日本的报刊正好相反，不过无意之中也走漏一些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头一年的消息想起来就叫人害怕。看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便没有轴心国方面得意洋洋的描述，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条新闻：德国人在厄尔阿拉美茵被击退，这在惨痛的记载中成了人们长期以来所盼望的逆转的第一个

信号，但是这之后又过了难捱的几个月，胜利的希望才清晰地显示出来，从此我们才不再害怕而是渴望读报上的新闻了。

我们学会了如何领会日本的新闻报导。比如我们读到这样的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在太平洋某岛登陆，但是被击退，遭到了惨重的伤亡，接着又第二次发生此事，之后有关这一岛屿的事就不再提了，直到最后又报导说，日本飞机轰炸了该岛，这时我们就知道美军登陆成功了。我们根据日本缺乏航空汽油、货船、食品等方面的消息推断出了许多东西，我们认定——不管美国的战绩如何——德国垮台之后日本也不能维持多久了。我们断定它还能坚持四到六个月。至于美国的生产情况，我们只能作些猜测。后来，有一天我们从报纸一条通栏大标题下引用美国的消息资料中看到，美国飞机当月产量比它前面一个月降低了百分之二，只有七千五百架左右。这是我们当时首次了解到美国战时生产的巨大规模。不论日本人从这百分之二的差别中得到什么安慰，我们是欢迎这些数字的。1945年春，《每日新闻》不能按时出版了，出版发行中出现了间断现象，而且越往后间断时间就越长，有时篇幅大减，最后完全停版了。我们说不出是为我们的轰炸机令人信服的效果感到高兴呢，或是为失去了这一主要消息来源而感到懊恼。

(七)

德国战败不久，日本内阁突然进行了改组，由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担任内阁总理，另一位年纪差不多的人担任外相。虽然这条消息是冠冕堂皇地用英语宣布的，而且还装腔

作势地说这是为了继续发挥战争的潜力。但是不用特别的才智即可看出这是在转向和平。正如后来透露的，早在五月间，日本人就试图通过苏联，如果不行就通过蒋介石同美国和解。苏联一口拒绝了，所以日本内阁通过了释放我的决定。一个由两名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在一些军官的护送下受命来华，以帝国公告的形式向我正式转达了这一决定，并要我立即前往重庆去说服委员长担任这一使命。这个代表团来华时一路历尽风险，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我们对日实行海空封锁的威力。平常几小时的航程，这次却使他们走了两个礼拜。他们在空中要躲避我们的战斗机，在乘渡船横越海峡前往朝鲜时又发现了我们的两艘潜艇和三艘驱逐舰，同时还要冒险穿过我们的封锁线。他们终于到了北平，但是又碰到了新的障碍：他们自己的军方不愿和解，于是他们又被迫去南京以求得到日本远征军总司令的允诺。问题的真相似乎是军队的头目们想介入谈判，而东京来的人却要设法让我安全地摆脱日本军方的控制，摆脱宪兵的侦察。奇怪的是，他们明知自己面临国家沦亡的命运，却仍然千方百计地要保持原来的威风。

我是在7月4日开始了解这一切的。当时一个看守问我是否希望见见傅泾波博士，他的语气就象平常谈话一样。泾波几乎立即跟着他走了进来，由东京来的那个军官陪着，这位军官简短地说明了他的来意之后就离开了。泾波向我进一步作了详细的说明，向我介绍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我的另外两个难友当时没有在场，我立刻把这一空前的事件告诉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泾波的任务，用日本人的话来讲，是要让我产生一种“甜蜜”感，变得欢快起来，

以便为他们的建议预先作好准备，显然他们以为我经过长期的隔离之后已经变“酸”了。两位外交官还在南京打嘴仗。我同泾波头一次交谈时一个看守始终坐在屋里。最后，泾波和得到了军方同意的代表来了，而且他们还同我们三个人共进了午餐。川井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他毫无顾忌地谈到了他的国家所面临的绝望困境，以及不讲任何条件立即结束战争的必要性。我提醒他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已经宣布为“无条件投降”，而且蒋介石已经同意。因此，我，或者任何其他人都帮不了忙，只能规劝天皇和新内阁，不管顽固的军界头头们如何反对，必须立刻答应这一点。正是这些军界头目们冥顽不化，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他同意了所有这些意见，并立即带着这一回答返回日本。

川井先生向我讲述的日本战力殆尽的情况，充分地证实了我们从《大阪每日新闻》和别的消息来源中所获得的印象。如果我们的联军参谋长们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本不会催促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确保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为了确保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拿中国的利益作代价在满洲作了巨大的让步。他们的情报部显然还不如扎卡赖亚斯海军上将借以得出他个人结论的消息来源准确，他的结论基本上与我们的相同。因此《雅尔塔协定》（由于它的错误，中国和整个非苏联世界注定了要遭受越来越大的痛苦）并非由于罗斯福总统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军事情报系统有缺陷而造成的。

川井先生离去的第二天，他的接替人——一位名叫尾关的上校——跟泾波和一个翻译一起来了。翻译操一口流利的

汉语，这在日本人中是不多见的。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谈得极为友好。在东方人特有的言不由衷的开场白之后，听见一个日本军人终于抑制不住，承认了他的国家局势已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是很有戏剧性的。他同我们握手告别时，两眼滚着泪花，猛地冲出了房间。

如果不同时释放我的两个难友，我也拒绝获释，但这必须向东京请示。结果证明，这一自愿的延宕多少是有好处的，同时，一个冲破看守阻拦的不速之客来访也说明了这一延宕的好处。那是一个中国人，他装着为我的即将出狱而感到万分高兴，然而又尽力想打听出我同川井先生谈话的结果，以及他带回东京的报告内容。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军方的特务，受命打入我们内部。因而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可笑的境地，我希望看守严格地拒绝任何来访者。

（八）

当时，我们接二连三地听到了许多消息：那不可思议的可怕的（原子弹）爆炸似乎已把广岛毁灭了；俄国人进入了满洲；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8月9日、10日、11日）。

8月15日，尾关上校和傅泾波又来通知我们，说我们马上就会获释了。我们请求他们允许一个或更多的帮助过我们的瑞士人和挪威人来看望我们。照应过我们的天使西格尼·斯克鲁塞思满以为她会得到允许，带来了四块小蛋糕，以便四点钟我们同她吃茶点时给我们每人一块。可是日本人只允许我一个人到大门口去同她谈几句话。不管怎样，我能向我的难友转告，她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就跟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美好。

那天还允许一个瑞士人来看望了我们几分钟，另外一个第二天上午来的。

8月17日下午，突然将我们召到宪兵司令部。要是在过去，我们一定紧张得要命。但是经过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已经逐渐习以为常地把每一件新的事件都当作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乘汽车由看守陪着抄近道而去，被带进了宪兵司令的接待室。那司令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全副武装的参谋人员，还有两名大使馆的翻译。司令作了一个简短的致词，抱歉地说让我们受委屈了，并通知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我们尽力作了一个适当的答词。然后司令同我们一一握手，别的人也同我们握了手，于是这次礼节性的会见即告结束。消息飞速传开了，说几个长期神秘失踪的美国人被带走了。当我们回到住处时，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大门敞开着，过去毫不留情的看守们现在让来访者川流不息地进出。

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的奇怪的监禁（在我们看来好象没完没了似的）结束了。我想现在我们至少了解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军队万一不得不投降时，他们可以把我当作同蒋介石讲和的调解人。霍顿博士的责任就是关照好我的身体，使我能担当这一使命。由于我们两人分别是各自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所以鲍恩就被当成了第三个人质。但是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甚至对我们自己也许有着重大关系——的一点是：日本人三十年来想征服中国的美梦终于破灭，留下的只是千百万中国人遭受蹂躏和屠杀的惨痛记忆，以及美国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可恶的军国主义

野心也许有可能就此永远地被铲除了。

(九)

脱身图圈，与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重聚，真叫人兴奋。每件小事都是这样。当我们在监禁期间谈论起获得自由后第一件要作的事情时，我曾对我的两位难友讲，我要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我真这样做了，每天都要打上肥皂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八月，北平的景色最美，自由自在开着车，绕过荷花盛开的莲池或转到一些熟悉的风景区，我感到象孩子一样的喜悦。我在孤独寂寞时曾发誓，以后再也不抱怨来的客人多、呆的时间长了。我获释的头几天，门庭若市，我兴致勃勃地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一誓言。

我同中国教师委员会见面是在第二天，他们是燕京在计划管理上留下来的最后一批遗老。我当即要求他们重新组成“校长顾问委员会”。日本人曾将他们投入阴森可怕的监狱，妄图使他们改变信念，但是他们始终忠贞不渝。再没有比他们更机智更忠诚的同事了。虽然当时学校的设备损失殆尽，而且学校仍被强占着作为一所日军医院，但是当我提议立即着手开办学校时，我发现他们早已为此制定了规划。我们准备招收四百名新生，在双十节（10月10日，中国国庆节）正式开学。我们的朋友讲，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担心办不到，但是大家热情高、决心大，终于办到了。

我们打算尽可能按往常丰富多彩的程序举行开学典礼。然而碰巧新政府也把日本的正式投降定在同一天同一时刻，而且要人们，包括主要演讲人，都得去参加。我们失望了，但

是我们感到这样反而增加了这次开学典礼的历史意义。开学典礼是上午十时举行的，这样就成了“三十节”。开学典礼会上大家的讲话都很精采。洪业教授曾经立誓，在日军从中国领土撤退之前决不作公开演讲，这次给了他演讲的机会，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那天天气很好，礼堂里坐无虚席，人声鼎沸，在日本人得意忘形地宣称“燕京大学现已不存在了”四年之后的今天，大家都为我们的“归返”兴高采烈。

(十)

8月17日，我们获释不到两个礼拜，我就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启程去重庆。这时，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已经抵达北平，该代表团团长极为周到地帮助我实现了重庆之行。不过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全被送往昆明，在一所很大的美军医院里，要对我们以及其他四百多名来自太平洋各地的，正准备遣返回国的美国人进行“处理”（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我争辩说我只不过要去重庆，不可能将传染病或寄生虫带到美国去。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免除处理，反而使我成了怪物。刚从日军脱身出来，现在又受到美军的控制，而且我的中国同伴傅泾波也必须受处理。尽管我对这一停留感到烦恼，但是我对所有同我打交道的人办事效率高、对人有礼貌留下了印象。

我们是9月19日庆祝抗战胜利的头三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总统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人身旁。前不久，他坐自己的飞机专程去延安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接了来。当毛先生在人群

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我刚到不久，气温突然下降，使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止。显然这是一种常见病，叫“重庆咳”。我晚上无法入睡，在我最后离开重庆回北平之前的整整三个礼拜里疾病一直折磨着我。那是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令人苦恼的经历。在那战时的首都，到处都有我的老朋友和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人物，经过长期的囚禁之后我很想见到他们。人们常常请我吃饭，请我去讲演，或使我有机会从其他的人那里了解到在我返回的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自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那倒霉的咳嗽尽管使我精疲力竭，可是我在精神上是舒坦的，心里是高兴的。

我在重庆度过的两天里，这种情况更突出了。一批无限忠诚的中国教师于流亡中在重庆组建了燕京大学。他们借用一些房舍，招收了大约四百名学生。他们什么都缺，没有图书、科学实验设备和教科书，这种情况只有那些亲眼见到过从沿海各省迁往内地的其他学府和战争所造成的其他灾难的人，才能想象得出来。男学生们住在一所古老幽雅的孔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人也拥挤不堪。女学生们最恼火的是臭虫，找不到消灭它们的办法。但是人人情绪高昂。尽管我咳嗽难熬，有许多演讲要作，而且又精疲力竭，可是能经历这样一次精神上

的振作，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如此多的困难面前仍然勇敢地坚持着，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我感到近四年的监禁是值得的。在我返回重庆时，数百名燕京毕业生在河岸悬崖上一家引人注目的饭店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尽管为潮水般涌来的新来者赶紧添了许多餐桌，但是店方仍然无法满足要求，许多人只得空腹而归。

经过一再拖延，我终于乘上了一架要在山东潍县停留的飞机，日本人把华北的所有英美国民一直拘留在那里。所以我没有打任何招呼就直接从天上降到了这个营地。虽然当时抗战胜利已经六周了，但是那些不幸受到拘留的人仍被关押着。其中有许多燕京的教师，有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愉快的重逢。我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把他们的情况同我们三人过去的境遇加以比较，我们的物质待遇无疑比较好，在住房、膳食、服务等方面要舒服得多。他们住得非常拥挤，而且自己的事得自己干，同时被迫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我们有足够的给予个人支配的闲暇时间，只是寂寞、单调得可怕。他们不但可以集体做饭、洗衣、扫除等等，并且还可以从事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这使得人人有事可作，而且还给人一种忙碌的感觉。

(十一)

我获释后，燕京大学纽约总部一直催我回去有事商量，同时海军已同意用飞机送我。可是当我到上海找到管此事的军官时，一定是我显出了一副可怜相，所以他建议让我乘一架“医用飞机”回去。于是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把我送上了一

架配备有许多担架和一个护士的飞机，同机的乘客全是海军的伤病员。我们在关岛停留了两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在这期间我同一位旅伴借了一辆吉普车游遍了全岛。海军的宏大规模使我惊讶。两座修建得很好的公墓给我留下了印象。他们对当地土著人之福利的关心也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过去曾从报纸上看到日本人对我们的B-29轰炸机的描述，这次把我们领到这种飞机里参观了一次，实在令人兴奋。最后我们还游了泳，饱尝了一次热带岛屿的全部魅力。我们在珍珠港停留了两天半，我照旧住的是军官病房，由担架——尽管我一直反对——把我送上和接下飞机；由救护车送进和接出医院，而且只要我提出要求，就可以获得“上岸假”。第二天正好是感恩节，火奴鲁鲁的燕京毕业生使我感受到了愉快的节日心情。中午举行的是中国式午餐，晚上举行美国式的、有各种各样装饰的感恩节晚餐，次日又为我在该市所有的朋友们举行了招待会，当时我还愉快地想，要是吃得过多伤了肠胃也不要紧，因我正呆在一所设备优良的海军医院里。

在奥克兰机场着陆后，就以通常的方式把我送到了奥克诺尔医院，托付给了一位大夫。我问这位大夫以后我该怎么办。面对一个没有随身携带物品、只有一张上面写着“无病的病人”的小纸片，而且有权利乘坐海军航空运输部的飞机，从上海返回美国的平民，医生也感到为难。但是，在他得知我要求尽快回到纽约后，便和他的同事商量，他们答复说，既然海军运输部已经把我护送了这么远，他们也可以把我送到底。于是，在一场狂风暴雨中我被送过大陆，并于晚间九时极准确地布在布鲁克林着陆。当我们象大海上的一只船在天空中一起一

落的时候，我自我解嘲地想，说不定这次漫长而顺利的飞行会以灾难告终哩。回想起我在第一次作横渡大洋的飞行时所接触到的海军航空运输部每一个人的殷切和关怀，我心里就感到十分愉快。事实上，我们的整个军队都是这样。我曾问过昆明医院里的一名护士，他们是否在这方面接到过什么特别的指示，或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这位护士对我的提问显然茫然不解。

会见燕京大学纽约总部的老相识，会见托事部的成员和其他忠诚的朋友，又收到许多人的来信，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我们被秘密监禁期间，他们对我以及我那两个难友的命运是多么焦虑不安；为了我们的获释，他们曾通过国务院作了不知多少次不懈的努力。

为了弥补日本人所造成的破坏和应付一时所需要的开支，燕京大学极需资金。不过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不让我去干那种不体面的、向人乞讨资金的事；而是让我去争取朋友们的同情，这正合我的心意。此外，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还决定不让我向公众讲演，只打算让我在全国各地开展一个“奋进运动”。有关安排较之从前要轻松愉快得多，通常是采取午餐会、晚餐会或招待会的形式。在这些场合我通常是主人，这样我本人和别人都同样避免了恳求捐助的为难窘境。

令人着急的是，我抽不出时间回到我那散居着亲友，且仍为我深深思念的故乡去。我到达最南边的地方是华盛顿，我同我的兄弟和儿子在那里一起过了圣诞节。我儿子在温彻斯特附近当牧师。我每次去华盛顿他都要来看我，给我当汽车司机。

九、应召搞外交

我刚到纽约不久，华盛顿就宣布杜鲁门总统已经敦请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中国去帮助解决国民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内乱问题。几天之后，即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公布了他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件。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在弗吉尼亚的利斯堡购置了一幢景色宜人的古老田舍，准备就在那儿安家，安度光荣退休的晚年。但是马歇尔将军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他立即响应了这一召唤，尽管这对他个人并无吸引力。

于是，国际关系史中一项独特的使命就这样开始了。中国人本会怪怨这是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是傲慢的帝国主义行径。他们之所以没有表示不满，那是由于这一使命是慷慨大度的行动，也是由于这位特使有着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说的“友善地帮助另一个国家”的长期经历所享有的威望。把单纯的理想主义与开明的自我利益结合在一起，并通过高超的组织手法加以贯彻执行，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做法。我试图按照各类事件的先后顺序复述自马歇尔将军于一月初到达中国后，在中国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以及后来在重庆发生的种种变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威望和他那崇高而明智的理想使各方代表会聚一堂，为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并通过巨大的努力，使他们达成了五项协议。如果这五项协议付诸实施，本可以消弥争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并在美国的协助下，对双方部队进行改编和训练。也许所有与会者都是诚心赞同这一协议的，尽管他们对协议的某些细节或最终目的可能各有保留。共产党人在当时以及在以后的讨论中曾十分坦率地说明，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人民尚未在这方面作好准备，所以让他们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阶段为宜。国民政府的代表是怀疑共产党人的诚意的，而他们的会外同事们——由于未曾受到那种出现在协商会议上乐观情绪的影响——则更加怀疑，甚至公开反对同这种诡计多端的敌人携手合作。不过，要是马歇尔将军当时能多呆几个月，继续同一切有关方面接触，那么至少有可能使双方实现初步的合作。可是三月初，马歇尔被召回华盛顿，直至四月下旬才返回中国。

马歇尔刚一离开，郁积的仇恨又重新爆发了出来。双方都谴责对方违背协议，而且开始大肆破坏协议以维护各自的利益。违背协议最严重的事件是共产党人进入满洲，在那里苏联将大量的日军装备转交给了他们。既然共产党人这样公然不顾协议，国民党人自然认为以任何方式进行报复都是正当的。他们相互进行刻毒的指责，使得本已急剧加深的怀疑和仇恨进一步恶化。犹如1927年以来中国历来的情形一样，蒋介石以其独特的个性成了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曾使他受到了理想主义的影响，同时在马歇尔将军的为人品德的激励下，他那些美好的品德也就愈加美好地表现了出来。然而会议中所发生的一切并未使他全然信服，一旦他离开了高

级会谈，他就极易听信一些亲信幕僚的花言巧语。

蒋介石曾在45年11月决定于次年5月5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开会通过宪法并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但是他看清了在激烈的对立情绪中开会徒劳的，于是宣布延期。他认为他有权这样做——由于谁也没有对他当初的行动提出质问，他更感到有权这么做。共产党人却指责他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办事程序。虽然当时没有人对委员长提出过正式抗议，也没有关于首先得知这一决定的“指导委员会”讨论此事的记录，但是这事却成了以后各次会议要予以讨论的问题之一。后来共产党人指责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说，给它确定开会日期的程序是不合法的，当时通过的宪法也是非法的。这个例子说明双方经常为意见分歧而激烈争吵，各自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成天忙于同有关方面会晤，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弥补他离开中国期间所造成的损失。

(二)

我大致是在1946年4月底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由于各种原因，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我急于返回燕大校园，那里有许多问题待我去处理。但是飞来上海迎接我的傅泾波却敦促我在南京稍事停留去拜望一下委员长。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坐飞机旅行可不是件能轻易办到的事，因为铁路线已经被共产党人切断。在南京找个住宿的地方也不容易，城里唯一的一家现代化饭店已经腾给美国军事顾问团使用了。傅泾波在本能上就有着敏锐的且又神秘莫测的政治嗅觉，他让我去见委员长，我照做了，从而也就改变了我以后

的历史。

我这次不辞劳苦去走访蒋介石是值得的。在此之前我见到他是在45年11月的重庆。这回看到他重归故都，十分高兴。谈话中，他问起我对时局的印象，我回答说，比我从美国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还要坏。然后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思索片刻后对他说，我想把我的看法归纳为一点，以便说到问题的根子上，那就是，他应当以他当初参加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时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热忱，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进行内部改革，以便把那些心怀不满、渴望找到一位深得他们信赖的领袖的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有了这么一批自愿的宣传鼓动家，他就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正象抗日战争期间他无疑地曾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一样。那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不过在做的时候，他也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他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我的主张是一回事，而要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蒋总统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想他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而在我这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想见见这位战功赫赫而又肩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约见的時間定好了，他同我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回顾了迄今为止的整个谈判过程。我偶而提一两个问题或插一两句话，除此之外我一直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最后，他说他把这一切告诉我是因为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向他保证，只要他派人去找我，我随时都乐意去南京。他派人请过我一两次。快到六月底的时候，我碰巧去上海出席一次教育方面的

会议。在那里，陈立夫先生看望过我两次，他就共产主义和与之有关的问题详细地谈了他个人的观点与看法。马歇尔将军经常提到陈立夫，说陈立夫是阻碍他行使其使命的反动势力的头头。

陈立夫是陈氏二兄弟之一，其叔父是已故的革命方面的头面人物，曾先后支持过孙逸仙和蒋介石。这就使二陈和蒋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陈氏二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在个人关系上，这位领袖也就代替了他们已故的叔父。兄弟俩都十分聪明，无贪婪受贿之嫌。他们崇信国民党及其领袖，力主消灭共产主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并由他们一手建立和控制的所谓“二陈派”，与其说是一个派系，不如说是整个国民党组织的成员。他们得到来自上面的庇护，势力极大。每个成员都表现得愚顽凶残、横行不法、仗势敲榨勒索、追逐个人私利；不过陈氏兄弟俩本人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手法都是从俄国顾问那儿学来的。那些俄国顾问大约是在1923年来到广州的，他们按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陈立夫辛辣地嘲笑说，虽然有人（尤其是美国人）指责他是反动分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先锋和先知，他早在其他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之前就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我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同陈立夫谈话的情况。他当即回信说，只要我能去，他便立刻派自己的飞机去接我。结果是非常戏剧性的。我们是在6月29

日星期六下午到达的。那月月初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安排的一次停战谈判，第二天中午就要结束，有关各方都承认没有达成协议。委员长事先准备了一份新闻稿，几乎排除了再次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他已命令全体将领作好战斗准备。马歇尔将军已经指示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他们返回美国时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就把陈立夫忘了。那时，除了向马歇尔将军建议让他请委员长收回他的新闻稿，并请有关双方暂停谈判之外，做任何事情都来不及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其后数日我沉静地尽力摸清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

(三)

我急切地希望能尽快脱身，以便返回燕京大学去处理战后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接着便是7月4日的美方招待会，为了避人耳目，我正在盘算是否参加。但是，正当我穿衣服的时候，马歇尔将军送来一封信，要我九点钟到他那儿去，并说他的私人飞机准备在十点钟将我送到北平去。出席招待会的问题算是妥善解决了。我以为看望马歇尔将军只不过是到最后对我迄今所做的一切表示一下他的谢意而已，那知他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辩解道，我年已古稀，已向大学校方送交了辞呈，一个人到了这个年岁理应避开繁忙的公务退休，而不应当承担新的使命了，另外，我搞外交也不在行，等等。不过，我最后对他讲，他的任务十分困难，也十分重要，他要谁帮助，谁就应该乐意相助。我说，我的事情由他酌定。我们同意把任期定为一

年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行动很快，10月10日总统就将我的名字提交给了参议院，并得到一致通过。当时马歇尔将军可以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他需要的一切。

回到校园之后，我忙于处理一大堆累积下来的琐碎事务。后来消息公布了，大家都非常兴奋。同事们都赞同地说，如果我真的能帮助这个国家实现和平，那才是对我的时间最好的利用，甚至对燕京大学来讲也是如此。接着我便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去校务长的辞呈。他们一致拒绝接受我的辞呈，只允许我告假。我便立即去南京，原以为那只是一次初步的短暂之行。谁知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能返回北平料理燕大的事务。

委员长正偕同其夫人在牯岭避暑。马歇尔夫人也舒适地住在他们附近。马歇尔带着我和即将离职的与行将上任的大使馆参赞到了牯岭，以便我递交国书。我们路上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飞机，轮渡到九江，乘汽车穿过一片田野，再坐轿子上山——总共五个小时左右。由于是在山上递交国书，仪式也就简化了。我后来在同委员长交谈时，对他说，我要按我们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我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四)

那年夏天，马歇尔将军前后八、九次去到牯岭那美丽的高山休养胜地同其夫人共度周末，以避开南京的酷暑和没完没了的会议。

我一返回南京后就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有时同马歇尔

将军一起出席，更经常地则是在我的寓所里同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商谈。中共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南开中学毕业生，后来曾留学巴黎），他是一位才思横溢，具有罕见的风度和魅力的人。通过同他和其他一些人交谈后，我认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心理是何等地深，同时我也看到，为澄清两三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们总是争论不休，而最后在做法上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精神又是多么的接近。实际上，我是在听了周的一席话之后，才建议由双方各指派两名代表并由我作仲裁人而成立一个被人们非正式地称为五人委员会的，会上可以就各种问题进行争论，任何一方也无须作任何承诺。

周是衷心赞同这一主张的（后来被延安否定了），待我在后一个周末陪马歇尔将军去牯岭向委员长提出这一建议时，似乎是大有希望的。我再次去牯岭的消息在新闻记者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牯岭驻有二十多名中国记者，他们渴望得到暗示和谈取得任何进展的消息。我由于饮食不周，也可能是在我从炎热的平地登上凉爽的山顶时着了凉，肠胃功能发生了紊乱。在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先生——燕京毕业生——来看过我之后，在我前去马歇尔处吃午饭之前，我先在床上躺了一会。我感到头晕，便派人把情况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亲手将我安置在床上。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医生含糊其词的话为聚集在四周的新闻记者提供了可以任意发挥的材料。委员长强令我留在山上，并且要我躺在床上，等病好了再去见他。新闻记者采访不到什么政治消息，便对我的病情以及蒋夫人或马歇尔夫人送给

我的精美食品等等，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而且消息越传越远。后来我听国内的一位亲戚讲，她曾为我十分担忧，只是从广播里听到我最终脱离危险之后她才放了心。

几天后，我可以去见委员长了。我向他说明了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委员会的打算。他同意了，但是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第二天我回到南京，并于当天晚上同周恩来及其同僚长谈了五个小时。在我讲出那些先决条件后，周恩来向前倾着身子，低垂着头，神色沮丧，有好几分钟没有开口。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了，这似乎又出现了国共妥协的可能性。但是双方的疑虑和恐惧以及互相对立的目标和思想意识每次都成了主要障碍。不管共产党人的意图如何，我确实感到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条件来实现联合。国民党人则更为犹豫和多疑。在我所打过交道的人中，还从未见过象他们这样互相猜忌的，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的情况更是如此。

我再次同周恩来以及其他本来要参加我提议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周根本反对委员长有权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且反应强烈。后来他一气之下退居上海数周之久，以表示他持有不同意见，虽然他的同事仍留在南京。

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同我发表了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声明，说明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是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和相互猜疑。我那小小的非正式委员会实际上从未开过会，也许这就是最终决裂的开始，虽然更明显的原因是十月份发生的两起事件——要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以及张家口

的被攻克。这两件事典型地说明了问题的争执所在，以及双方在思想感情上的隔阂。

(五)

45年年底，委员长根据他自己所享有的权限，宣布要在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新宪法。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大家都同意召开国民大会，没有人反对。不过，当开会日期迫近时，由于战争重起，委员长便通知当时仍旧起作用的政协指导委员会必须推迟国民大会，并要他们公开宣布此事。尽管共产党人声称当时曾有人对委员长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提出过抗议，可是按委员长的记忆，当时只是有人在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已。况且这一切又无案可稽。委员长认为他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基于同样的道理，他后来宣布孙逸仙的生日（11月12日）为国民大会的开幕日也是正当的。可是共产党人却以此说他独断专行，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共产党人认为，成立政协指导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处理这类事情。

这时的战事总的来讲有利于国民党人。他们正大张旗鼓地向张家口集结兵力。张家口是共产党人在北平西部的一个战略要地，是通往北平的大门。周恩来和其留下的代表都急切地希望避免这场危及他们事业的灾难。马歇尔和我竭尽全力设法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举行一次为期十天的和平谈判，而要拟定出委员长会同意，另一方也能接受的条件，可要磨破唇舌。不过我们终于把委员长说通了，可是后来对周恩来的游说却不太成功，未能使他返回南京。马歇尔将军亲自飞

往上海去请周恩来回南京。我们指出，只要他们表态同意恢复谈判就行。我们还指出，如果谈判成功，国民党向张家口的进军即可停止，而和谈拖延一天，对该市的进逼就会一天比一天靠近。可是他们却含糊其词地说：“时间太紧了，委员长不可信”，等等。

我们又失败了。10月10日张家口被攻克。这碰巧发生在国民大会开幕前一个月，而按规定，应当在一个月前向所有代表发出正式通知。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周恩来和他的同伴本来就感到恼火，这样一来，他们的情绪也就变得更为激烈了，结果事情也就随之告吹。他们声明说，通过那样的程序给国民大会确定开会日期是非法的，因而在那种情况下通过任何宪法也是非法的。周本人返回延安去了。虽然其他人仍留在南京，并经常同我会晤。但这些会谈都是非正式的、毫无成果的。

国民大会的日期从5月5日改到了11月12日，期待共产党人出席。然而共产党人对这次制宪会议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们坚持他们和他们的盟友（如民主同盟，以及象郭沫若那样的“无党派”同路人）必须占有联合政府国务会议四十个席位中的十四席。既然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规定，国务会议的所有行动都需要其四十位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赞同票，那么十四票即可构成否决权——因为通过任何措施都必须有二十七票。所以国民政府只能同意给共产党集团十三个席位。这乃是共产党人拒绝加入联合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亦是他们拒不参加国民大会的重要原因。在最后一分钟，大会日期又推迟了三天，以便等待共

产党人出席。直至11月15日国民大会才开幕，在大会开始选举其五十五人的主席团时，还给共产党集团保留了九个席位。可是共产党人一直没有参加。

委员长提交给大会的宪法草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得到了各个党派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一致赞同。该草案比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标志着委员长的思想进步了。宪法中一些较为开明的条文遭到了国民党极端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想方设法要按先前保守的草案对它进行修改。要不是委员长决心大，这部宪法草案本不会获得国民大会通过的。他向死硬派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正告他们说，他要求通过这部宪法，他们要么听从他这位党的领袖，要么完全同他决裂。最后，他们只好同意随大流。委员长随即打电话告诉我说，宪法会顺利通过的，叫我别担心。

换句话说，经过长期争论之后，中国的议会终于制定了一部民主的宪法。对于一个由二千零四十五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具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来讲，这可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这里可以引用一段马歇尔将军在1947年1月7日发表的个人谈话：“事实上，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一部在主要方面与去年1月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原则相一致的民主宪法。不幸的是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宜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可是宪法却已经把他們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进去了。”

(六)

就我们美国人迄今对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包括他们自称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了解来看，把这几个个月来我们经常同他们的代表团接触的印象记载下来，那可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前所述，他们十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过需要为此作准备，对人民进行一段时间的“基本教育”。因而他们愿意加入一个具有民主宪法的联合政府，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一个步骤。可是他们又担心，如果不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捍卫自己的地盘，他们就不能生存，同时他们对政府又普遍地抱有戒心，这也就成了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的障碍。还有一个不幸的情况是，二十五年来双方的大多数领导人一直是原班人马，在一个特别看重个人关系的国家里，这为两党的和解增添了许多麻烦。

我个人一直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谁都明白，即使一方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靠这种办法也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由美国来帮助改组和遣散双方的军队，似乎最能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攻击，从而也才有可能削减庞大的军费开支。不管成立联合政府会带来什么困难或纠纷，那都是政治性的，可以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经济灾难。

以圣诞节那天通过宪法为告终的那六个月，几乎全用在开会、提建议、听辩论和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告等之类力争结束战争的事情上了。会议各方都显得情绪激烈。周恩来火气越来越大，最后竟提出了不合情理的要求和进行公开的辱骂

了。接着委员长也大发脾气，变得极端执拗。马歇尔亦十分气愤，他几乎几次决定要求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国去。受挫的希望往往又为一些新的事态发展或新的建议所复活，但结果还是落空了。十月底，一些各式各样的“第三党”的党魁头目们出面接过了我们美国人未能办成的一些异乎平常的事情。我们欣然退了出来，要是能看到由于中国人的介入而取得成功，我们会很高兴的。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们也放弃了这种努力。

整个夏季和秋季，公众一直期待着和平的消息。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中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作了详细的报道。我通常是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去拜访马歇尔将军。他总是一吃完晚饭就在自己的家里放映一场电影，以消除接连不断的会谈给他带来的疲劳。我一般也留下来看电影。有一两次，中国报纸报道说，一定在讨论某些重大事情，因为有人看见我下午五点五十分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家，直到十一时方才离开！

(七)

从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上。在这之前不久，沃尔顿·巴特沃斯被派到南京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处理行政事务效率非常高，后来提升到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去了。不过，他的后任刘易斯·克拉克也是同样称职能干的。我无意去统管使馆的日常事务工作，一切都是让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去处理。我是善于鉴别人才的，看到他们工作效率很高，而且一直对我谦恭有

礼、关心体贴，心里十分高兴。他们将“绝密”文件、宴会席位的安排等外交奥秘一一授予我，使我这个惴惴不安的无知的新手一开始工作就意想不到地顺利。巴特沃斯夫人、克拉克夫人和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及其夫人们对我这个孤身的没有经验的鳏夫也体贴相助。事实上，我不久就感到他们好象是我的新的家庭成员似的。

在我即将离开北平前去就职的时候，某个中美联谊会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在我无法推辞只得作即席讲话的时候，突然在来宾中发现了 I 认识多年的胡适博士，于是我当即将他与我自己作了对照。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 and 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适博士所避开了的。

(八)

有些事情也使我感到十分惊喜。中国的公众将欢迎我当大使，这基本上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报纸的社论和其它评论众口一词的拥护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过去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近年来的熟人，我那新的官方职位并未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多大变化。我在教育事业方面的活动，以及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的深切同情也是人们普遍了解的。实际上，中国人常常讲，他们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的。

但是我对美国人的反应就不那么自信了。旅居东方的美国传教士和非传教士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隔阂。在异国

环境中各自的缺点似乎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加之经济生活水准和社会习惯等等的不同，隔阂加深，而致实业界不赞成我出任大使。他们认为我不适合干这一行，说我不甚了解也不怎么关心他们的事务，而且，在他们看来，我的职业带有狭隘的虔诚宗教狂，或含有对中国人不切实际的感情用事的色彩。

那时，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早已深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士们的情况当然也是一样。由此引出了这么一句打趣的话，这就是：美国在中国所进行的三项主要活动项目，而且三者的箴言都是“让光明来临”。至于美国国内的公众，只要他们稍许关心中国的事，就会感到奇怪——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提出的疑问——总统为什么要任命“一个老朽的传教士”当大使呢。许多人出于善意不让我了解反对我的意见，但是旅居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同胞对我所表示的友善，以及我从美国听到的绝大多数评论都是极其令人鼓舞的。中美两国人士的这种态度都有助于我自然而然地适应新的生活。大使的生活方式、薪金、声望等所有这一切，同我过去习惯了的质朴无华的生活是迥然不同的。但我从不认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做礼拜或戒烟戒酒这样一些事。我认为差别主要在于生活的内容，什么行为是正当的或错误的，什么是上帝容许的或有害于众人的，各有它自己的标准。不管怎样，我决定对自己忠实，因为有很好的权威使我相信：“正象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十、未曾实现的梦想

马歇尔将军花了一年的时间，不知疲倦地努力帮助中国人建立联合政府，以便给这个饱受痛苦、人心惶惶的民族带来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谦逊有礼，处事明敏而又坚韧不拔，极好地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国计民生所怀有的友好情意。即便在正式会谈已经中断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们还多次与政府领导人或者和共产党的代表不断举行会议，力求使各有关方面取得一致，找到解决办法。可是，面对现实，马歇尔将军只好承认他的使命归于失败，并开始作多方打算，准备一过完新年就返回祖国。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将军接到杜鲁门总统的命令，要他回国去接替伯恩斯先生的国务卿职务。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通知他再过一两天马歇尔将军就要启程离开中国，但是没有告诉他将军另有新的任命之事。委员长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雅尔塔协定》的看法，说谁也没有征求过中国方面的意见。他还补充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原谅那些当事者，然而，全中国人民对这种做法都极为愤慨，他希望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杜鲁门总统。他还询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回来当他个人的最高顾问。这一次谈话主要是由蒋夫人做口头翻译。谈话末了，大家都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再作一

次单独会谈，然后举行告别宴会。

最后一次会谈是紧张的，也是带有戏剧性的。会谈中，委员长再次邀请马歇尔将军做他的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作出伟大的贡献。他十分热切地恳求将军，提出要赋予将军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并且许诺要尽最大的努力与之进行配合。他要求马歇尔将军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除了帮助把中国建成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同样感到理想的国家外，他是否能为中国，甚至亦是为美国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蒋的想法是：到那时，马歇尔将军的属下，不但有他自己原先建立的军事顾问团，而且还有一个美国民政顾问团。马歇尔将军深为感动，但又感到不便多说什么，只好对委员长给予他的荣誉和重任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答应对这一要求作认真的考虑。

但是那天晚上，在我们驱车离去的路上，马歇尔将军让我找机会尽早向委员长说明他不能接受邀请当顾问的原因。第二天上午，一大群人到机场给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送行，其中包括委员长和蒋夫人，以及中共代表，我亦在场。马歇尔将军一走，我就产生了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久久不能摆脱，但一想到华盛顿仍有将军与我保持某种同样的关系，孤独之感也就得到了补偿。

(二)

在那多事的最后一天早上，马歇尔将军问我，鉴于和平谈判已破裂，美国将应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我当时按自己的想法回答说，只能采取这样三个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

民政府，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逐步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们方面，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办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政事务。就此，我还补充说，在这些方针中，我完全赞同第一个方针，但是，若要在二、三两个方针中作选择，我则同意第三个方针。

马歇尔将军想了一会，他原则上同意我的观点，并表示理解我主张采取一项“明确的政策”的用意。

(三)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在此把上述三个方针详细说明一下或许是适宜的。

一个国家制定政策，无须说，首先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我们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让它有一个为其人民所接受的、对我们友好并能稳定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政府，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被迫对日本作战，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向中国作了大量的投资，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所有这些，包括我们在这个地区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讲，却使我们因关心中国问题而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即便增添一些相对来说数目不大的投资，似乎也可看作是“一笔好买卖”，因为自那时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了

影响。

战争期间，我们作为一个盟国，在中国国土上广泛地参加作战，通过赫尔利大使从中效力，由马歇尔将军给国共双方调停，以及通过其他许多途径进行工作，我们已深深地陷入了中国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

此外，还有《雅尔塔协定》的责任问题。根据这一协定，我们在没有让中国知道或者征得它同意的情况下，就向俄国作出了许诺，把一项条约强加给中国，让俄国参与中国满洲铁路的管理事务，并让它在大连和旅顺港享有三十年的特权。时值战争正趋结束，俄国军队得到允许开进满洲。他们在那里对中国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公开强奸妇女，抢劫中国人的私人财物，并掠夺了这个盟国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机械。

接着，中国共产党人也随之取得了大量的日本军事装备，可以用来打击俄国人在协定中作出保证要加以承认和保护的国民政府。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作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纠正这样一些做法。1946年3月，马歇尔将军刚被召回华盛顿，中国共产党人就违反了他们所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侵入满洲，除沈阳及其周围一些处于拉锯状态的地区外，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地方。东北是个富庶地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更不用说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又一卫星国，我们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希望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给予技术上的指导，使国民政府能重新夺回并保住长江以北的某些地区，同时，实行必要的改革，首先从地方民政管理方面着手，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一种安全感。我所说的长江以北的地区是指从南京到天津，延至北平和沈阳，或远至西北一带的铁路沿线地区；穿过山东到青岛的铁路支线；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铁路沿线。这样做，与其说是与共产党人打仗，倒不如说是为了遏制他们，使处于两个区域中的不幸的老百姓免遭军队的劫掠和由此给他们带来的恐怖。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可把冲突限制在保卫一条漫长的边界线上。同时，将这一场斗争转移到竞相为当地人民谋福利方面，不再给当地老百姓带来蹂躏，让更好的制度取得胜利。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希望那些彻底地讲求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人早日提出重开和平谈判的建议。我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的使命终将获得成功。然而，回顾往事，就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意图和其手法的了解来看，很清楚，将军当时的使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当时在我看来，达成一项有益的协议的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

当时，我们要是认为无法采取一项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那么，我自然会当机立断，除了同中国保持一般的外交关系外，宁愿在该国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当时，如果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得不到制止，或者不能把它至少限制在保卫所划定的边界线上，那么，即便提供任何人道主义的援助，做好了经济上的恢复工作，实现了货币稳定，那也不能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这个国家当时的开支是三倍乃至四倍于它的

总收入。战争大约消耗了预算的百分之八十。运输业和从事生产性的企业都处于瘫痪状态。我们并不是要搞军事入侵。我们所要做的，是去完成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使一场武装冲突尽快结束。否则，战争就将无休止地拖下去。而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是要求和平的。斗争双方所涉及的两派成员在人口众多，潜在力量大，但仍处于涣散和无政府状态的人民中，仅占区区一小部分。广大的民众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仅仅是中国人而已，他们希望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过日子，不受政府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把陆海军顾问团继续留在那里，勾起人家想得到更多援助的欲望，但在实际上我们却又援助得很少，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与该国各方人士的关系处于受到损害的危险境地。政府领导人说我们采取了背离他们的行为；共产党人指责我们偏袒一方；一些卓有见识但又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则为无辜的群众说话，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侵入了他们的国家。

这里，应就在军事上提供专门指导的主张作一番解释。大约自本世纪初开始，中国一直在抗击外国的侵略，最终击败了日本。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在思想、科学、技术、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诸方面，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性变革。在一个孕育着新生力量的古老文化中，军事科学自不免受到旧遗产的阻碍，难于吸收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即使掌握了这些技术，要想使中国领导人摆脱旧日的人事与政治关系，摆脱根深蒂固的旧习惯，要使他们严格地坚持不带个人偏见、讲究作战效率的客观标准，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正是

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美国人幸运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新的技术发明，同时在上次大战的刺激下，我们在军事上也有了新的改进和技术发明，从而也有了相应的应付战争的人力。中国人慢慢地懂得了使用机械装备的重要性，能以迄今他们所不了解的方式协同作战了，并能把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置于家庭、“情面”、义气等旧观念之上了。后勤科学，对我们来说，几乎也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而就中国的战略来讲，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强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给中国人以指导，决没有贬低他人之意，也不是我们目空一切。幸而我们正是这么做了。

有人反对说，中国人经常不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甚至对我们给予的指导表示反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适当的回答。对一个把礼貌当成道德的一部分的民族来讲，指导得是否得体和谦恭有礼是至为重要的。孟子赞扬过一个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乞讨者。另外一点是，不应忘记由政府选派，并对我国政府负有责任的军事顾问们所起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是以中国人掌握技术所能达到的程度为前提去提供物质援助的。

顺便说明一下，也许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育学家。在我看来，美国给予中国的所有援助有可能，而且应该用于教育，以便帮助这个国家训练人才，使其效法那些由于某些历史上的原因，在较为安定的条件下，较早地学会了一些东西的邻国，从而适应现代的国际环境。据我一生的经历，我可以证明，中国人是能够学会任何东西的，而且只要我们谦恭，给予真诚的指教，他们是十分感激的。此外，再没有任

何事情能使他们感到更为满意和喜悦了。

(四)

1947年整整一年，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表现得犹豫不决，也许是由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1) 战后的欧洲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发展，要求人们采取紧急而专注的行动。美国在谋求和平的全球战略中，必然首先要考虑欧洲，这最终亦有利于中国。

(2)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性：给中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特别是在涉及这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一些具体做法上给予指导，就会使美国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而不能自拔，从而增加更多的承诺。这在国内一些人士中（纵然并非所有的人），未免会引起抱怨情绪和增加混乱。同时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甚至危及到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义务的能力。

(3)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美国政府和人民做了不懈的努力，并暗示国民政府，如果要我们帮助，它就必须给我们一些更为令人信服的迹象，说明它正在采取步骤进行有关改革，哪怕表示有这方面的要求亦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疑问是，一个没有能力进行进步改革的政府能否将我们的援助去为整个国家造福。

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我仍然期望美国能采取一项更为积极的政策，因为我相信，针对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反对意见，决不是非重视不可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时刻遵照我们的信仰去行事，而不应有任

何惧怕心理。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的整整一年里，我不断有中国客人来访，他们希望从我这里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想通过我对这一政策施加影响。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希望我们给他们以迅速而充分的帮助，亦就是他们通常所指的货币贷款或拨款援助。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见到委员长，他总是急切地问起华盛顿有什么消息。而要我跟他说明为何我总是没有什么确切消息可向他报告，不免是件困难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说话毫无顾忌的非共产党团体，他们对我们给一个如此声名狼藉的政府以任何进一步的援助都要提出抗议。他们全然不了解我们那时所给予的实际援助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被激进的宣传和报纸上不断制造出来的所谓计划中的大规模援助的谣言迷惑住了。但是，最可悲的是那些自由主义者团体，他们自称他们是反对交战双方的极端主义者，他们要寻求某种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有的是那些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各个政党的代表，据说这样的政党有七十多个；有的是大学教授和一般有知识的爱国人士。与那些有手腕的政治家相比，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是极不现实的，显然他们不可能携起手来结成一个巩固的、具有某种影响力的大组织。在回答有关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有人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由他们的社会传统和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性决定的。他们个人主义浓厚，相互猜疑和妒忌，同时又非常怯懦，这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另一个阻碍因素是，他们没有资金，缺乏一个可以为他们提供经费，而又不

会有损于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的选民组织。但更为明显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害怕交战双方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政府对一切不受其管束的政治活动都一概持不赞许的态度，说它们是不健康的和粉红色的，即便不把它们当成乔装改扮的共产党的活动的活的话。

在军事、经济和心理等这样一些相互起作用的 因素 方面，形势对政府变得愈来愈不利了。

(五)

1947年夏，魏德迈使团到中国，先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后在朝鲜呆了两个星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大使衔特使，并带有一批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将军从中国奉召回国后，魏德迈将军就随即被任命为委员长的参谋长。将军为人老练，通情达理，能力过人，担当这一使命非常合适。消息来得突然，几乎未作什么解释就宣布，在魏德迈将军一行确实快要离开美国之前，才给我发来一份 简 要 的 电 文，让我转交给委员长，不经商量，就要中国政府同意。这件事是饶有趣味的，因为我们自认为可以单方面作决定向一个主权国家派遣这样一个使团，而且中国方面也接受了该使团，以为我们有心帮助他们解决内部困难。本来，中国人对这种做法理应表示极大愤慨。当然，共产党人作了谴责，他们提出的理由也是难以驳斥的。当时这种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两国之间有着长期的友谊，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以巨大的开支帮助他们打败了日本）以及对魏德迈将军的人格是信赖的。除了他，再也没有

别人能对付得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局势。

使团到达的那天，适逢南京盛夏最炎热的日子。他们冒着酷暑，四出走访，不知疲倦地努力了解情况，然后，根据上级指示，在夏威夷岛上一个僻静处所对情况进行了估价。他们态度认真，工作讲效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汇编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这正是美国人所具有的特性。这份报告从未全文发表过。有关该报告的内容，只能从魏德迈将军后来在国会的证词中略知其梗概。后来，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有了改变，但人们从那份国会证词中看不出它对该使团的工作成绩作有任何肯定的地方。使团结束其任务时，中美双方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委员长以中国人特有的礼节，希望在使团离开中国的前夕，设宴款待他们一番。可是，特使持反对意见，要求不设宴席，而建议让他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讲话就安排在委员长的官邸里，参加者中大约有四十名政府成员。魏德迈将军极其认真而细心地准备了一份打印好的声明，在声明中，他坦率地谈到了该政府内部的弊病。出于美国人的责任感，他希望他的讲话将促使中国方面实行改革，从而帮助中国获得援助，并确信他的讲话会使中国得到这种援助。

然而，中国人的反映也是不寻常的。一位外宾在公开场合对他们进行批评，是违背他们做人讲体面的原则的。如果是在一个范围很小，谈话知心的圈子内这么做，那倒未尝不可。但是，在一个人员庞杂，而后又会把事情张扬出去的集会上这么说，那就不合适了。一位有身分的儒家老先生事后简直为之哭了起来。无人怀疑讲话人所讲的事实，亦没有人

怀疑他的好意。因此，一想到这些，人们终于消除了他们最初在本能上对魏德迈所抱有的愤慨情绪。同时，还由于他后来发表了一篇在他们看来调子温和的声明而更为缓和。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该使团在中国人中激起的希望和随之所带来的失望情绪是抱有同感的，但我感到极为高兴的是，我加深了同“爱尔”的友情（爱尔是对爱伯特·魏德迈的亲昵称呼。——译者注）。魏德迈品德高尚，对中国人民怀有真诚的友谊，是一位真正代表美国友好情意的使者。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善意而带有建设性的精神，也是使团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他们坦率地说明，他们的使命纯粹是为了对事实作调查。也许中国人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调查这些事干什么呢？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大模大样地作调查？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由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领事网对中国国内情况所作的系统报告，需要由华盛顿派来的仓促行事的专家作补充呢？同时美国公众也同样茫然，因为一个如此引人注目的使团，花费了那么多的钱，写出来的报告竟然从未完全公开过。

在魏德迈使团访华期间，威廉·布利特先生也来到中国。他主张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他的这些意见甚至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之前，就在中国广为传播了。不久，周以德博士紧跟着也来到中国，力图使自己重新适应中国的事务。他讲话雄辩有力，能打动人心，他实际上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讲演上了，其观点基本上与布利特的主张一样。

(六)

诚然，与共产党人实行联合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政府在马歇尔将军的敦促下，还是扩大了它的基础。春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有两个小党谋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可是，并未给政府带来相应的好处。就象我们自己国内搞那种不光彩的分配官职的做法一样，那些小党也为它们自己的党员捞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的属下，与他们所取代的国民党官员相比，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这是中国人在勉强屈从于美国善意的压力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它再次证明，中国所谓的政治问题，几乎都是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考虑。

政府不断提出改革措施，可是却又很少贯彻执行。政府在物质资源上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精神也极为颓丧。因此，它除了作些支撑局面的事情外，已不能再有更大的作了。由于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全面恶化，政府已陷入渐趋瘫痪的境地。它犹如一个得了严重病症的病人，如不给予含有极高营养的滋补剂，就再无复原的可能。俗话说：一事成功，事事顺利，如若不成，就会事事不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政府的各级官员。学生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多半是共产党煽动的）越来越频繁，和往常一样，都反映了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反美情绪也在不断加深，主要是认为我们阻碍了共产党早日推翻一个腐败的政府。学生们对任何一件本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区区小事都要激烈骚动一番，由此可见反美情绪之激烈。

中国学生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更能象晴雨表一样

反映出人心之所向。他们最敏感。他们的反映更为理智，更带自发性。他们也很少有什么顾忌。中国的学生是极其爱国的，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美好的动机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1947—1948年间，由于螺旋形的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等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学生们愈来愈多地起来闹事。反饥饿运动即为一例。在抗日战争期间，政府曾采取明智的做法，给那些在内地流亡大学里念书的学生提供了生活补贴。尽管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但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忍受了这一切。在国立大学里，这种对伙食和生活予以补贴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然而，由于粮食越来越少，伙食质量越来越差，学生们也就把问题归咎于一个不能为他们带来安定和提供较好生活条件的政府身上。抗击共产党人，不象抵御他们的敌人日本人那样，能够激起人们的爱国热忱。前者毕竟同样是中国人。学生们更为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同情他们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没有出路的反动政府。在所有的学生团体中，沮丧感，乃至绝望的情绪都普遍地存在着。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伙食不好。穿衣、取暖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验设备问题，课堂教学质量和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总之，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与伙食情况一样糟。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苦力和手工业者至少可以挣得相当的工钱去买东西填肚子，以取得所需要的力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比知识分子的境况要好。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最低限度的，多少可以作为衡量他人生活水平的尺度。

就学生们来讲，他们头脑中所想的，多半是保持躯体存在的问题，很少考虑民族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争论。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那些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人，对国民政府一旦垮台将会出现的时局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没有考虑那么遥远的事。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做得极为巧妙，而国民党搞宣传却笨拙得令人难以置信。

(七)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八)

新闻报道经常把美援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国会开

完会以后，美国国内在提供援助问题上的争论变得激烈了。直至1948年的头几个月还在争论。中国报刊对此作了详尽的报道，并经常加上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争论这些东西。最后，当四亿美元的消息一经得到证实，人们在情感上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国民党政府和它的朋友们对之抱着感激的心情，但又担心这一数字不足以保证他们去夺得胜利。共产党人推迟了他们取得胜利的时间表。知识分子摇头叹气，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仅意味着苦难生活的加深，和平的推迟。

令人高兴的是，罗杰·拉帕姆被任命为中美经济合作总署副署长。他对人态度和蔼，谈话亲切，且精明能干，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由地对他表示敬重。他的同事艾伦·格里芬很好地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理想主义结合了起来。他举办的复兴项目选择得很好，计划得也不错。在总署内工作的其他同事，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人设立了一个相应的委员会，其成员都是正直可靠和有才干的人。有一笔一亿两千万美元的款子，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它，不过只能用于军事援助项目。中国人也是照此来理解的。倘若采用经济合作总署的通常做法，这笔充作军事援助的费用或许可以办更多的事，可是那样做就有可能使我们卷入中国的内战。实际上，中国人曾不断地与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方面的代表进行磋商，我们的代表在款项分配问题上有着不少的影响力。

表现美援的一个独特情况是，将它用于农村复兴事业。这也是我个人最关心的一项工作。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认

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孙逸仙在其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原则（亦即林肯式的为民办事的政府原则）中已对这种地方政府的性质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使我想起了晏阳初博士和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吉米”（作者对晏的爱称。——译者注）致力于让文盲识一千个汉字的运动，并在这一千个字的范围内，编纂适合于他们阅读的文学书籍。从运动一开始，我就与他认识了。有好多年，我一直是其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为数众多的燕京学生曾经在“促进会”中工作过，他本人则无私地献身于这一事业长达二十多年。日本人把他赶出了靠近北京的那个试验中心之后，他就迁回家乡省城去了。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的前夕，我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谈到了约请晏博士来帮助制订一项特殊的计划，以便在某些刚刚从共产党人手中收复过来的地区搞居民训练工作。我们俩人联名给他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到南京来参加会议。我们的想法是：在国民党对收复地区的控制还没有真正确立之前，或者说，在共产党人再度占领它之前，“平民教育促进会”应该使用它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员，把居民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或者暴政，并且教育他们懂得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即使是那些地位最低下的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所应尽的职责。晏阳初一到南京，便立即理解了我们的意图，不过，他并不同意我们所确定的范

围。他的想法是，把成千上万渴望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又苦于找不到机会的学生加以训练，而后掀起一个致力于振兴整个国家的运动。他不主张依靠通货膨胀中的中国货币，因这种货币在克服了各种拖拉的公事程序和政治阻力之后，就会极大地丧失掉它原来的价值。他解释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如果求助于美国资金（犹如他在过去不止一次成功地作到的那样），他不仅能办更多的事情，而且还将较少地受到阻碍。我通晓中国人那种凡事总想借助于美国慷慨大方的心理，因此，我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但又渐渐地强使自己感到他是对的。过了几个月，他作好了旅美的准备。之后，他在美国呆了一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抓紧时间，就如何利用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制定了相应的条文。我们极其谨慎地挑选了三位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但不幸的是，这个委员会还未真正开展工作，共产党就接管了这个国家。

（九）

1948年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两项真正重大的改革，从而部分地抵销了所谓政府无法自救的指责。

一项改革是召开了原定于前一年十二月就要召开的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并进行了总统选举。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不正当的舞弊行为，在代表的身分问题上也有争论。会场秩序混乱，人们大喊大叫，行为恶劣。不过，不管怎么说，大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用全民选举的办法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同时，对滥用职权的行为也作了公开的揭露。

大会进行了真正的自由辩论，包括对政府进行公开的批评。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切实采取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工作安排得非常细致，选举确实是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的。没有发生任何越轨行为，显然也没有任何人企图这么做。和往常一样，委员长是主宰一切的因素，他自觉地约束自己，自觉地遵守宪法程序。他所遇到的最糟糕的问题是副总统的选举问题。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统只是一个徒有其名、无足轻重的角色，跟法国的情况一样。委员长并不想担当这一角色，同时，他也不想要求拥有战时的非常权力，尤其是在刚刚开始实行宪政的时候。委员长感到进退两难，确实产生了不想当总统的念头，而愿意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千方百计地想说服胡适博士当总统候选人，但没有成功，只是在找不到他认为合适的人选后，他才勉强同意了对他自己的提名。与此同时，他还向两位军方候选人提出，要他们退出竞选，理由是军官不能身兼文职，说他自己也要这么做。其中一人顺从地退出了选举，然而，另一位却对此极为愤慨，抱怨说，应把这事及早告诉他，因为他公开宣布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已经很久了，并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

另一项改革是在货币方面。当时，物价飞涨，上涨指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地步。即使搞一点点小交易，亦要随身带上一大叠又厚又重的纸币，实在累赘。每个人都试图在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之前将其脱手。人们纷纷推测，诸如到什么时候，以何方式纸币会真的降到毫无价值的地步。显然，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政府领导人研究了这一问题，并于1948年8月19日发行了一种叫做“金元券”的新货币，

限定四元“金元券”合一美元，以政府资产作保证，并由上海一些有能力而又受人推崇的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帮助保持这一比价。每月由他们公布一次数字，对物价和货币的兑换率实行严格的控制，规定一元金元券等于三百万元旧法币。政府鼓励爱国公民将他们的个人财物，金条和银子换成新纸币。对进出口贸易和其他贸易活动，都有严格规定。原先，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起初，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政府表现出了远见、勇气和决心。改革货币的措施虽然不是那么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或许可以说，象原先设想的那样，是行之有效的。中产阶级作了高尚的反应，政府从这一来源中很快就收集到了二亿多美元，但是真正的富有者却采取了明显的规避态度。我们也规劝所有的美国人同中国政府合作，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一勇敢行动。他们都普遍地这么做了，尽管有些新规定对我们的企业利益是十分不利的。所有美国的办事机构都以谨慎和真诚的态度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使中国人重新感到有了希望，产生了一种新的要努力工作的精神。

然而，事情起初是渐渐地，而后便急剧地变糟了。大约在九月中旬，战略城市济南易手给共产党人。这一事件使公

众情绪大为低落。而后是徐州的陷落，这是在阻止共产党人向南京推进中剩下的唯一城市。随之是大量的军需仓库被共产党人夺取，政府部队基本上都丧失掉了。人们已从兑换率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感到了经济法则的不可抗拒性。军事上的溃败必然给不断上涨的物价带来新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是迟早会发生的，除此也不可能出现别的什么情况，因为政府的收入还不到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民众的经济生活变得愈来愈艰难，尤其是那些靠薪水过日子的人。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而且越来越公开地表露了出来。

（十）

满洲（即中国人所喜欢称呼的“东北”）出现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委员长在这一地区所采取的政策是再笨拙不过的了。尽管马歇尔将军对他一再提出忠告，他还是把一个名声极坏而又不称职的部队司令官派到那里，并又指定一名指挥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其他所有的人实行监督。最后，在情况坏到了几乎不可挽回的地步时，他才派了当时的总参谋长去收拾局面。陈诚将军本人没有任何贪污的嫌疑，他及时整顿了种种脱离民众的邪恶行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却未能组建一批新的、能力胜任的军官把部队接管过来，结果让警惕性极高的共产党人钻了空子。陈将军患有胃溃疡，过度的劳累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处理事务多半是在病榻上进行的。不多久，形势极端恶化，他的病情亦同样如此。一名中日战争时期能干的军官接替了他的职务，受命去挽救这样一个濒于绝望的局面。

长春市——日本人所建立的满洲国的首都——被共产党人一连包围了几个月。当时我们多次劝告委员长，让他命令被围的守军在还有可能办到的情况下朝南向沈阳突围；我们还提醒他，一旦冬季来临之后（东北的冬季来得早），守军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可是，他却让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固然那座城市有很大的战略价值，但是，以为保住了该城，就指望将来的某一天能重新收复那个地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虚妄的，也是一种自负的表现。守军的给养完全靠空投，可是空投又投得不准确，有一大批数量难以确定的物资投到了围城的共产党人手里，反倒使他们成了受惠者。行政院院长告诉我，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这一目的。当我问他，我所听到的是否确切时，他仍然坚持这一数字。不管怎么说，为长春和沈阳这两个满洲城市提供给养就是从这一数目中开支的。在济南陷落几个星期之后，果然不出所料，长春向共产党人投降了，全部军需给养和部队都丢失殆尽。为保住长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完全是徒劳一场。当沈阳受到同样包围时，我们又指出，命令该市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从城里杀出一条血路，与长城以内的部队汇合，然后，把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撵走，并恢复那里的铁路运输，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沈阳。可是在老百姓逃的逃，饿死的饿死，而共产党人则在加强他们的包围工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却呆在城里按兵不动。

济南陷落的消息一传来，我就去拜访委员长。我刚一进门，他就问我对这则消息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这就是我要来谈的问题。我并且向他提出，从这一严重不幸的事件来

看，他是否可以停止由他独自指挥作战的做法，而把指挥作战的事宜交给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战略家，让他们去作计划，并在计划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再让他们负责指挥作战。我说，对那些占据重要职务的人，他可以把他们留着挂挂名，实际工作则让那些年轻而又有能力的人去做。对此他回答说，他将予以仔细的考虑，后来切实采取了一些步骤。可是不久，他却突然到了北平，又亲自指挥争夺沈阳和东北的这一关键性战斗去了。他一直呆在那里，直到那支部队受命撤退，最后在撤离中被消灭，国民政府丧失了它在东北所控制的最后一块地盘。

内战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给货币改革自然也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连国民政府的最好的朋友也感到改革是注定地失败了。委员长的长子抱着帮助他父亲把事情搞好的良好愿望，以极大的勇气和干劲，在上海采取了严厉的办法实行金融管理。可是货币改革作为一项措施，一开始就采取了试图以警察国家进行压制的办法去对付经济法则的做法，从而在上海制造了众所周知的“恐怖的七十天”。各行各业遭到了破坏，民众受到损害，谁都感到愤愤不平。商人偷税漏税，而且还有可能发生暴乱，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委员长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儿子调离。后来，虽则对有关条例作了修改并加以宣布，但是，经济处于病态，它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仅仅施展一些权宜之计已无补于事了。同时，因货币改革，在采取一些新措施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出于信任，把他们的金条、银子换成纸币之后，只落得私人积蓄实际上已化为乌有的结果，他们对政府就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情绪。

那是秋天，罗杰·拉帕姆和他那个能干的班子所领导的经济合作总署正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里做着大量减轻民众苦难的工作。根据一项与中国当局共同安排的办法，经过协商，对粮食实行了定量配给，但是，由于军事形势和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项工作基本上成了美国一手包办的事业。上海和南京都相继发生了抢米事件，由于及时采取了向市场供应粮食的措施，才使这类事件得以制止。在北平和天津两地，贫苦难民流进城市，以致市民大量增加，当时也是由于采取向市场提供粮食的办法，才大大减轻了傅作义所面临的困难。由于共产党赢得了胜利，一些复兴项目除了作些初步的工程研究之外，大部分都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借口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在指定中美双方成员问题上拖了时间，之后，又无谓地花费好多个星期去消除意见上的分歧，以及另行做组织工作。

就这样，本来在基层可极其有效地用来对付共产主义的美国援助，在安排事宜方面就白白地消磨了几个月。在和平来到之后，经济援助除了在短期内提供部分紧急救济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示外，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由于受援者是一个进行着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的政府，对它所提供的切实而明显的援助引起了人们的仇视，因而美援所起的作用也多半由此给抵销了。就国会投票赞成给中国四亿美元援助的意图而言，这笔款子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还不如当初不给为好。我们要么花更大的力量去阻止共产党人向前推进，然后在有安全保障并排除了共产党人的地区内推行经济改革；要么就完全罢手中国的事务，让中国人自己去寻求一项解决

办法，在值当我们提供援助，而且中国人民也感到有此需要时，我们再去帮助。

(十一)

满洲的陷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林彪所领导的三十万军队从战场上解脱出来，重新开进长城去夺取北平和天津。他们在人员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那两个城市的勇敢保卫者傅作义的部队，使后者大有被吃掉的可能。在该区域内，美国侨民的人身安全日益受到了威胁，劝他们从该地区撤离的问题也就变得紧迫起来。美国大使馆无权命令他们撤离，而只能进行规劝。从1911年开始，中国国内曾一再发生内部动乱。以往，在我还是一个普通侨民的时候，我们的领事当局也曾多次对我们这些侨民进行过同样的规劝，让我们撤离。当时，我们总是认为，领事当局行事过于谨慎，或者认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卸掉自己身上的责任，并非是关心我们。而现在我从自己做大使的角度上再来看这一问题时，便体会到了当时领事当局的苦衷。在北平大约有六百五十名美国人，天津约有二百多人。一旦撤离，许多侨民就得放弃他们本身的工作，他们的终身利益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在燕京大学，我也有一些我热爱的、感情上丢不下的同事，一想到他们就使我心碎，而且我知道，他们在指望着我给 他们出主意，犹如我仍然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一样。再则，因为谁也无法逆料，共产党人会犯下什么样的暴行，也许在情况变化后，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变得束手无策。一旦紧急情况确已发生，那就为时晚矣，进攻者肯定会当即采取行

动使机场瘫痪，并切断铁路线。

除了这些使我感到困惑和棘手的情况和问题外，更令我忧伤的是，要我丢下我与中国人所结下的友情。国民党政府为求得生存，正在作拼命的挣扎，要是大使馆此时告诫其侨民作撤离的准备，对民气就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要是把事情弄成这样，那便是对问题欠考虑，或缺乏善意，几乎可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打击。在中国，人们把友情摆在甚为重要的地位上，我国是他们的朋友；我个人既是大多数高级官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如果是对一位与他们没有如此亲密友情的大使来讲，要那样做，或许情有可原，可以说得通，他可以履行大使的正常职责。他们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同情而已。因此，我以劝阻的办法，让使馆的同事们按我的意见，在不构成失职行为的情况下，尽量延缓撤离侨民的行动。

按照惯例，我们把事情通知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他们随即向呆在北平的委员长作了报告。委员长给我拍了一封内容冗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向我们的侨民预先发出通知（无论如何，至少不要将此公开出来），他并向我保证，他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我们所有的侨民。既然一个国家的首脑提出了这样的恳求，那就不能忽视了。我答应暂缓几天再发出通知。当时在我看来，我们把通知内容公布出来会更有利于中国政府，不然肯定会出现一些带有歪曲性的谣传。我们推迟了四天才发通知，而通知一经公开，就立即出现了不少慌乱。其实，我们在通知中所说的，是那些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变动都不愿意继续呆下去的人，应当趁交通仍然畅通之

际，作出离开的准备。我们很快就向住在华北的侨民们发出了一份措辞较为强烈而带有警告性的通知，用明确的语气劝告所有那些没有“切实理由”需要留在当地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健康不佳的人，利用我们的交通工具立即进行撤离。不久，我们也向我们所有的领事馆所在地发出了类似的通知。所有这些，在中国人之间都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他们认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变有着特殊的消息来源，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象往常一样，总是受到人们密切的注意。国民政府领导人也责怪我们在民众中引起了惊慌。毫无疑问，我们确实助长了人们疯狂逃窜的倾向。不过，这是早已开始了的，而且不管外国人如何行动，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共产党司令陈毅继夺取了济南之后，挥戈南下，开始向南面的徐州方向挺进。徐州在南京以北二百英里处，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那里有国民党最大的一支部队，军需品供给也最集中。在国民党官兵中笼罩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人们普遍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可能打散他们，也有可能绕过徐州直奔首都，但委员长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部队，使他们恢复了战斗的信心，最后说服他们放弃徐州，让他们在撤退时带走所有的装备，并设法把所丢下的一切东西统统毁掉。陈毅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着。但在他那位只有一只眼睛的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的部队不久就包围了从徐州撤出来的国民党军队。徐州以南的整片地区都成了战场，参加作战的士兵大大超过五十万人。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政府部队兵员不断受到消耗，或被打散，或向南撤退。但共产党人遭受的伤亡也是惨重的，他们的军需品的消耗也是大量

的。人们都极为忧虑，纷纷推测着事变的进程，并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共产党人迟早终将打到南京和上海，为了免除这两个城市的刀兵之祸，他们也都想着能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解决。

（十二）

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货币贬值和民众严重不满的形势下，委员长的孤寂形像显得格外突出；在那些犹豫不决，一筹莫展的同事中，只有他还能镇静如常，安之若素。他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是意识到这种种不祥之兆的。在他一生充满危机的事业中，常见的情况是，他成功的机会每次都是很小的。然而，由于他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加上时来运转，事情到了转折时，总是给他带来幸运。这两者总是结合起来，曾使他不止一次地度过了天大灾难，走向胜利。他在和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威胁作斗争。地处太平洋对岸，对他怀有同情心的强大盟国，亦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美国——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去把她唤醒，使她看到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好了——会再一次来搭救他的。与此同时，委员长自己必须坚持严酷的斗争。

自九月份起，委员长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极力主张我跑一趟华盛顿。十月份，外交部长王世杰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会议，数次与马歇尔先生在巴黎作了长谈。在会谈中，国务卿问起了前行政院长张群的情况。会谈是如此之友好，以致在王博士把会谈的实际内容向委员长作了汇报之

后，后者决定将张群派往华盛顿。幸而张先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使他相信了他的使命将是徒劳的。从马歇尔国务卿同王博士本人的谈话来看，从杜鲁门总统就委员长紧急呼吁所发的字斟句酌、语气委婉的回电来看，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在递送那份电报时，我要求那位搞翻译的年轻中国文书明确无误地译出电报原文的本来意思，说明美国总统尽管用语友好，但他是无法就委员长要求给予迅速而大量军援一事作出允诺的。中国人讲话婉转，好用遁辞，他们不喜欢冒犯社交礼节而采用赤裸裸的语言去陈述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因而，每当我们美国人相应地讲求礼貌时，鉴于对方知道我们说话直言不讳，我们的讲话往往给他们以过多的愉快，而收到了超过我们所预想的效果。有关王博士在巴黎和马歇尔先生的谈话所作的报告，其经过情形可能就是如此。不难理解，王博士想显示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同时，各个报纸在社会公众感到沮丧失望的情况下，对任何能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事情也总爱大事渲染一番，这也就进一步促成了上述情况的发生。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委员长对他的事业和前程怀有信心，同时，还在于他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相信他一定能获得美国的援助去同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战斗。

（十三）

1948年感恩节午后不一会，蒋夫人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约请我即刻去见她。我一到达，她就告诉我，她通过穿越太平洋的电话线，于前一晚深夜（美国东部时间）同刚从华盛顿到达利斯堡的马歇尔先生通了话，谈了有关她去美国

访问的事。我极想劝阻她放弃这次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美国之行，但是，我不好开口，只好帮助她作好实际安排，以便使其一行尽早起程。后来，在委员长向我问到蒋夫人是否就此征求过我的意见时，他说，但愿她事先征求了我的意见，并补充说，对这种冒险行事的做法，他个人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几个月的经历使我伤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这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力消耗殆尽，各阶层的老百姓遭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苦难，却又束手无策。人们遭到野蛮的屠杀，或是惨死在饥饿中，无人过问；在共产党人制造的恐怖中，他们贫困交加，沦为难民，加上政府部队的官兵进行无耻的抢劫，受害的人数越来越多，实在无法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同样可悲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沉于沮丧，对共产主义的憎恶和恐惧心理非常普遍；但是相比之下，政府的官员和军队所造成的坏影响也与此不相上下。总之，人们认为，他们目前的境况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委员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有着许多优秀品质，使我与他感情相通，对他产生了莫大的敬慕之情。我曾见他作为整个民族抗日意志的化身，得到了全民族热情的支持。当时，人们对他表现了由衷的忠诚，并心甘情愿地与他分担所有的艰难困苦。而现在，当他认为不得不进行一场在他看来已是输掉的战争时，他们却变得冷漠无情，并毫无顾忌地指责他。两相对照，实在令人痛心。

十一月份，翁文灏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接着，委员长试图让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博士组阁，但也没有成功。

当时，没有人愿意担当这一工作，但是最终孙科被说服担任了这一职务。人们希望，这位孙逸仙的儿子，作为团结的象征，对党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至少能起到某些弥合的作用。事实上，人们还是普遍地感到诧异。因为孙科本人是主和派，他毅然决然地要求赋予他负责的行政院以正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他是在去上海一家医院做手术之前接受该职的，从而拖延了组阁的时间，致使在国家处于危急之时，一时竟没有一个能起作用的内阁。

十二月中旬，孙科回到首都，开始组织内阁，但是他只是徒劳了一场。因为在未曾弄清本届内阁将采取何种政策之前，谁都无意参加。这是当时局势呈现暗淡，孕育着危险而又叫人感到忧伤的情况下演出的一场滑稽剧。一天早晨，他请我去会见他，并再次向我询问有关美国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给他谈谈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意见。他问我是否与共产党人有直接的接触。当我给以否定回答时，他自己对如何才能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这点也表示怀疑。自那次会见之后，他就公开责骂美国方面的怠慢态度。在发生以上这些事情时，委员长召见了吴铁城，此人是一位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属于那些对参加内阁持犹豫态度的人，但是他却又同情孙科对改革所作的努力。委员长命令他当行政院副院长，让他切实取得对行政院的控制权。

（十四）

其时，纵然委员长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他却不得不

面对一些严酷的事实，能动用的军需储备物资几乎已被全部投入到首都以北一百至二百英里这样一个广阔的战场上去了。政府的这一场战争象往常一样损兵又折将，实际上业已输定了。从九月底起，金元券的表面币值已经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八。公众的和平呼声日益高涨。为了和平，白崇禧将军作为一位最高层的军官，从汉口给委员长拍了电报，向他切实提出了引退的建议。中山陵附近有一所漂亮但从未被占用过的官邸，经蒋介石和蒋夫人作了一番改造后，成为一所“凯歌”型的内部教堂。这所教堂是专门为在政府内任职的基督教徒们设立的，蒋本人就到场唱圣诞颂歌，歌唱圣诞之夜。圣诞节那天（亦就是他从西安释放回来的第十二周年，即他所提出的那部宪法得到通过的第二年），他作了引退的决定，并且宣布，副总统将拥有全权采取任何为民族谋福利的方针、政策与行动。他当即解除了总统府里那位可尊敬的秘书长的职务，并指定另一个人——也姓吴——为这一重大决定作了仔细的井井有条的安排。吴先生取得了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他们一起拜访了李副总统，打算由总统宣布引退，而后由副总统随即发表一篇措辞严谨的声明，呼吁举行和平谈判，建立停战秩序。

正当前一个文件着手起草，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时，共产党人广播了一份以委员长及其夫人为首的、约四十五名“战犯”的名单，从而激怒了委员长。那些进行这项筹备工作的人都担心委员长会改变主意，而他的确改变了主意。他急忙召集全国主要军事将领，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议。对委员长本人和其他有关人士来讲，那是可怕的一星期。我

不断得到会议的有关情况，但我尽量谨慎处事。谣言纷纷而起，每个人都急切期待着确切的消息。每逢新年，委员长总是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的内容通常约于一星期之前就公布于众。但这一年，直到元旦前一天的下午才把文告起草好，并准备译成外文，预以散发。那一晚，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是在委员长的官邸里紧张的讨论中度过的，以此送走了旧岁。但是，从第二天早晨各报发表的文告来看，并没有作任何的变动。总的来讲，那是一份不失尊严和大义凛然的声明。然而它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在对待那些制造骚乱的谋叛者问题上，它采取了一位有着巨大权力的统治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仁慈的姿态，但却忽视了政府所面临的绝望处境。这份声明为这个国家的和平开辟了途径，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和平，声明中却并没有包含任何带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十五)

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之前，最后两年在军事史上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这并非是说美国或者中国在此期间做了多少应受人称颂的事。通过马歇尔的调解，看来有可能促使联合政府的成立，美国军官可以从中负责把交战双方的军队加以改编，组成一支单一、精锐的而在数量上却又大大减员的国民军，创建包括有海军、陆军和空军等这样一支具有严密组织的军队，并使它具备一切必要的兵种和武器装备。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军联合军事顾问团”所要做的工作。“美军联合军事顾问团”正式成员包括五百多名军官和人数与此相接近的

士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军官，都带有随军家属。根据达成的协议，由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所谓地方性的开支。但是，因为该政府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穷，同时由于货币贬值，这一开支给其日益减少的财政来源带来了莫大的消耗。原来的设想是，按照西方最高标准，制定一项计划，将中国军队现代化，从而不再自相残杀。

这些冗长的讨论占去了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这期间，“美军联合顾问团”没有发生变动，一直忙于为国民军制订新的体制，忙于部队的训练任务。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和平将再一次得到恢复。1946年年底，在谈判最终破裂后，“美军联合顾问团”无疑仍然以为会取得某种妥协，它为中国的和平和进步作出贡献的希望终究会实现。当时，要是取消了“顾问团”而又没有别的机构来代替它，那就意味着放弃了一切希望，不再支持国民政府了。但是，如果保持“顾问团”，那么在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意味着美国给予他们的敌人以更多的帮助（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加深了他们激烈的反美情绪。

实际上，“美军联合顾问团”仅在允许范围内对中国军事体制的重建和军官或者新兵的训练提供理论指导，它的工作只是在陆军少将戴维·巴尔于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后才出现了例外，他可以推心置腹地就一些战役问题非正式地向委员长提出建议。巴尔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军官，他向来是竭尽全力地去对付困难局面的。为了使他的指导变得有效力，就需要有部下的支持，由他们去与中国地区指挥官和下级军官，与军需供应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保持直接的

接触。而要使中国人能够把他的指导加以贯彻，并取得应有的效果，充分的物质保证是必要的。委员长对巴尔将军很器重，对他的建议总是留心听取。但是委员长并不完全根据军事因素和新的科学的后勤学去制订作战方案，他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

“顾问团”建有辅助性的机构。并在地方上设立了驻扎点。这自然引人注目，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党人认为，我们是在反对他们。而另一方面，由于“顾问团”名声不好，开支又大，政府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由于时运不济，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军联合顾问团”所从事的一切活动，纯粹是凭借臆想在训练一支假设性的武装力量，而这种假设是永远实现不了的。

就其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有教训可以吸取。一般来讲，军官们在能力上是称职的，他们血气方刚，并且都有心要把工作搞好，为了使他们在工作上感到如意，让家属跟着他们一道生活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住房问题很尖锐的首都，中国当局得事先腾出其它单位所急需的楼宇，或者以空前的规模建造一些公寓住房，并加上一切必要的辅助设施，以满足那些讲排场、图舒服、习惯于美国生活标准的人们的需要。然而与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中国人相比，他们的生活是奢侈的。尤其是在生活条件变得较为艰苦的情况下，除了最高一层的官员外，他们在生活上与维持一般收入的官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何况在叫人感到不胜厌烦的国外生活中，那些可爱的美国军官的夫人们满怀天真地想寻找欢乐，她们又情不自禁地向人们炫耀她们在经济上所

处的优越地位。南京大街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美军联合顾问团”的车辆，数量之多也似乎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应召前往该国的士兵们对中国人撒酒疯或与他们发生冲突，纵然我们纪律严明，这种事情发生得不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潜在的反美情绪就会爆发出来。要是军官们都忙于筹划作战的事，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带上随军家属了，而且如若在严酷战争的环境下，人们对这样一些对比多半也会能容忍，共产党人的攻击也就不至于那样激烈了。

经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数字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在如何使用这笔款项的问题上也没有任何的限制。然而，中国人购买物资时总是小心翼翼，凡事总要与巴尔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商量。1948年，一切已变得为时已晚，大量的定货物资还未到达，而且到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恶化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美国的装备只是推迟了最后的结局到来的时间。为此，不但共产党人仇恨我们，就连那些心里没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识分子也仇视我们，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政府也抱怨我们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们遭到了中国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虽然“经济合作总署”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和提供救济，使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但是在阻止共产主义方面，却收效甚微。

美国以军事援助结束内战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使人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原因何在？1946年底，共产党突然中断了马歇尔的调停，但那时，政府在这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首先，它是中国公认的合法政府，有着极高的威望和与

此相应的物质手段。它占的地盘较大，有一支庞大而装备精良的陆军，又辅之以海军和空军，除去质量低劣这一点外，这都是对方所不具备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物质和财政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其价值大大超过了二十亿美元，主要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

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推翻一个衰落的异族朝廷，接着又打倒地方军阀而上台的，当时它的主张是消极的，并不抱有要推行民主和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一些较为积极的目的。尽管在“三民主义”和官方用语中，就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问题作了强调说明，但更为紧迫的却是军事问题，后来是抗日问题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冲突问题。在忙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人们于不知不觉中又见到了那些长期来表现于中国官场中的弊病，诸如营私舞弊，把家庭、朋友和派别的利益置于国家事业之上，讲面子、拉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和办事无能等。

这些弊病或许在部队军官中表现得尤为普遍。一般士兵仍和过去一样，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他们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而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然而有许多人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闹得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指挥官们对部队的军饷的控制权过大，在军事指挥上却很少有自决权。如果不是蒋委员长坚持不懈地努力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情况还会更糟。1948年下半年，部队士气明显地急剧下降了。

部队通过海上和空中——主要由美国提供舰只和飞机——进行长距离调动后，在人员上受到大量伤亡或被共产党人打散的情况下，又得再转移地方。海军仍处于萌芽状态，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并未显出它的作用来。在忙于向共产党部队发动进攻和进行围剿的情况下，为保卫一些注定要丢失的城市而构筑工事和挖壕沟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进行这种消耗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而共产党人却在巧妙地利用他们有限的资源。我们出于慷慨所提供的飞机、舰只和卡车等物资给中国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破坏作用，阻碍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使他们产生了依赖思想，过多地依赖于部队的机械化。他们缺乏经验，不善于使用机械，在金钱问题上也依赖我们，养成了一旦没有钱花，就向我们伸手要的习惯。

（十六）

我在这里把我担任大使期间中美两国合作交往的情况写下来，与其说是要对过去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毋宁说是要以过去的失败为借鉴，作为今后的指导。

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获得独立、统一、和平和经济复苏，进而实行民主政体。这些也正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所希望的。就我来讲，我怀着双重感情表示衷心的拥护。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

不过，我却辜负了他们。我未能成功地协助马歇尔将军使双方取得一致，进而达成协议；未能帮助消除双方的恐惧和猜疑，这就是我当时所认为的未能使双方取得一致协议的主要障碍。谈判最终破裂后，我也未能对那些能左右美国和中国政治动向的人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而产生建设性的效果。

与此同时，美国完全改变了过去由我们参与组织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即便按照最理想的做法，由中国人自己实行联合这一点，美国过去的政策也全然改变了。在那充满了事端而又令人不愉快的两年里，尽管我们对全球性的共产主义增长了不少见识，但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上，这种对全球性的共产主义的认识却又反映了我们的矛盾态度。在中国国内，我们当初不顾国共双方相互抱有猜疑而敦促他们团结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的问题基本上仍是过去的老问题，只是双方间的这种联合现在比过去更难于实现了。

是不是我们过于天真，凡事从不怀疑，以致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共产主义的本质，或是我们过多地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实行根本的和带有戏剧性的改革呢？要是有了办法，我们会照着去做吗？

我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进步的国家，在技术上接受美国的指导，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拨款和贷款的帮助。尽管我的梦想落空了，但我仍然认为，我的梦想是对的，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有着坚贞不屈的美好品德，同时，也是由于我对自由社

会所实行的民主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中国毕竟是一个文化统一的国家，它在历史上、经济上以及家庭关系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根底。最近，不只一个国家的情况已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策略所造成的危险确确实实存在着。要避免这种危险，最可靠的办法是，在民主事业的领导人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觉悟过来，忠诚于公共福利事业，按新的标准办事。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要是老百姓对民主问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么，这样的民主将永远是不可取的。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只有在老百姓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价值，要不惜代价地去维护它时，才能防止共产党人进行阴险的渗透，抵制他们的极权主义哲学和不择手段的行事方法。如果中国凭其传统在国内求得和解，在寻找中间道路的过程中避免走极端，并且能够容易地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这对问题本身不是不无好处的，因为，原则是永恒的，在人类的内部和围绕着人类显示出来的精神力量是最强大的。我相信，我对中国所抱的梦想也必将成为现实。

十一、日益加剧的困惑

1948年的告终，在中国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的结束。然而在最后数周里，当委员长周围的世界碎裂时，他表现得极为沉着勇敢，坚毅顽强，运筹帷幄地制定着计划。

圣诞节那天他作出了引退的决定。他指示一些亲信安排了详细的程序，让李宗仁副总统接任他为代总统。他希望有条不紊地移交权力，继续反共。他在新年文告中表明了和平诚意及引退的打算。但是他要求共产党人接受他的五项条件，作为他引退的前提。

一个礼拜过去了，共产党人除了在广播里讲些挖苦之类的话外，没作任何答复。政府断定和谈已经遭到拒绝，于是计划保卫首都和迁都去广州。第二个礼拜的周末，毛泽东在广播里作了尖刻的回答，最后提出了他自己的八项条件，同时命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这使政府领导人更加六神无主。那八项条件极其苛刻，几乎等于让人无条件投降。第一条就是交出“战犯”。

共产党的军队分三路向南京正对面的长江北岸及其东西两侧的渡口挺进，实际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政府愚蠢地派了四个军过江妄图进行堵截，结果当共军进逼时只得撤了回

去。在南岸附近一带的小山上挖战壕、修碉堡，又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所有身居要职的领导人都看得很清楚，战争这样打下去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投降又太丢人。想当初，他们艰苦创业，自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以后一直所向无敌，抗日战争又取得了胜利，成了联合国“五大列强”之一，怎能咽下这口气。

政府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权宜办法，他们求助于我向另外四个列强国家交涉，尽管我指出那样做无济于事，但我还是照做了。我请求四国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有关国家政府也都及时作了回答，但都婉言拒绝了。实际上是说这个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权者来讲，这种拒绝本身就是桩叫人受辱的事，可是在中国，党和个人受辱丢脸以致再不能出头露面这一点几乎比现实本身更叫人难以忍受。大约在我请求四国进行斡旋的一个月之前，政府曾匆忙地决定迁都去广州，后来又同样匆忙地取消了这一决定。但是由于找不到别的出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又作出了迁都的决定。其后，事态的发展立即暴露了国民政府领导人中的内部矛盾和他们许多人之间的个人矛盾。这一点从我同许多人的个别交谈中看得很清楚，他们每个人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想探听美国政策的虚实，或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以解救他们的燃眉之急。

我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在口头上表示一下同情，并打消他们把美国当作意外救星的念头。

(二)

国民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样有助于维持它的威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应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我的公使衔顾问刘易斯·克拉克受命带着一批工作人员前往广州。在那几个令人迷惘的礼拜中，北大西洋集团的各国大使一直在非正式地举行聚会进行商讨。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暂留南京，且各自都受到了自己政府的支持。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和所有其它国家对美国的决定都抱着尊重的态度，这使我不由地想到了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新地位。一些小国指示他们的代表跟我们一样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苏联大使是唯一迁往广州的使团团长。他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解释说，他的政府之所以命令他那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们留在南京遭人流言蜚语。苏联在这点上好象是十分讲究外交礼仪似的。

而国民政府也有它自己的难处。临时首都究竟定在哪儿，意见很不一致，甚至在孙科平安抵达广州后，他仍然认为首都在南京。原来决定各部首脑应当留在南京，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却闲居上海或者到广州去了。倒霉的是下级官员，他们的困境可以从外交部下属二百名人员的遭遇看出来。他们带着四百名家属刚开始他们漫长的行程时，就在那拥挤不堪、列车时刻极端混乱的火车站上等候了大约三天。后来终于乘上了火车，可是在去上海的途中，为了给军队让行，他们同其他所有的乘客又被赶了下来。最后听说他们还在吴淞为等候南下的轮船又延搁了一个多礼拜。卫生部的另一批八十个人

在上海等候了四十天。政府各部门办事拖沓和那股混乱劲就可想而知了。

(三)

共产党人在广播里对委员长的新年文告作了一个礼拜的指摘。之后，委员长不声不响地乘飞机回到了浙江他那风景如画，离海岸不远的山区故乡。1949年元月22日，李宗仁副总统担任了代总统。但是委员长在陆、海、空军中忠诚的部下都需要他，而且只听从他的命令。这突出地说明了他那专断的个性和中国人的忠贞不移的崇高品德。委员长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要他无动于衷，不闻不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宗仁代总统几乎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地位。李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强烈地感到，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当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委员长已经为此开辟了道路，而且政府已经正式赞同。但是在这危难当头的时刻，政府却舍弃了李宗仁，让他几乎只身一人留在首都。共产党的先头部队就在大江对岸。他们每天都在广播里对政府进行嘲弄，说它优柔寡断而又分崩离析。他们在广播里还节外生枝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留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受那些仍然听命于委员长的军官指挥的。货币日益贬值；遵照委员长的命令，政府将其所据有的金银和其他的流动资产运往台湾。由此可见委员长誓于共产党人战斗到底的决心。民众是要和平的，而且一般都认为共产党人会获胜。李本人也列在战犯名单上，共产党人要求先交出其他战犯作为和谈的起码条件。李单独留守在被遗

弃的首都，虽然内部有内讧，外遭共产党人的鞭鞑，他还是勇敢地继续努力争取和平。前往北平开道的非正式代表团都遭到了共产党人有意的冷落。

(四)

就我本人而言，1948年的最后一两个月和1949年的开头几个月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当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对我讲过的一席话，意思是说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的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作作解说之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记得那时我很想知道美国的代表是否只需当一名观众就行了。哪想到我现在就正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里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

前一出戏至少尚有明确的联合抗击强寇的英雄主义气概，而这出戏却成了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大搏斗，一方推行被无能的官僚主义败坏了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另一方要求对被共产党人的教条、偏狭和残酷行径所糟蹋了的一场巨大社会改革运动表现屈从。广大的民众有着不可名状的苦难，他们对哪一种思想体系也不喜欢，然而却毫无左右形势的能力。

我曾徒劳地打算象往常一样到燕京去过圣诞节。但是当时战争已漫延到北平地区，要是我在那里露面，一定会引起不利的新闻宣传。在安排旅行时我也考虑到这点，尤其是在强烈的和平愿望开始高涨时更是如此。多年来，我在燕京都是通过给教师某一年龄以下的孩子举行一次午后聚会来庆祝

圣诞节的。开头只有少数我特别喜爱的孩子，主要是一些美国孩子参加，后来迅速地扩大到所有适龄的孩子。最近几年人数达到二百左右，绝大多数是中国孩子。北平城里是买不到食品的，我事先从军需官那里弄到了一定数量的可可、糖果等等，而且听说这些东西在共产党关闭城门的前一天就送到了城外的校园里。虽然学校不久即落入了共产党人之手，但是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和宗教仪式照常举行，并未受到干扰。

尽管我因不能在自己最称心如意的地方欢度节日而十分失望，但是我对最后被迫留在南京也感到高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几乎把大使馆的全部“随员”和其他无关紧要的人都送走了。能在我的新家庭的成员中保持圣诞节的气氛，并在他们孤寂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他们，那也是很愉快的。过去，我曾两次打算在圣诞节前夕为当时滞留在南京的燕京校友举行一次庆祝会，可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即使那样一次私下的聚会似乎也是和时局格格不入的，所以一天晚上我请了他们中大约二十名主要人物吃晚饭。我们精心地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并举行了适当的仪式，这样我的家就在那日益加深的忧都中平添了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五）

在事态迅速发展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和我本人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委员长和他的同志们原以为托马斯·杜威的当选实际上已经笃定，并且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会获得及时的强有力的军事援助，而不再象杜

鲁门和马歇尔那样行事优柔寡断了。随着总统选举的令人出乎预料的结果，美国的干涉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就完全成为学术探讨性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时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条件，委员长都会欢迎我们进行干涉的。

十二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动了大手术，接着便辞去了公职，这使我深为震动。我对他的伟大人格十分敬重，凡是同他亲密共事过的人无疑也有同感。由于我是由他选中担任现职的，事先曾讲定过，他需要我当大使多久我就任职多久，更别说我早已超过退休年龄了，所以我自然应该跟我的上司一起离开。在我受命时艾奇逊先生是副国务卿，马歇尔先生在职的最初几个月他仍继续担任该职。我同艾奇逊虽然相隔千里之遥，但还是比较熟悉的。我想使总统和他不要为我的去职感到为难。可是他们希望我继续留任，等到中国的混乱局面稍为明朗化之后再从长计议。

(六)

这自然就会引起人们去注意中国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我同它的关系这样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马歇尔将军开初之所以让我协助他去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那是因为我享有美国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名声，我对中国人民都是友好的，不偏向任何思想集团或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许多燕京学生已经“上山了”，而且正如我后来所碰见的那些学生常常向我保证的那样，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辜负燕京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我自己极力主张自由，所以我只能躬行笃实，给予他们选择

自己道路的权利。在马歇尔进行调停期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消除双方的猜疑和误解。当时成立联合政府的主要障碍也许并非来自这种猜疑和误解，而是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对立思想体系。

但是在1947——1948年期间，马歇尔国务卿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的经验也是整个美国的经验，并且得到了西方广大舆论界的支持。人们终于认识到，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受热衷于搞世界暴力革命的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它将操纵任何联合政府，并利用它的力量助长极权制度的罪恶。一句话，共产主义是对自由制度的严重威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我们要在一切战线上提防它，同它作斗争。

我终于接到了最明确的指示，叫我不要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去协助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这样，美国的官方政策就完全反过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无疑是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传统的。但是中国社会有其固有的历史、人口和其它方面的因素，不可能对这样一个众多而混乱、在其领导人中甚至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居民实行极权统治，所有这些会不会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发生变化呢？在共产主义迅速得势的这一时期，美国报刊的舆论反应出普遍存在的恐慌情绪，并且对国务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谓的中国问题权威们甚至晕头转向了，这可以从我的两个好朋友，斯坦利·霍恩贝克和纳撒尼尔·佩弗二月初在纽约市进行的一次公开辩论的报道中窥见一斑。霍恩贝克执拗地认为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恢复战斗力不是不可取的，佩弗则坚持主张我

们应全部撤出，不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的内政。难道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我们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建设性地为中国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使我们所忧惧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失去其作用吗？在这一场纷乱动荡之中有许多指导原则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民急切向往和平。

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局面。美国是在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中诞生的，而且首先在世界上建立了真正的共和制政府，这个政府经受了连续的考验，显示并增进了它的生命力。我国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众所周知的友好援助曾激励了中国的革新精神。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就是对林肯的不朽的民生学说所作的精辟解释。以苏联模式为标准的共产主义已经蜕变为虚有其表、弊病百出的极权主义。然而在中国，那些依靠解放和民主口号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却一直在谴责我们是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支持了反动势力和腐朽的官僚制度。

(七)

日益高涨的和平愿望终于变得具体了：组成了以卓越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为首的“人民代表团”，其中包括尚未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杰出的国民党官员邵力子先生。颜博士曾出使莫斯科，我还记得他返回时曾告诉我他在那儿的生活很是沉闷。俄国人谁也不敢同外国人交往，所以外交人员只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轮流请客，总是见到同一些人、吃同样的东西，没有别的消遣。他幽默地向我讲述了现代外交语言的粗暴无礼，与他过去在欧洲各国首都从事外交生涯时的语言

和外交礼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和平使团的成员除邵力子先生代表国民政府之外，其余都是上海的知名人士。由于行期一再拖延，他们担心共产党的态度生变，终于在1949年2月14日乘飞机出发了。颜博士是第一次乘飞机，他担心心脏受影响，就带了一名医生。他们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而且带回了有希望实现和平的信念。不能指望这一探索性的使团制定出和谈细节，但是共产党人答应在3月15日之后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尽快去北平进行和谈。颜博士和邵力子先生又从北平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就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到了石家庄才知道还得坐吉普车沿乡村土路到三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等到走完全程，他们已累得动弹不得，只好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腰酸背痛。对颜博士而言，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经历。同时他还瞥见到，即使最高层共产党人的生活也是简单朴素的。但是颜博士惊奇地发现这位著名的共产党统治者原是位友善的、有时甚至是快活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早先想象的一个严厉的苦行者。

这个使团在2月27日返回后所造成的乐观情绪大大地加强了代总统的地位。当时，他曾飞往广州去敦请行政院长回南京，这一高姿态使他深得人心，表明他愿意为政府的团结以及和谈工作不遗余力。在中国，一位国家元首这样屈尊就驾可比在美国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孙科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或者拒不服从——那就会使他的事业完蛋；或者去南京，那儿行政院已经集中了法定的人数，并且正在谴责他迁往广州。最后他终于回到南京。

(八)

我一直打算在本回忆录的某个地方，对我一生中在中国所认识的，尤其是近年来同我正式交往过的美国军官表示敬意。这里似乎就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主题谈的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相互影响，同时也因为这些美国人是由他们自己的传统和环境铸造成的。在北京时，我曾无意识地认识了我们大使馆的海、陆军武官，以及一连串的海军警备队队长和一些偶尔来访的军官。在我从日本人的监禁中获释后，我见到了更多的到北平来的军官；当我去昆明、重庆或上海时也见到许多军官。

我是在上海乘飞机去美国的前夕认识艾伯特·魏德迈将军的，我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亲自了解到他的优秀品质。不过，我对美国军事人员的这一总的良好印象，是在我们都正式代表我们国家在中国的利益而亲密共事时才变得深刻的。即使一个外行也能看出他们那种特有的才干和高度的责任心。作为一个美国同胞，我为美国有他们这样的人感到骄傲，并且十分珍惜他们的友谊。我最早认识和最敬仰的人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我多次见到的人中，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有：大卫·巴尔少将、奥斯卡·巴杰尔海军中将、弗朗西斯·欧德海军少将、司徒亚特·默里海军上将以及我自己手下的全体海、陆军武官。我对我所认识的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亦同样抱有好感，不过，我认识这些人的机会有限。

当然，我知道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我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对美国军队胡吹乱捧，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优良素质能在他

们中国同行的身上再现出来，要是中国人有同样的机会，我相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军队，不仅是因为技术训练好，待遇好，而且也是因为我们有着高度的民族文化。我曾经就近对他们进行了观察，显然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宗教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今天中国的可悲境况主要是由于它的军事体制的现代化只虚有其表，军官们在科学训练和道德标准两方面也都很差。不管我们对战争多么恐惧和憎恶，我们可以为美国和全人类感到庆幸的是，在历史的这一大难关头，我们产生了一种优越的训练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把国防的重任交托给由这一制度培养出来的军人。

(九)

在日益加剧的政治动乱中，三月间一个阴雨的礼拜六下午发生了一个愉快的插曲。那天在我家里为傅泾波的二女儿多茜和李天铎博士的儿子理查举行了婚礼。李天铎曾是我在金陵神学院里的学生，后来担任了该院院长。这样，这一对迷人的年轻伴侣(我精神上的孙儿孙女)就把金陵神学院同燕京大学结合起来了。傅夫人和傅约翰也都从上海来了。我的会客室里堆满了代总统和其他中国朋友送来的花篮。我用两种语言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仪式。理查和多茜互换了戒指，接着便端来茶点，客人们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交谈。这是外国传教士、中国教士、政府官员、燕大毕业生以及大使馆人员(包括穿军装的海、陆军武官)的一次不寻常的聚会。它象征着我在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一切在我心里却又引起

了相当大的感伤。

(十)

除了这件小小的喜事之外，那一天还是个多事的日子。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了大西洋联盟的详细条款，同时陕北共产党人也在广播里作了一个迄今最为明确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结成了联盟。这一声明显然是由于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激起的，看来也是莫斯科指使的。声明大肆吹嘘苏联如何在联合国里为和平奔走，说什么它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的阻挠。声明颂扬斯大林，字里行间充满了仇恨、偏执和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愚忠。在这个无疑是受了俄国影响的声明中，他们还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其用语之恶毒几乎超过了他们对国民党的咒骂。他们开始把我称作“仍然是（过去在委员长的手下，现在是在李宗仁领导下）南京的太上皇”，言外之意是，两个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而对我言听计从。他们敦促李宗仁同蒋介石和我断绝关系。

货币问题急速变化，甚至变得比军事问题更为严重。这个问题不但涣散人心，而且也涣散军心。通货膨胀是如此之严重，到二月底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前一个时期发行的纸币大约为三百亿金元券，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同美元的比价大约每天增加百分之十。商品的价格一般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

百分之五，但是为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尽管政府在财政上困难重重，但是它仍然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

这对政府是极为有利的，可是一些反常的做法，比如从青岛向太原空运军粮，又把这一有利因素抵销了。坚定而年迈的山西省长阎锡山长期受困在省城里，要保住这个城市就得继续提供粮食支援。太原牵制着共产党的大量军队，不然这些军队可以腾出来去攻打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天津失守之后，再死守太原就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了。不过兵工厂仍然在生产军火，如果这个城市一旦失守，这些军火就会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于是他们拼命把军火空运到比如汉口这些急需的地方去。但是共产党的高射炮火使空运十分危险。他们能作的最有利的事就是推迟太原的陷落。政府纵然穷困，却还是决定不惜以每天耗费三十万美元的巨资来进行这项能与柏林大空运相提并论的行动。这说明个人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各地的政见分歧又是多么违反常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居民却在被围困的城里活活饿死。

（十一）

1949年最初几个月内，李代总统勇敢而巧妙地处理了一些重大问题，深得人们的敬佩和同情。虽然我们帮不了他多少忙，但是我们反复向他表达了这种敬崇之情。何应钦将军终于同意出任行政院长，这显然是出于崇高的动机。组织内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批比较年轻的人，虽说他们的地位和能力算不上第一流，但

他们是清白的，有公益心的。到这种时候，在对待中国事务方面再也不能有任何别的动机了。刘攻芸先生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担任了财政部长，正如我对他讲的，这比在第一线作战还需要更大的勇气。两个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名声未曾受到玷污的燕京学生被提名为副部长。我劝他们两人把这一职务当作他们为国效劳的最好机会。把政府的所在地设在广州，困难是不小的，政局紧张，更加重了行政上的困难。一般来讲，广州的国民政府更为反对通过谈判求和，也怀疑李准备作过多的让步。

与此同时，引退在故乡的委员长配备有秘书、警卫、长途电话和一整套办事机构。来访者络绎不绝。人们用田园诗般的词句描写他过着悠闲的生活：眼前是熟悉的景物，左右是亲善的友邻，膝下有嬉戏的小孙孙，总之就象旧时告老还乡、悠闲自得的官老爷。而实际上他却正就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事务进行着积极的筹划。他不断地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送去信件，表示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支持。无疑，他是真诚的。他知道和谈会失败，战事会再起。他指望美国最终会认清共产党人的威胁，并给他以援助。

中国旧式的师生关系是非常严密的。空军首领、海军首领、高级将领通通忠诚于委员长，而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是忠于与个人无关的国家本身。国防部里那些具有新思想、年纪较轻的军官认为，如果他们的海、陆、空军能在统一的指挥下协同作战，那么他们就会使共产党的渡江成为极大的冒险。但是比战略更要紧的是作为军饷的银元。士兵不要金元券，然而每月四个银元（两美元）甚至两个银

元即可维持军队的士气。否则共产党的特务就可以用硬币或者仅仅是许诺把他们收买过去。政府有将近三亿美元的金条和白银，不过大部分金条和白银与大量军火都安全地储存在台湾。

(十二)

和谈的准备工作拖拖拉拉地进行得十分缓慢，整整费去1949年头三个月的时间。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六人正式和谈代表团正好是在愚人节那天启程前往北平的，结果成了笑柄。跟着又是两个多礼拜的非正式协商。这期间，有时从北平送来报告，有时又传来荒诞的谣言，公众亦随之时而得到宽慰，时而忧心如焚。这反映在货币兑换率的波动上。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求的和平，李宗仁勇敢地、不遗余力地同取得了军事胜利因而态度傲慢的共产党人打交道。他谦逊地、耐心地回避了共产党人的侮辱，他恳求自己内部的人加强团结，因而日益得到舆论的支持。

共产党人一心要作凌驾一切的征服者和不妥协的一党独裁者。他们点名要和谈代表的蛮横态度——用他们自己喜欢用的字眼来讲——是根本“没有诚意的”。他们事先起草了一份冗长的文件，命令政府领导人在该文件的虚线上签字。政府领导人要按熟知的形式先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再各自低三下四地请求恢复其职务。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全部财产，必须履行他们原有的职责，直至解除其职务为止，而到那时国民政府也就自行消亡了。政府代表花了两个礼拜耐心商谈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只是使少数几项条款调子温和了些。

我大为失望，我原来一直认为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人的好传统，他们的许多领导人具有优秀的品德，不会干出那种超出常理的过火行为。这种过火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胜利者的傲慢——长年的艰苦斗争和深刻的个人憎恶使他们的这种感情变得更为强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明显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这倒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已经作了最后决定。在他们向全体陆军指挥员下达的要他们强渡长江“解放”南方各省的命令中，他们声称他们提出的如此“宽大和合理”的建议遭到了拒绝，这些话使人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再次感到迷惑不解。难道他们的组织纪律对思想起作用，能使他们形成同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见解？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授意起草的和平文件的语气和条款是宽大合理的？这可能吗？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清明节（意思是明媚的阳光）扫墓的风俗。这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跟我们的复活节有点类似。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并准备带去大使馆的几个职员，让他们欣赏欣赏春天的美景。行政院长事先已通知了省长和市长，这就是说尽管我事先提出免除礼仪的请求，但还是至少要安排中国官方最低限度的接待。我事先还讲明不作公开演讲，但表示要同外国侨民团体——也许所有的传教士——同中国的基督教工作者以及燕京毕业生聚会。可是在起程之前的一两天，共产党人向代总统提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如果在五天之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他们就要打过长江，这使他大为震惊。当我告诉李我为此已经中止了旅行时，他明显地得到了宽慰。

以后的一个礼拜正好是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然而我要

处理日常事务，我要苦苦思索共产党人在北平和谈中流露出来的意图，无法去纪念这一神圣的节日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人是要建立代议制政府抑或建立极权制政府，这可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从棕榈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开始，人们同往常一样来看望我，但是所有的人都带着紧迫的危机感。其中有各级政府官员、有自由主义者（他们对民主的前景已感到失望，而又对现在几乎迫近于城下的共产主义感到厌恶）、有美国新闻记者（他们要求我非正式地解释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真相）、还有大使馆的官员（他们正在处理介于日常事务和紧迫情况之间的问题）。那位愁眉苦脸的年轻的财政部长，或者他的朋友几乎每天都要来询问我，在他们陷入财政混乱、需要用银元发军饷的时候，至少在和谈期间，他们是否能获得美国的帮助。

一天上午，宁夏回族省主席马鸿逵约定来拜访我。他是前些时候乘飞机到首都来开会的，他向我提出希望去美国治病。然而为了避人耳目，我们是在一位传教士朋友家里见面的，因为这位省主席的秘书过去是那个传教士的学生。西北的居民大部分是回教徒，由于这个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反共情绪十分强烈。对他们这种坚决的抵抗精神，美国采取什么态度呢？那个地区靠近西伯利亚，所以这次又略略提及了这一经常提出的问题。报纸一直说这位有趣的首领体重达三百磅，他却坚持说只有二百四十磅。我邀请他和他的夫人晚上到我那儿吃晚饭，那时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吩咐厨师不要做猪肉。

第二天又是热烈的政治和一件迷人的喜事掺杂在一起的

一天。那天下午，一个美国陆军军官和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姑娘在我家里结婚。一个月前，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主持婚礼——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曾多次发生过——我曾批评他们胆子太大，竟想出了这样的主意。我的会客室里用春天的鲜花布置得十分迷人。我的法国同事们把新娘交给了新郎。此事在日益加深的忧郁气氛中成了一个愉快的插曲。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反映了这种气氛。那天，我费了不少时间去劝慰一些一筹莫展的中国朋友们。不过我还在一次联合举办的礼拜仪式上用英语讲了道，这是我早就答应下来的。其他讲道者谁也不会在这样心神烦乱之时，作讲道的准备；然而在沮丧和忧惧之中宣讲不朽的基督教信念，却毕竟是件鼓舞人心的事。

事先已经约定，那天晚上代总统要到我家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大使亦将出席。加拿大大使耽误在上海未能到场，他后来得知此事十分生气。这位“汤姆”·戴维大使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是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总统的秘书带来了一份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它比我听到过的任何通牒还要盛气凌人，我们越听越气愤。李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事不能在任何这样的文件上签字，我们当然不能劝他签，不过我们向他保证我们是真诚地同情他的。复活节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气氛中度过的。

（十三）

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希望现在已经全部落空。还有多久就会渡江呢？南京的命运如何？星期一早上的第一件事，是李

的多年的亲密同事白崇禧将军的来访。他告诉我，李在这一危机中坚持认为委员长要么恢复原职统管一切，要么离开这个国家。当天下午李派人去找傅泾波，并且告诉他，虽然他本人要在首都留到最后一刻，但是他催促我以及所有的大使立即迁往广州。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使馆一直由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警卫着，以预防政府军队撤走而共产党尚未接管的这段时间里出事，或许可能发生激烈的战斗，更可能的是，一些逃兵或败兵以及市民中的不法分子会趁火打劫。原计划经常在那儿停泊一艘军舰，以便一旦恢复秩序就把海军陆战队接上舰，并在必要时将我和其他人员撤走。但是国会攻击擅自动用海军，这使驻上海的司令官无法向南京派出舰只。不过，这位司令官向我保证，无论我何时提出要求，三天之内军舰定会来接我。因而我在十天或更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一要求，但是给耽误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我改了主意，巴杰尔海军上将最终阻止了军舰启航。英国人也一直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合作采取同我们一样的行动，一则是为了宣传，再则也是为了运送必需品。

共产党的最后通牒期限到4月20日星期三为止，以后他们就可能开始渡江。所以，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爵士把军舰换班的日子提前了，以便使换班的舰艇在限期前安全地开过来。但是，星期三上午他跑来告诉我，据《紫石英号》最后发出的电讯，该舰逆江而上时，在下游几英里的地方遭到了炮击，搁浅了，伤亡惨重。拉尔夫和我是同年任职的，我们立即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同情地听他讲述着，心里感到十

分侥幸，本来是该我倒这个霉的。该换班离开的僚舰冒着来自北岸的连珠炮火，立即向现场驶去，同时开火还击，把对方的炮火部分地压了下去。但是那炮火十分猛烈，使它无法停留在附近救援，只得继续向下游驶去。同时，《黑天鹅号》和旗舰《伦敦号》全速从上海驶出，也同样没有效果。《紫石英号》上的一些伤员和水兵游到南岸，最后狼狈不堪地乘火车到了上海。另外一些人由一架水上飞机极其困难地救了出来。

这几艘舰上一共有一百多名士兵伤亡，几乎一半是受了重伤。《紫石英号》整个损失了，其他舰只也都受到了严重破坏。简直不可相信，共产党的军队竟在事先不发警告的情况下，炮击中立国的舰只，而且有意地继续这么做，特别是这些舰只的换班长期来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常规航行。开初，英国的军官们以为共产党人可能是太无知了，认不出舰上挂的是外国国旗，因而专门向舰体和及时升起的白旗轰击。也许他们已经接到了准备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渡江的地点正好是在《紫石英号》搁浅的地方。他们厚颜无耻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说，英国军舰在帮助他们的敌人，而且首先开火。

他们甚至连死伤的水手也不许营救，这未免太说不过去，太冷酷无情了，我还觉察出其他的中国人对这次炮击所带来的结果有一种暗中得意的民族自豪感。过去，外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主要是英国的，可以任意地在这条大江里来来往往，可是现在，它们终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共产党人陆上排炮的射击是极为准确的。往常共产党咒骂的是我们美国

军舰，如今，在他们的咒骂声中又多了个英国的海军。

(十四)

第二天下午罗杰·拉帕姆从华盛顿飞抵上海。还在华盛顿时，他一直在国会里就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总数达五千四百百万美元的余款进行辩论。他和我以及我们的同事们都认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看，这笔款子最有效的用场是用它来稳定货币，使政府能够用银子来支付长江前线军队的军饷，而不是用在救济或复兴计划上。那样充其量也只能满足部分的需要，弄不好还会在战争中浪费掉，或者，反而在军事或物资上援助了共产党。罗杰随身把拉帕姆夫人和他的同事艾伦·格里芬的夫人带回中国，这两位夫人为安全起见曾随他回到了美国。她们的行动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不安和人们的动摇。我要求罗杰和艾伦同另外两个直接有关的人一起于礼拜五从上海到南京来，以便了解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如果能做任何事情的话）来帮助心慌意乱的中国官员避免财政和军事上的崩溃，同时试图保住长江前沿一线。他们打电话说，他们几个人将一块乘我们使馆的飞机来，第二天就回去，两位夫人将陪他们同来。

这两位令人愉快的夫人经常随他们的丈夫来我这儿，但是我回电话说，我很怀疑这次他们这样做是适当的，而且还告诉他们如果上午来当天下午就回去较为安全。行政院长何应钦已邀请这一行人吃晚饭，而且希望在另外两人到达之前私下同罗杰和我交谈，但是那天上午一早又来电话通知取消这一邀请。这些细节有助于更生动地说明当时中国生活

中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我们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多次面临过那种不可避免的,但一时尚未发生的灾难;我们对四周悲惨混乱的局面已经麻木不仁;我们对下面这种颠倒了的价值观念并不感到吃惊,比如这位行政院长——兼全体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节节胜利的敌人实际上已经在渡江时,却打算宴请外宾。诚然,招待外宾是为了遵守社交礼仪,但并非不存有一种愚蠢的愿望:美元会奇迹般地阻挡住前进的敌人。

如果政府打算继续进行军事抵抗,长江倒是一道天然屏障。正如国防部一位极其年轻有为的军官对我讲的那样,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军队。这位年轻的军官以及其他与他类似的人同我的陆、海军武官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如果有陆、海、空军的协同配合,有统一的指挥,再加上用银元支付军饷并给予士兵适当的关心,那么,他们本来是能够守住这条江的,至少能多守几个月,而且很可能使共产党人改变其整个政策。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它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抗日战争期间,每一个士兵明白为什么要抗击外国侵略者,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设法将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资金转用来支付军饷之后,听我们年轻能干的财务代表保罗·帕克说,高级将领把三千万银元装在自己的腰包里达数月之久,我恶心透了。当我询问这

些高级将领时，他们做个鬼脸抗议说，一部分钱实际上已分到士兵手里了。不难理解为什么士兵们没有战斗意志。本来，仅仅是求生存的本能也该可以使军政当局改正这种恶习的。

拉帕姆一行在那个多事的礼拜五下午离开之后，我们全体大使馆的成员开了一个会，再次讨论我们是否应当跟着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政府的代表们正在急急忙忙地迁走，其中一些人也要求我们这样作。我国政府的意见却依然如故。然而，第二天下午我接到指示，要我回华盛顿进行磋商。以后通过函件来往，说明不必立即这样作，要等到我们接到更明确的指示或者——如果断了通讯联系——我自己感到适宜的时候再返回华盛顿。我非常希望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就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我还希望所有的外交官继续同我们一起行动，所以我要北大西洋集团的使节在下个礼拜一再举行一次会议。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向各个使节派出国的首都，也包括华盛顿发了函件。

(十五)

星期六早上，所有留在首都的国民政府官员都急匆匆地离开了。警察没有了，城市完全失去了控制。跟往常一样，劫掠开始了，局面很快就变得不可收拾。夜里枪声不断，到处发生抢劫，人们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恐惧。为了避免同共产党人发

生误解，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除六名留下以外全都乘飞机去上海了。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在我住的院里巡逻。

4月24日（星期天）一大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成功地过了长江，入了城，平静地接管了首都。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同政府军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对新的征服者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生怕冒犯他们。

在上面的一个段落里，我讲述了我对共产党人在胜利时未能表现出宽宏大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死板地执行其党的路线，感到失望。我感到同样失望的是，国民党在其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奋起抵抗。我十分同情那些年轻而能干的爱国志士，他们在国民政府里工作鞠躬尽瘁，同可怕的敌人作战，为无力自助的老百姓服务。现在再没有比他们更仁慈、更顺从、更值得赞扬的令人满意的治理了。

我们美国人只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些好的方面，而未曾注意到他们的偏狭、顽固、欺诈、草菅人命，以及一切极权制度所固有的恶劣弊病。我们保留了共产党人对进步、民主、自由等目标，以及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等概念的解釋。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体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潜力。因此我们无法推脱对失去中国大陆这一巨大灾难应承担的部分责任，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是美国 and 整个自由世界的灾难。

十二、在竹幕后面

这是以我被粗暴地吵醒为开端的。共军渡江实际上并未受到阻拦。4月24日星期天清晨，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官员正好刚刚乘飞机离开，他们就进了城。第二天早晨刚过六点半，我从卧室的开门声中惊醒过来。只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我大声地呵斥他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退了回去，有一两个士兵还气呼呼地嘀咕了几句。我跳下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那群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走了回来，他们的发言人十分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他问我懂不懂他的话，我听懂。他又重复了他的保证。由于看出我不太友好，所以他就领着其他人出去了。

当时，埃德·安德堡（一个年轻的使馆随员、我的管家）也被吵醒了，他急忙跑出来要为我保驾。可是他被粗暴地挡回了自己的房间。吓坏了的佣人们也出来了，把这帮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这件事本身很容易解释。那些士兵只不过是些被迫入伍，受了精心思想灌输的农村青年。他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来到了这座巨大的都城，到处游逛游逛。当他们走到我的大门口时，值夜班的看门人给吓懵了，他不是照规矩向里

面通报，而是屈服于威胁，把他们放了进来。厨房里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些村夫根本不懂得外交豁免权。他们被灌输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概念，这可以从其中一名士兵对一个佣人讲的话看出。大意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他们。

国务院对这一事件很认真，指示我在北平和南京两地同时提出强烈抗议。可是在那时，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们与共产党人没有外交关系，根本就见不到职务高一点的共产党官员。不过，我们间接地听说，两个城市的当局都认为这事有失体面，感到十分生气。他们没有宣传此事就说明了这一点。通常，国共双方总是通过宣传互相恣意指责，并以此作为最好的自卫手段。美国显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我接连几天都可从广播里听到。后来听说那些冒犯者受到了追查，而且被关了禁闭，还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英法大使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不法事件。

(二)

在政权易手的前一天，国务院莫名其妙地给我发来一道召令，要我回华盛顿去。按理说，那是符合常规的，因为南京不再有我们所承认的政府，而且我的参赞刘易斯·克拉克正以代办的职衔在广州代表我们的使馆。当时整个外交使团，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派出的大使，都一致同意分别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跟着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而允许我们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那里。国务院授权我继续留下，把我国在共产党控制区的领

事馆和侨民照管好，而后再考虑撤离。

一接到这些指示，我便立即要求北大西洋集团国的大使开会。同往常一样，会议是在外交使团团长法国大使宅第中举行的。在那些士兵闯入我卧室的当天下午，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顿时感到好笑，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也忧心忡忡，生怕碰到类似事情。谁也说不准共产党人对一切非苏维埃国家采取傲慢态度会发展到何等地步。同样，谁也无法预测那些无知的下级士兵今后会擅自干出何种蠢事来。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大的事件。我们那时之所以到一起开会，主要还是为时已晚，谁也无法脱身了。国民政府的官员曾催促我们走，尤其是催促我走。他们让我走的态度，以及我的同事们所采取的态度，使我再次意识到了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新地位。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南京陷入了困境，如果要走，至少得等到上海“解放”，与它恢复了通讯联络才有可能。

在开会的往返途中，我们谁也没有受到打扰。但从那以后，所有的外国人就多少受到了限制，不准离开住处了。据说这纯粹是预防性措施。共产党人对我特别注意，因而我根本就不离开住地。国务院不时问到我的行动是否自由，不过我并不急于提及这个问题。我隐约地想起了被日本人扣押过的经历。大使馆的随员不断地向我汇报广播中的消息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大约过了一个礼拜，那些限制就取消了，然而我的日常事务却突然中断了。约见也好，社交活动也好，几乎全都停止了。所有的邮件也都断了。只是偶尔收到北平的一封来信，递交一封这样的信要两个礼拜或更长的时间。当地的中国报纸顿时都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几乎不登一般新

闻，只发表倾向共产党路线的文章。甚为幸运的是，他们允许我们继续使用大使馆的电台，允许我们收听时事广播。

(三)

这时，我长期以来所意识到的一种内心矛盾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党所抱有的感情。我在国民党里有许多多年的老朋友。就个人而言，我对其中不少的人是由衷地敬佩的。我知道他们是一些正直的、有公益心和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个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当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挺进时，宏伟的江防计划在政治纠纷、叛逃、出卖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了泡影。然而，正是这个政府却一直以各种名义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它所真心实意制定出来并体现在许多个别人物身上的主张和目标，也正是我们全然信赖的。

令人痛惜的是，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他们在广播里吹嘘其南下长途进军是如何之顺利，如何早就分阶段地送去了物资和器材，又如何搞好了运输和安排了宿营地等等。一句话，他们有了臻于完善的后勤工

作。他们士气高昂。我每天都可看到和听到他们在我们使馆周围进行操练和讲课。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所发动的是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它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那种他们曾经感到明显需要，而基督教布道团和别文化势力一直在努力培育却收效甚微的一些品质与能力，诸如进行组织工作的能力、严格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忠贞。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尤其是把它们与国民党的一些缺点相对照那就更为突出了。

不幸的是，共产党还有为那些感到希望破灭的青年和在经济上为暴政与内乱所苦的民众不甚了解的一面，因而任何变革都是受欢迎的。共产党有着正统的马列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粗暴的偏狭性，有着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绝对控制的一切压制手段，它对人们的个人权利、主张和信念采取了漠然不顾的态度。一想到它对迄今一直在众多的中国国民生活中起着良好作用的基督教运动，对燕京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和同我国，以及同别的民主国家间所建立的卓有成效的文化关系所带来的必然恶果，我就感到毛骨悚然。

我最同情的是许许多多年纪较轻的男男女女。即便他们加入了国民党，那是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所寄予的希望。他们的爱国热忱找不到别的寄托或别的令人满意的自我表达方式。他们与那些具有公益心的公民抱有同样的目标，力图实行变革。还有其他许多象他们这样的人，或属于某个小党，或无党无派，他们美好的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在肉体上和经济上受到种种的磨难，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土崩瓦解，饱尝了流离漂泊者的辛酸。他们不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痛苦，而且中国也失去了她一项最宝贵的财富，即失去了这些本来可以为她提供建设性服务的人。

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小。我最担忧的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后来果然如此。如前所述，我曾在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之前同他最后一次谈话时讲过，我当时认为我们或者给国民政府以足够的援助，给以必要的劝告和控制，使它能够战胜共产党人，或者我们就完全停止干涉中国事务。我还认为上述任何一种办法都比迟疑不决、三心二意地继续提供援助为好。我对这后一种援助所产生的不幸后果观察了很长时间，它在中国引起了激烈的反美浪潮，我自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共产党人的胜利，对美国的谴责也就愈加激烈了。

他们骂得最凶的，是国会在1948年春通过的可供中国政府任意使用的一笔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中国政府立即将这笔款子全部用来为陆海空三军购买物资。或许是由于美国官员的故意拖延，也可能是由于向制造商订货要按先后顺序，总之，这批物资交货极为迟缓。这样，我们就成了中国所有各阶层攻击的对象。国民政府指责我们说，这笔款子“太少而且交货太迟”。委员长和李宗仁曾经先后数次催促我加快运输和增加数量。共产党人给激怒了，他们破口大骂，夸大我们给予他们敌人的援助额。实际上他们得益极大，他们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经常获得国民党逃兵的装备。他们的谩骂是带有挖苦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所占领的城镇进行空袭，投弹不准，给平民造成了惨重伤亡，共产党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宣扬说，那是由美

国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美国飞机投弹轰炸造成的。

甚至连经济合作总署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拨款的价值也受到了怀疑。在使用美元拨款方面，罗杰·拉帕姆和其属下应受到赞扬，他们投入工作的精力、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崇高精神体现了美国最优秀的传统。虽然这笔拨款提供了某种人道主义的接济，然而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来看，它的价值必须以它在政治上所产生的严重恶感为背景作出估量，更何况中国民众所遭受的经济苦难已经如此深重，这一人道主义的接济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仅救一时而已。

我并不是要非难农村复兴项目。我自己曾特别热衷于这一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项目是于我想出大约两年之后才第一次切实着手实施的。随着共产党人南下和向西推进，这一计划的最初成效不久将见之于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而这样一来，也就违背了国会的意图。鉴于共产党具有大规模地进行组织的能力和经验，那项计划在规模上也就显得渺小和浅薄了。然而，它却是出于最美好的理想而制定出来的，而且是由最勤奋最称职的三个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执行的。也许可以从中引出一个多少带有讽刺意味的教训，那就是把慈善事业和政治搅在一起是徒劳的。

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社会各界的燕京毕业生也为我没有继续当大学校长而感到沮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作

为外交官所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人们终究会弄清楚，我始终是同样一个人。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求愚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一些精神上有价值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人们可以冷静地说，基督教在国民党各界中的影响要比它对共产党的影响深入得多，而且它几乎完全是同情国民党的。我常常想，如果共产党人不是顽固地坚持其通过暴力进行世界革命，和通过暗中的或武装的侵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这一信条；如果不是出于仇恨的动机；不是依靠严密控制的宣传；不是依赖于警察国家的种种邪恶手段，他们的道德和社会热忱是否能保持得住呢？只要共产党的社会化计划受到这些手段的玷污，就没有希望做到我最关心的两件事：中国的基督教运动以及中美的互利关系。任何与此相反的表面姿态或调整都只能是暂时的和策略性的。如果我们不打算采取纯粹消极的政策，那么新的美国政策应当是什么呢？

（四）

共产党接管南京后不久，黄华被派到那儿去主管外事局的工作。王汝梅是一位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他入党后就化名为黄华，那时人们多半是这样做的。他曾在北平马歇将军的“执行部”工作过，执行部是这位将军领导的使团特设机构。我在那儿见过他，发现他对我本人是友好的，

然而他却已经完全赤化了。从他的地位，从共产党的反美路线，以及他们一再声称的所有的外交官仅仅是平民等情况来看，我不知道他会对我采取什么态度。

他到任几天之后就打电话约见了傅泾波，跟他很友好地交谈了大约一小时。分手时傅建议黄去拜访他的老校长。黄回答说自然只能以此名义去，但是他要同别的人商量，然后再告诉泾波。过了几天，他来看我了，而且象往常一样友好地坐了两个小时。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分听从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与指点。他很快就谈到了“承认”这个问题，这给了我解释的机会。我首先说明，外国只能象共产党自己做的那样，继续承认现有的国民政府；我说明，当新政府宣告成立，而且显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至少为他们所接受，同时证明它愿意并且能够按国际惯例同别的国家保持关系，那么，自然就会讨论有关承认之事；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外来者只能消极地等待着。换言之，在被告席上的是他们，而不是别的国家。无疑，黄华这次来访是得到北平同意的，而后一定把经过情况向北平作了汇报。

这一小插曲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了如果要使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想体系（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民主解放力量，而将对方看作是敌对的侵略势力）共同突破将他们分隔开的障碍，各自都应当明白在今后无数次的接触中需要做那些事情。即使共产党已经把他们的观点灌输给了它的党员，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仍然是我们这些有着绝然不同生活方

式的人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因素。黄华就是一个例子，他受过思想灌输，同时又幸运地保存着一般人真实的基本感情。

（五）

共产党人既然迅速地夺取了南京，他们便不得不立即穷追至上海。那是一个欧、亚人麋集的城市，他们十分了解，那儿集中存在着一些国际性的问题，其本身也有经济上的以及行政管理和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本来他们完全可以绕过上海，等将来实行和平移交。可是委员长已经命令其部队撤至上海进行抵抗，并临时制订了上海地区的防卫措施。物资准备空虚不足，执行时又浪费，上海居民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更为糟糕的是，这一行动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创伤。特务暗地里跟踪那些被怀疑有左倾思想的人。主张同共产党谈判实行和平移交的知名人士，有的被强迫撤退到了香港，有的为了自身的安全也逃到了那儿。国民党还按市民的支付能力向所有的人征收了特别防务“捐款”，这种做法最后变成了搞个人勒索。船只和车辆征为军用。这一焦土政策，过去对付日本人极为有效，曾受到公众的衷心拥护，而现在却引起了更大的怨愤。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遭砍伐，大街上筑起了路障。为了求得民众的支持，还强迫人们刷标语和组织游行。为了同样目的，给士兵发了银元，发给电影票，给予某些许诺或一些特殊照顾与优待。与此同时，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在积极地搞地下活动。尽管委员长对他的部下能实行严格的控制，使各种防卫力量进行某种程度的协同配合，使他们比过去激发出更强的战斗意志，可是数

周之后，共产党人却还是拿下了上海。

（六）

外交界的同僚受困于南京，陷于被新当局无视的境地。所谓预防性的措施把他们限制在城墙以内，他们中大多数人甚至不准同本国政府进行密码联系，都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我们和英国人、法国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电台，设备较齐全，但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军事上的原因，利用商用线拍密码电报也是不许可的。这就是当时许多异常情况之一。当局利用每一个机会提醒我们说，对他们来讲，我们仅仅是我们各自国家的平民。不过，他们允许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象往常一样履行职责。当小国的大使们来向我打听消息，或因某件事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是喜欢他们随意这样做的），我才知道他们的消息是多么闭塞，他们与中国事务又是多么的疏远。有些人的社交生活和娱乐也是同样与世隔绝的，亚洲国家的使节尤其如此。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至于我本人，事情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无事可做。单是批阅和处理日常函件就得花一定的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一个友好的大家庭，除了外事上的人来客往外，使馆中住有传教士，还有几个中国人，这就使我们仍保有足够的社交生活的乐趣。使馆里始终有着朗费罗笔下那种“书籍的宁静”气氛。由于我代表美国政府，又在中国居住了多年，因而即使在我自愿与世断绝往来的那一期间，我对局势仍然是一直有所了解的。

(七)

我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交谈。接管后的一些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必然处于混乱状态。考虑到这种情况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要求黄华说明我访上海所必须办理的手续。他再度解释说，我现在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他又说，我属于“特殊情况”。给我确定了适当的地位之后，黄华就全盘负责为我的使馆警卫、一名职员、泾波和我本人以及他自己指派的三名特别助理人员作了安排。到上海后，我们由他的代表接待，我们所到之处都由两小轿车的便衣警卫随同。其原因好象是他们相信上海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国民党特务，担心他们会在我们身上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使新当局难堪。结果我无法象往常那样到处自由走动，只好呆在总领事的住宅里，谢绝社会上的邀请而让人家到领事宅第来拜访我，否则我不但会惹人注目，而且还可能使我所访问过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受到令人讨厌的特工人员的监视。我对共产党统治初期的上海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控制是有魄力的，胜任的，也是廉洁的；不过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维护普通群众利益的宣传却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劳工骚动。他们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念与这个大都会的经济结构，与满足其五百万人口并为他们提供保护等这样一些实际而急迫的需要又是相抵触的。这样一来，也有可能使上海成为一处极其重要的社会试验场。

外交界的同僚都急切地想看看我的遭遇如何，他们中有

几位也打算象我一样行事。我决定提出象行李不受检查等这样一些国际公认的有关外交豁免权的问题。共产党官员们认为我们仅仅是普通公民，不能享受那样的权利。无疑，这是对两个互相对立的原则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可庆幸的是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我的特别护照说我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看到我护照的人都感到好笑。可是在同一个类似的头衔安到一位欧洲同僚身上时，他不由得大发雷霆。

我在上海见到一件事，说明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同做法，并由此受到了不同对待。上海有两家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上海晚邮报》，它们在共产党“解放后”幸存了下来，而且决心在新政权下试着继续办下去。前一家报纸的名字（本意为《华北每日新闻》——译者注）记载了英国在开拓时期从广州和香港向他们当时认为远在北边的一座城市北进的历史。在我和我弟弟儿时住在杭州的时候，我父亲曾订阅过《字林西报》。它当时有个副标题叫“最高法院和领事公报”，这一响亮的名字使我幼小的心灵对大英帝国这一家令人敬畏的前哨报纸所报道的神奇事迹感到惊叹不已。《字林西报》长期来一直占用着面向外滩，属于某个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的一幢楼房。由于该报在编辑方面具有典型英国人的拘谨文风，近年来人们给它起了个俗气的绰号“外滩的老妇人”。

这次我去上海时，《字林西报》无意之中登载了一则谣言，说什么国民政府的海军在扬子江口布了水雷，因而通往上海港的航道十分危险。这样一来，一切航运顿时瘫痪了，与此航道有生死之系的上海城一片惊慌。新当局虽然擅长于

军事和思想斗争，但处理这类问题却完全没有经验。他们拖了一个多星期仍是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临时改装了两艘扫雷艇，清理了航道，才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这一事件可能是有意捉弄，也可能是道听途说造成的。但是必须找只替罪羊。共产党控制的中文报纸群起攻击《字林西报》，狠狠地咒骂了它一通。这是标准的共产党做法，也是那种长期郁结在内心的排外怨恨情绪和忌妒心理的爆发。这家为英国半殖民地统治办了数十年的无懈可击的报纸将如何对待这种辱骂呢？它在头版发表了一封用英文写的，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信，对它刊登未经证实的报道而引起全市惊恐的错误，真心诚意和低声下气地表示了歉意。鉴于考虑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禁止自己出版，考虑到英国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字林西报》才采取了这一行动。这表明英国人具有某些使他们能顺应其日益败落地位的素质。在变幻不定的情况下，这家报纸这样做至少可以暂救一时。

然而，美国人对事情的处理却又是另外一种做法。美国报纸的主编兰德尔·古尔德接到了营业经理的电话，说他被雇员关在屋里了，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由于最新的征服者进行激进的宣传，这种事情不但对外国雇主而且对中国雇主也决不是少见的。古尔德对他的美国同事和报纸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尽管知道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还是立即去了办公室。双方争执不下，直到工会代表到场后才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奇怪的是，当美国人提议把问题提交给市政当局时，所有的中国人却都反对。直至午夜，双方才达成协议。可是排字工人发现主编给次日的报纸写了一篇关

于这件事情的如实报道，他们又继续罢工了。古尔德认为那是对编辑特权的不能容忍的侵犯，他宁可停办报纸也不能作那样的让步。可是对那些地位低下的中国工人来讲，这又是有失面子的事。从共产党的一贯作法来看，新当局往后是否会对这家本质上友好，只是行事自由而又直言不讳的报纸进行刁难而使其无法办下去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况且古尔德办事是美国人的作风，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这正如他那位讲求实际的英国同行一样，他那种英国人的办事作风也是不可改变的。

长江口布水雷的谣言给上海造成了损害，也许由于这一点，才导致失败了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宣布封闭共产党人所占领的一切港口。他们始终避免使用“封锁”二字，同时由于感到绝望，他们也根本不顾英美就这种做法的非法性所提出的抗议。不过封闭港口的做法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进一步扼住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

在上海所发生的一些涉及到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外国人的事件是极其令人忧虑的。这些事件通常都是由一般的劳工骚动引起的，有时候是由于我们无意中违犯了新规章造成的。过去的外国租界，英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现在突然强行规定只能用汉语，这使留下的外国人感到恐慌。违者遭到了粗暴的对待，受尽了凌辱。他们被迫签字发表声明赔礼道歉，地方报纸幸灾乐祸加以登载，对事实极尽歪曲之能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社会学的研究事例。过去英国人令人厌恶地以基普林^①式的种族优越感来对待中国人和他们的文明。“上海精神”早已声名狼藉。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发展和中

华民族主义的迅速高涨，人们对这种种族优越感暗暗地同时又是逐渐地产生了憎恨心理。日本人的占领以及抗战胜利后把管理该市的权力交给中国曾使气氛有所缓和，但是宿怨仍残留着，内心的憎恨更加强烈。最后这段时期，国民党急于得到美元，便从上面发出指示给美国人以优待，而许多美国人亦天真地以为是理所当然，这对郁结着徐徐燃烧着的厌恶种族歧视的心理又是火上浇油。

此外，共产党也在不停地进行排外宣传，尤其是反美宣传，把我们通通说成是贪婪的帝国主义者。那些继续留在上海的人之所以没有按照事先的安排撤走，主要是出于他们对中国人的友情，他们完全清楚可能会发生不愉快的事，甚至可能会遭到不测。事实上他们成了过去积累起来的仇恨和现在共产党思想灌输的不幸的受害者。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就是利用旧有的仇恨来激发新的民族自主精神的。

(八)

六月底，我开始认真地为撤离作准备。当时尚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撤走驻沈阳的领事人员。我在等候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从北平返回。这位领导人是积极主张按国际上开明的做法同共产党合作的。他在毛泽东及其同事的恳切邀请下访问了北平，我相信他会给我提供可靠的有关共产党人意图的第一手材料。为了确保他有足够的时间在旅行条件不时变动的情况下及时返回，我把动身的日子定在7月18日。

① 拉迪亚德·基普林 (1865—1936)，英国作家，生于印度。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极力颂扬英国帝国主义。——译者

等候我的飞机已经修好，试飞过一次，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允许这样作，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愿意为我的撤离提供条件。可是又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当地的公安局（警察）印制了撤离许可证表格，末尾有一栏是“担保商号”，借以防止未清偿债务或未办完法律手续的人员撤走，从而在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开始引起一些显得完全无法调和的意见争执。共产党人武断地将所有外国的外交人员仅仅当作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看待。他们的意图是，这些表格应当适用于一切外国人，根本没考虑——或许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应享受通常的豁免权。这种表格既然已发出，如果再收回，不仅有失面子，而且也是等于让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靠人们对其信条不能有任何怀疑来维持其士气的狂热制度承认错误。

然而，国务院基于原则、信誉和先例这几方面的考虑，对填写表格之事采取了极为严肃的态度。黄华和章汉夫同其北平的上司保持着联系，同时设法对地方上的同事施加影响。当然黄华总是提防着，不使自己因对过去的大学校长有感情而损害其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让步。我用不着去填写那种令人反感的“保证书”了，行李也不受检查了。我可以把三个月积聚下来的高度机密的官方文件，以及全体使馆人员的私人信件带走而不受任何检查。黄华认为原先允许我乘大使馆飞机撤离也是十分破例的。那架飞机是他们接管时就在这里的。在沿海继续受到封锁的情况下，这是我撤离的唯一办法。

机组人员有四人，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邓宁上校和

其副驾驶员。机上的其他乘客是驻上海的总领事约翰·卡伯特先生，使馆职员亨利·欣德尔先生，威廉·奥利弗先生和夫人以及傅泾波先生。他们都是遵照医嘱离开的。奥利弗先生曾遭到上海警察的暴行，心理受到摧残，因而奉命回国。我们曾试探过是否能找到两家中国私人银行或一家别的公司作担保人，结果发现他们不相信共产党的作法，不敢冒这个险。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共产党当局，回答是找家美国公司也行。虽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我们的公民来为他们在国外服务的官员做担保人，这是可笑的。国务院有过指示，任何美国人即使美国使馆成员都不得找任何担保人。我们只得在南京的盛暑和令人发狂的焦虑中一天天地挨日子。在人们以为我要乘飞机赶快回国的时候，碰见外交界的同事和朋友们，在教堂里或在其他集会上再露面，心里就不胜感到懊丧。

国务院决定发表回顾最近一个时期对华政策的“白皮书”，以回答国会内外的批评。这使事情更复杂了。显然“白皮书”将严厉地指责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国务院为此要我在“白皮书”发表之前就安然离开中国。发表的日期本拟定在7月23日。开头，这似乎是为了给我足够的时间，后来由于印刷迟缓，把发表的日期推迟到了8月2日。华盛顿同我之间和黄华与北平之间的联系和意见交换都进行得拖拉缓慢，即使这一意外的暂缓好象也无法把我从国务院所担忧的、由于“白皮书”的发表而可能引起的争端中解救出来。我自己也担心它会激怒共产党人，从而破坏为我的撤离而进行的微妙谈判。

在我自己焦急地等待着撤离的时候，我根据共产党政策的动向，向国务院提出了建议，要他们制定撤离侨民的计划，把美国人从共产党控制区，特别是从上海撤走。共产党一方面把反美宣传搞得越来越激烈，对外国企业——实际上对一切私人企业，采取了越来越猖獗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它却更明显地投靠苏联，对内采取警察国家的高压手段搞镇压，并实行企业国有化。那些尚未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准备以原先引导他们从事传教事业的献身精神去面对那不可预测的未来，并希望自己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仍坚持留下不走这一事实，本身就将是对其诚心的一个有力的见证。但是对商人来讲，前景却实在暗淡，即便抱有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无法解除他们的忧虑。美国和英国商人之间的情况也有一些差异。许多英国商人是倾其家财投资于上海和其他中国港口的，一撤走就会破产。对英国来讲，甚为要紧的是，要尽可能地维持他们那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同中国的贸易仅占美国对外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三。美国人，甚至包括那些由于放弃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到最严重损害的人，也许可以不太困难地在别的地方重振其事业。

人们之所以这样考虑，那是因为共产党人已经直言不讳地说过，外国人不得插手中国事务。这种政治上的怨恨主要是由于我们支持了他们的对手而引起的。黄华对我倒是说了一些多少有点真实性的话，他说，任何农民、商人或学生都会同意他本人和其同志们的意见，即希望我们摆脱中国的事务。可是事情却有它另外的一面，他们的领袖了解，中国过去从我们这儿得到过物质上的好处，而且他们急切地需要恢

复其经济和工业，而要苏联或别的任何国家在这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又是不可能的。尽管共产党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但要他们偏离其正统学说却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共产党人最后同意以大使馆的名义为我和我的同行者划押作保。划押作保是勉强地做了，但我奉命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历数了他们的规定是多么粗暴地违反了迄今为止国际公认的外交礼节。他们以横蛮的态度拒不承认我们的外交官身份，一再拒绝接受我们就连续发生的影响到我们自己和我国侨民的问题，而再三奉命向他们呈交的抗议书。这里又是黄华把事情缓和了一下，尽管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赤诚之心，他还是让我象对过去的学生一样讲了我要讲的话，那些话如果是出自美国大使之口，他是不会听的。说到那种相当愚蠢的做法，我的加拿大同行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在我去过上海不久，他也去了上海，他的警卫就一项规定向中国人提出了抗议，理由是美国大使没有碰到那样的规定。回答是没有美国大使到那儿去过。当加拿大人讲出我的名字时，有关工作人员冷冷地说，他们见到的是一位同名的著名教育家。

看来我们终于可以起飞了。再次确定的日期为8月1日，比上次确定的日期正好晚两星期，而且正好在预定要发表“白皮书”的前夕。

十三、返回华盛顿

1949年8月2日我终于乘使馆的两架飞机中一架小而旧的飞机离开南京，返回华盛顿。和我同行的有傅泾波、约翰·卡伯特、奥利弗夫妇和亨利·欣德尔；机组人员有三名，由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驾驶。我当时不了解，到后来才得知，那架本来性能不太好的飞机乘那么多人，再加上不少行李，已经超重了。但是不管可能发生什么危险，我们还是为启程感到高兴。呆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不舒服的、捉摸不定的，令人烦恼而灰心，甚至叫人担惊受怕。

在晴朗的天空和平静的海面上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顺利地抵达冲绳，受到美国军方人员的热忱接待和殷勤照料。第二天我们换乘大使馆那架较大的飞机，那是一架新的、设备很好的B-27飞机，是特意派往中国供大使专用的。在离开冲绳之前，我迎着海浪痛快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B-27飞机，安全舒适，载着我们飞行最后一段航程。我们飞到关岛，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很好的接待。我在一个美丽的海滩上又痛快地游了一次泳。

8月5日清晨两点，我们降落在火奴鲁鲁机场。在那么早的时刻，来迎接我们的是斯图尔特·默里海军上将夫妇和他们可爱的女儿苏珊娜。整整两天里，我们受到了默里一家

人最殷切的款待，十分愉快。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及夫人为我举行了晚宴；火奴鲁鲁的燕京校友会为我举行了欢迎会。我腾出时间在瓦胡岛一个优美的海滩上游了两次泳，痛快地晒太阳。

在火奴鲁鲁时，我收到了由国务院编写的、刚刚发表的两本《白皮书》，书名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

8月6日傍晚，我们同默里一家道别，离开了火奴鲁鲁，并于7日抵达旧金山。我们受到政府官员的迎接，其中有我在莫比尔童年时期的老朋友并在北京与我共事多年的威廉·皮特斯博士，以及我的堂兄弟沃伦·麦克布赖德。我在麦克布赖德夫妇家过了夜。然后我们飞往华盛顿，于10日下午4时在当地机场降落。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老朋友——美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亲戚、官方同事、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令人特别高兴的是，我见到了沃伦和他的妻子安妮。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沃尔顿·巴特沃思、菲利普·斯普劳斯和一些在南京同我共过事的官员都去了；另外还有中国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一些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

(二)

他们迅速地将我从华盛顿机场送到了国务院。沃尔顿·巴特沃思同我们进行了初次交谈，他劝我闭门不出，不要接见不必要见的来访者，实际上就是要我隐居数日。他甚至建议我离开华盛顿十天或半个月。随后我和傅泾波就乘车到了卡尔顿饭店。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第三天，在艾奇逊先生的陪同下，我第一次会晤了杜鲁门总统。我在华盛顿首次与马歇尔将军谈话是在数星期之后。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与他所进行的那些友好的交谈，可是那些谈话却加深了我在仔细研究《白皮书》后那种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不安。

(三)

过了火奴鲁鲁，我在飞机上得到机会对国务院发表的那本《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的内容进行了审阅。在那以后，我对之进行研究和考虑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我不但考虑到了它的性质，而且还注意到了它的影响和效果。

通过一些记事、文件和文件摘录，《美国与中国关系》一书不但叙述了美国和中国之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它还着重说明了1944至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和美国的政策。

《白皮书》的最前面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总统的一封信，落款是“1949年7月30日于华盛顿国务院”。信中说明了编写该书的经过和宗旨。开头一段写道：

“总统：遵照您的要求，我编写了一份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纪要，重点在最后五年。此纪要正交付出版，国会和美国人民即将见到。”

信的第二段写道：

“……我指示负责编写这一文件的人员提出一个报告，说明决定我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以及反映这一政策执行情况的一些明显的事实。这是一个坦率的报告，它涉及一个与美国有着长期亲密友好关系的伟大国家。报告包含了批评我国政策的言论或今后有可能成为批评我国政策而具有论据性的资料。”

信的第三段在叙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的传统友谊之后，遗憾地说明：

“在编写此报告的过程中，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有必要发表一些事实以揭示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局势。然而，我认为不能因此而阻止其出版。”

信件继续说：

“有两个因素在决定现代中国的命运时起着主导作用”：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它“给那个国家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压力”；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它“大大地起到了引起骚乱和不安的作用”。

信件接着谈到了中国革命、国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以及1927年的分裂。然后写道：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1927年到1937年这一时期

的历史描写为国民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后者显然遭到了失败。在这一时期里，国民党在统一国家、加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力量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然而就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开始失去其初创时期的革命劲头和热情，而共产党人的热情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不论是在这一段或是在紧接其后的段落中，艾奇逊都未曾提及1928年国民党人的执政、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或世界各国对它的承认。从1927年到现在，中国的“内部冲突”或内乱被简单地看作是两党之间的斗争。只是后来才切实提到了“政府”、“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等等。

谈到1937年日本的入侵及其后果时，信件写道：

“这些战争年代的悲剧，在于生命财产的浩劫扼杀了那个正在崛起而又历史地成为自由主义和民主柱石与心脏的中产阶级。”

信件接着叙述了下列事项——中国事态的发展及美国的负责官员对这些事态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就“必须改变美国政策的传统概念以适应新的前所未有的形势”；赫尔利将军的使命；《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及其有关事项；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以及美国官方事先提出的劝告和事后提出的警告。

日本战败后美国的政策是：

“当和平来到时，美国在中国可能面临三种抉择：

（1）干净、彻底、全部撤出；（2）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人把共产党人消灭掉；（3）在帮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地区的同时，设法让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信件随后叙述了导致采纳第三种政策的论据：

“我们按照这种政策处理了当时的问题，同时力图协助他们制订出一套适当的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存甚至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的权宜办法。”

赫尔利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曾先后致力于“谋求”这样一种“权宜办法”。但是，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由于双方都没有这种愿望，第一个目标是实现不了的……然而，自1945年至1949年，我们实行了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努力寻求实现第二个目标。国民政府是一个得到承认的友好国家的政府……至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时为止，国民党人在军事和领土扩张方面都显然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可是其后的一年半表明，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信件的下面几段相继叙述了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使命。然后接着写道：

“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详见附录。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

“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

“由于我国政府深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思想上是同莫斯科沆瀣一气的，所以从中国的力量对比来看，我国政府认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平。为了使双方作出让步，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议会，这样，中国政府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全中国的政府，各党派才能在政府的宪法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些条件一项也未实现。”

不仅如此，国民党人还不听马歇尔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建议，从而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然而，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或是在战争时期，美国一贯对中国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友好和援助政策。”

我们“以赠款和借贷的形式向国民党中国提供了援

助”；我们“向中国政府出售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由于国民党领导人军事上无能，加之，变节投降，其部队又缺乏战斗意志”，我们供应的军用物资“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手。”

“现实地估计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局势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为一个失去其军队和人民信任的政府而大规模地介入。而一旦介入，美国就要比过去增加更多无谓的开支，国民党军队交由美国军官指挥，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可能都要参加作战。如此大规模的介入，不但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愤慨，甚至还会遭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公开宣布他们屈从于一个外国，俄国……这样一来，……这个外国势力在中国大规模搞改革运动的幌子下就取得了它对中国的控制。显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一运动完全是本国的、本民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不幸的，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中国不祥的内战局面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得了的。美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去所作的，或所能作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尚未作的一切也将无补于事。

“我们仍然相信，不管最近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是多么地可悲，不管大多数的中国人可能受到一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党多么残酷的剥削，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抬头，而且，中国将挣脱外国的枷锁。

我认为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应该在中国内部鼓励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事态的发展。

“如果这一共产党的政权将来为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卖力，并企图对中国的邻国进行侵略，那么，我们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将面临一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威胁国际安全的局面。

“与此同时，我国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持与中国的友谊、一贯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支持中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基础之上。”

(四)

我认为摘录艾奇逊的信件作为我的回忆录的一部分是适宜的，因为它是1949年8月国务院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问题上造成混乱认识的关键所在，同时还因为它显示了在我到达华盛顿时（及其后许多个月里）美国对华的官方政策所要采取的模式。起初，当我听说政府要发表这样一本白皮书时，心里十分不安。在我见到艾奇逊的信件后，我不但深感不安，而且极为惊愕。

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一份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象在这一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中那样，这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我越看那报告，就越感到惊异。报告的目录占十七页，大事记年表占五页，正文占四百零九页，附录占六百四十一页。当然正文和附录是书的主体。正文的叙述是片面的，旁

征博引了许多文件摘要和1844年至1949年6月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讲，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我的兴趣，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第六章，1947年至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虽然，实际上我是在1946年7月11日被任命为大使的，但是马歇尔将军调处团及紧接其后的事情是在前一章，即第五章“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使命”里讲述的。第六章占八十页，从1947年1月15日讲到1949年6月2日。

全书引用了许多我过去一直认为是“绝密”性质的文件。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与此有关的附录中——后者达三百三十三页之多，我发现了从驻华大使馆发回的急件中摘引出来的引文。这样就把我们呈报的秘密谈话、机密情报，以及使馆自己的主张、计划和建议公诸于世了。

艾奇逊信件的内容曾使我惊异和忧虑，那披露了机密材料的白皮书的内容更使我惊骇。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还接着问自己：这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白皮书》的另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前后不一致。《白皮书》发表后两个月，国务院宣布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1950年1月，美国政府却宣布不再为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已迁往台湾）提供援助，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50年6月共产党向大韩民国发动进攻

时才突然改变。

实际上我只是被这本不平常的《白皮书》弄得惊惶不安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另外，我不久还了解到国务院已向美国驻外使团大量分发了这一文件，并指示他们广为散发和宣传。

《白皮书》既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从未听说过可以与之比拟的文件，我也不想对它的长短妄加评论。不过，有一点我要公开说明：我认为《白皮书》只是详尽地罗列了美国政府据以制定其对华政策的那些资料。显然其目的不是写一本“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而只是选择了那些用以制定当时政策的资料，而那些在制定政策时未被采纳的资料则略去了。

《白皮书》所起的作用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策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这就是我的政府在1949年夏正式宣布的观点。我发现这也是我到达华盛顿之后在那儿见到的政府官员们的观点。

在华盛顿，同我打交道的人主要是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先生。我发现他完全支持我们政府的观点，而且他还认为我自己也应该那样去考虑和说明这个问题。正是他建议我避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并设法使某些报纸编辑“冷静下来”。

至于公开发表言论的问题，他们授权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作了一次演讲，讲稿由我事前精心准备好，然后经国务院删改和认可。后来，我在新泽西拉韦市的中央长老会又作了一次内容同样的演讲。

(五)

1949年9月，获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北平（其名称现改为北京）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政府。它的各级政权形式是以苏联政府为样板的。

10月，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专家”会议。与会者包括各界人士，他们应国务院的邀请，同国务院指定的政府官员会聚一堂。事后报道了会议的内容、与会者的姓名、参加会议的部分政府官员的姓名，以及会议的详细记录。

在会有几位官员对远东局势——尤其是中国局势——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说明。讨论会是按照会前散发的议程表进行的。随着会议的进行，事情逐渐明朗了，大多数与会者（其中以几位教育家的意见最为激烈）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完蛋”了。他们不再关注那个政府的命运。会议主席菲利普·杰塞普先生建议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因而好几位与会者强烈主张承认和援助新政权，少数人反对这个意见，主张不要仓促行事。

我参加了整个会议，我所听到的一切实在令人惊惶失措和灰心丧气。尽管国民政府有种种弱点和缺点——我已在回忆录中谈到过——但那个政府毕竟是在美国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过革命的热情建立起来的。这些年来，它一直受到国内

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产党的攻击；在国外又遭到别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外交上的压力和武装侵犯。它从未有过和平与安定的时期，无法去考虑改革和“国计民生”的问题。难怪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战争之后，当它受到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全面进攻时（中共的武装力量又得到苏联的纵容和物资援助），它无法将厌战的人民团结起来去进行有效的抵抗。它被迫节节败退，终于撤到了台湾。然而在这次会议上，相对来说很少谈到中国国内外的困难，把国民政府倒台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该政府自己身上。

国民政府曾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大量更多种的援助。过去许诺的一些援助拖得太久，运到中国时已经无济于事了。国民政府没有预见到《雅尔塔协定》会把满洲的主要权利让给苏联，这样一来，也就让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铺平了道路。国民政府——或别的政府——也未曾料到苏联政府会那么快地撕毁其在1945年8月15日签订的，答应只给予国民政府物资和道义上支持的协议。在国民政府极需同情和援助的时候，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50年共产党人在朝鲜发动进攻之间的这一段时期内所执行的杂乱无章和前后矛盾的政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地位。

1949年10月11日当蒋委员长的亲信代表郑介民将军抵达华盛顿时，我只能对他说，就我对形势的看法，国民政府再不会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了。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且立即寻求其他国家政府的承认。第二天，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了它。10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如前所述，10月4日美国国务院再次确认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虽然，当时和后来我从未得到过我的政府企图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印象，但是，我发现国务院在整个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屡遭挫折的、没有同情心的失败主义。回顾往事，1949年10月，美国政府中断了它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我认为尽管那时国民政府仍然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但是双方的关系已降到了最低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八个月之久，直到共产党在朝鲜发动侵略时为止，当时断定共产党在远东的进展对世界和平是危险的，必须由美国和联合国加以制止。

1949年秋天，共产党军队南下，国民政府决定撤退到广州。10月12日，李宗仁代总统宣布政府将迁往重庆。可是数周之后，重庆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最后，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指导下，政府迁到了台湾。12月9日，行政院开始在台湾的首府台北行使职权。李宗仁到了美国，并于12月7日住进纽约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过了一个礼拜，1950年的元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该

政权。这当然涉及到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政府也相继转而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作了这样承认的一共有二十五个政府，如果当时美国政府也效法英国政府的话，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大，因为许多国家都会以美国为榜样。

显然，美国政府感到困惑。它似乎对国民政府一直没有好感，而对共产党政权倒有好感。但是共产党人对美国官员的谩骂以及没收美国在北平的财产，在美国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不可能采取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官方行动，尽管美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确实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的国民党人提供军事援助，不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也不论是物资的或是顾问人员。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重复并详细阐述了这一声明。

那以后，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和许多讲台上，以及在联合国里，就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争论了数月之久。1950年5月，大约三十五名美国参议员联名签署和呈送了一些信件给杜鲁门总统，要求政府明确表态它不打算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同时也不支持有关承认该政权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动议。艾奇逊先生在回答中保证，不事先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商量，政府将不会承认共产党政权。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于3月1日在台北恢复了国民政府总统的职务；3月8日陈诚将军被提名为行政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楨博士，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七)

也许我在这里对蒋介石作最后的评价是适宜的。在我同马歇尔调处团共事的六个月里，委员长一直是主宰人物。为政府或国民党作出一切决策的就是他，共产党代表最害怕或指责最厉害的也是他。看到他多么敏捷地领会人们对他讲的话、多么清晰地抓住这些话的本质，以及多么执着于首次得到的印象，那总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他具有过多的优秀品质，反而失败了。对他进行评价时应当考虑下述背景：他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以及他执行艰巨使命时动荡不安的环境。如果记住了这一点，同时再对照一下东方专制政体的历史以及当代的独裁者，那么，蒋介石通常表现出的克制态度是应当加以赞扬的。

虽然按我们现代欧美的标准来看他所采取的某些政治措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对这位委员长的品德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我坚信他一直是自信地在为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而忠心耿耿地行事。要他区分他的个人利益和他的国家利益，这往往是不容易的。

(八)

1950年6月25日，苏联政府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的军队越过三八线，侵入了南朝鲜，以迅猛难挡之势直指大韩民国的首府汉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了行动。安理会宣布这是一次破坏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侵略行动，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支援横遭侵略的大韩民国。

7月27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的空军和海军给予大韩民国的武装力量以支持，同时要美国的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总统还宣布他正在呼吁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对大陆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将加速拟定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军事援助，以便增强对共产党侵略的抗击。

通过这一坚决而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为美国制订了积极阻止共产党推进的方略。几个地区的武装力量——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印度支那——早已在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

现在，美国的军队在朝鲜承担了责任，而且还同大约十五个其他国家的军队，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分遣队，共同参与了联合国的一次作战行动。

这些事态的发展实际上也就结束了美国国内关于承认中国大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辩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卷入了朝鲜的武装冲突，从而使联合国停止了关于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该组织的一切认真的考虑。不过这并未使苏联政府和其他一些政府停止其为接纳中国而进行的煽动和外交努力。

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出现了新动向。在朝鲜冲突爆发之初，当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向朝鲜派遣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三万部队时，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无论从军事上或政治上考虑都不宜接受这一提议。当时的看法是，台湾的军队最需要用于防止大陆的共产党人可能对其本身发动的袭击。1950年冬至1951年初中共的军队开进朝鲜之后，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同国民党的军事当局讨论防卫该岛的方案。紧接着，在1951年4月，美国政府征得了国民政府的完

全同意，向它派出了一个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共产党人主要是巧妙地通过宣传、渗透和使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大陆。他们利用了连绵不断的社会革命、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及普遍的和平愿望。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度曾是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虔诚信仰者，而现在的大多数党员，不论是领袖或追随者，好象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信条。自1921年至1948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鼓吹“解放”，即把中国人民从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形容词是指西方国家和日本，而不是指苏联。如今他们仍旧在鼓吹那种信条，只不过现在鼓吹的是巩固和保卫现政权而不是要达到所谓的政治目标。

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前，以及其后的数月之内，它在公众面前的一切表现都是为了获得信任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行为适得其反，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做法即使有失当之处，也很少归咎于主要领导人。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共产党在宣传中把自己描写成一个首先热心于“土地改革”的党，一个有自己目的的党，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独立于共产国际，后来又独立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党。斯大林曾经讲过，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话流传极广。

相反，毛泽东针对斯大林的说法所讲的话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很少在国外产生影响。

共产党的方针是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描绘得极其腐败、无能和堕落，另一方面却大肆吹嘘中国共产党人敦厚正直、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目标。这有效地为中国人民安然接受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扫清了道路。它还鼓励中国和世界各地心地单纯的观察家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政权的移交将加强民主以及世界和平事业。

说来也奇怪——难道不奇怪吗？——这种看法竟然得到了国内外称为“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个人和团体的完全信任，丝毫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不管诚实的历史学家将来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一现象，他必须如实地记载以下的事实：当时中国大多数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国外的共产党政府迅速地承认了这一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亦立即效法，而且还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打算。

在共产党当局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政权为止。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各种各样的“专家”那里发来了许多赞扬共产党人的报道。许多外交官、实业家和传教士都确信新政权现

在是而且将是对旧政权的一大改进。

在政权方面，共产党人确实是在执行一种改革方案。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给了农民。这使后者很高兴，这种做法看表象是在走向民主。后来他们却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大量税款，以致看不出后者在收入上获得了任何好处。他们不久便开始了对全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原理的教育。他们增加了名目日益繁多的捐税、规章和禁令。他们建立了由秘密警察、告密者和人民法庭所组成的一整套制度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和屠杀。他们接收了私立学校和私立医院，把一切教育机构都国有化了。他们虽然宣称宗教信仰自由，却给宗教团体施加了许多限制，他们控告传教士犯了间谍罪和其他罪行。他们扑向那些不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的商人和货主，进而聚而歼之。他们谩骂外国官员，并拒绝同某些国家的外交官打交道，甚至包括那些承认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他们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这种清洗一直继续到今天，据说在这过程中他们屠杀了数百万自己人和少数外国人。他们的仇恨开初似乎是专门指向那些过去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中国人；接着便指向受外国影响“毒害”过的人，包括许多基督教徒；最后便落到了商人和传教士的头上，他们怀疑或指控这些人进行颠覆活动，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在那儿有根基的人不愿相信，而且迟迟不承认铁幕正在中国的四周降下，共产党人不需要他们呆在铁幕内的任何工厂而是要他们离开。他们被迫面对严酷的现实，眼见他们的机构和企业遭毁灭或被接

收；眼见他们的中国同事受迫害和遭监禁；眼见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和被共产党政府或亲共组织占用。他们遭受虐待，遭到敲榨勒索，而且常常被强制驱逐出境。

最近发生了一件极为令人吃惊的事。共产党剥夺了大部分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居住权，侵占了他们一百多年的经营成果。由西方人创办和资助的许多文化事业都给取消了，燕京大学最近也给关闭了，它的各个学科、学生和教员并入了其他院校，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把它们统归为一个由共产党教育部领导的新国立大学。燕大中的外国教员全都被迫离开了。

那些献身于某种事业（不管是什么事业）的男男女女，看见自己一生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或转用于他们认为是邪恶的事业，感到真是悲伤。而令他们更为悲伤的是，目睹他们的同事和雇主遭迫害和杀戮，目睹他们曾为之传播福音并决意按基督精神为之服务的人民遭受奴役。我就是许许多多曾经有过而且现在正经受着这种生活的人之一。我自己幸免于许多终身与我共事的同事或伙伴们曾经遭受过的那种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但是从我听到和见到的报道中我清楚地了解所造成的灾难。

我还知道有些东西尚未毁灭，不可能毁灭，将来也不可能毁灭。在中国大陆的黑暗之中，仍然有许多火焰在燃烧——那永不熄灭的信仰的火焰、勇气的火焰、自由的火焰。在数百万海外华侨中、在台湾的居民团体内以及在世界各地，这火焰正在闪闪发光，有一天它将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重新点燃真正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明灯。

(九)

1949年11月28日，我离开华盛顿前往辛辛那提去拜访我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学校长乔治·巴博和巴博夫人，他们曾在燕京大学任过教。

11月30日傍晚，我从辛辛那提乘上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在餐车里我突然犯病，没吃完饭就离开了餐车。从那以后我就记不得所发生的一切了。直至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自己躺在担架里从火车送到救护车上。后来人家告诉我，早上乘务员发现我不省人事地躺在男乘客的房间里，他们根据我身上的证件弄清了我的身份。我还了解到他们向国务院发了电报，并且立即作了安排，把我送到了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我深切地感激所有救助过我的人，而且将永志不忘。

我当时犯了严重的心脏病。过了十二天，医生才知道我是否能活下去。从1949年12月1日至1950年3月29日，我在海军医院里受到特级护理。傅泾波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些日子，这时立即赶回华盛顿，每天都陪伴着我。我的儿子杰克定期来看望我。3月26日我出院了，同傅泾波一起住进了华盛顿费尔法克斯饭店。过了一个星期我又不得不回到医院。

4月28日再回到费尔法克斯饭店与傅泾波同住。6月24日是我的七十四岁生日，几个密友到那儿看望我们，对我来讲那是一次简单的而是温暖人心的“庆贺”。自7月4日至9月3日我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然后返回华盛顿，健康大为好转。12月，国务院发来一封信，通知我我已经不定期地委

派在国务院了。

在我神志恍惚的那些日子里，我特别喜爱和欣赏各方面的友人怀着深情厚意赠送给我的芳香艳丽的鲜花。从那以后，有许多友人来探望我，使我高兴并受到鼓舞。从我需要人护理的时刻开始，傅泾波就一直用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周到、体贴和忠心耿耿的态度照料着我。自1950年傅泾波一家到达华盛顿以来，为了使我能在华盛顿舒适、静谧而安全地生活下去，他们竭尽了全力。我们迁到了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第28街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是傅泾波和他妻子购买的。现在我们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工作，而且我们打算长期住下去。

1952年11月28日，我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信，说明由于健康原因，我希望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12月11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下述回信，他在信中感谢我所作的工作，同时接受了我的辞职要求。我的辞职于12月31日生效。

亲爱的大使先生：

您11月2日寄来的要求辞去您驻华大使职务的信已收悉。在接受您辞职请求的时候（您的辞职将于1952年12月31日生效），我谨向您表示我们政府和我个人的衷心谢意，感谢您在最困难和最悲惨的情况下，如此优异和忠诚地代表我们国家所完成的杰出使命。

您不仅将您终身为中国青年的教育事业服务所获得的对那个国家、它的人民以及它的语言的罕有

的精湛知识，而且也将您对中国福祉和对中美友谊的满腔热忱倾注于了您的驻华使命。您把您那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您肩负的重任。我确信，正是由于您对工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才致使您返回美国之后不幸长期卧病不起。

我深感遗憾的是您的病情使您在这个时候不能为我们的政府进一步效劳。然而我衷心地希望，当您痊愈时，您将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出您特有的才干。在北平的共产党政权大肆破坏亲善、煽动仇恨的这些日子里，这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迫的使命。

哈利·杜鲁门敬启

(签字)

1952年12月11日于华盛顿白宫

这样就为将来的新政府任命新的驻华大使扫清了道路，也使我能以新的方式去处理我个人以及公众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了。

十四、退休中的回顾

对我的生活道路影响最大的三个外部因素是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更确切些说，中国或许是另外两个因素得以表现出来并深深地影响了那两个因素的具体环境。

近几十年来出了不少研究中国的书，论及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人民的特点，论及现在的内部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里面有严肃的和幽默的作品，有小说、诗歌译作、哲学和别的文学著作。这些书的作者们及他们所持的态度，正如他们在各自书中所涉及的中国生活的许多侧面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熟人或密友。一件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情是，在这些专写中国而成名的作家中，尤其是小说家中竟有许多女性。

对于这浩瀚的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研究中国的文献，我感到我所能作的唯一有意义的贡献，是把我在中国的生活和亲身经历写出来。我在中国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那些屈辱性的对外条约和那些外国侨民，包括传教士们，在中国享受的不公道的特权早就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同情。由于我体谅到中国人民正当的民族愿望，我唤醒了潜伏于我心中的对于民主、个人自由和通过实施科学达

到社会进步的信念。对于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奢望，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达到这样一种了解，我的感情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已和他们完全一致了，以至于主导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态度并且支配着我的活动。

这并不仅仅是我喜欢中国和她的人民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很久以前我就确信，除非中国得到独立、统一，强大起来，既不畏惧别的国家，也不对别的国家怀抱不满，否则太平洋就不能有稳定的和平局面。说得更明确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理智、正义和国际善意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支巨大力量。展现在人类面前的这一广阔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们的教导相谐调，并和她的人民的最好传统相谐调。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式的政府将满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愿望，并将使有史以来就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社会民主在政治上得到表现。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就必须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即保持其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威胁。与其说中国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或种族上的统一体，更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统一体。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不能分开的，我的一生就献给了这一事业。

(二)

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对另一个国家所形成的态度及其产生的影响通常总是取决于个人的社会联系。这一情况在任何别的国家都不会象在中国表现得这样强烈。中国的文

明、道德哲学和伦理标准就是建立在人的相互关系之上的。有时，中国人好象几乎没有抽象的道德，而是把诚实、忠心、仁爱等等仅仅作为对某一个人的义务。这样说可能太武断些，但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个人的忠诚。

罗素在他那本高度赞扬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中国问题》一书中，把贪婪、怯懦和冷漠列为中国人最坏的缺点。与各国人民中存在的多少带有普遍性的恶行和弱点对照起来，我倒要把互相忌妒、猜疑这两点作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的特点。而且可以直接从他们的社会结构中高度个性化的成分里找到这些特点的踪迹。不过，我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更多地向我显示出，他们的好品德超过了他们的缺点，而且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些好品德是使我能够赏识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认为，与中美成千成万个人之间强而有力的友谊相比，中俄个人之间的友谊即使在今天似乎也很少，这是意味深长的。如今，虽然有一些中国人在严厉的压力下一时失信，背弃了他们与美国人个人之间的友谊，但是我确信，象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并不占多大份量，而大量的那些对人忠贞，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他们在精神上与美国人仍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有朝一日，他们的友谊将会得到恢复。

中国人的心就象他们的住宅一样总是对外人关闭着的。比如，北京城里布满了私人住宅，过往的行人不但不能看到里面的任何东西，甚至无法觉察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被高高的围墙围着，里面的平房住宅完全隐没在围墙之后，油漆大门紧紧闭着，即使在开门纳客的时候也只容瞥见一堵装饰性的影壁。只有绕过这堵影壁才能看见里面的东西。但是，在障

碍物后面便是一连串庄严的住房，间以精美的洞门、游廊、彩亭、花园、静室与荷塘及一些类似的供人赏乐的美景。中国人虽如此自处，在外人面前他们却要摆出一副无动于衷、毫无表情的面孔。这就是外国人感到难以接近的“东方面具”。要想登堂入室可不是急切间轻易能够办到的。但是，一旦去掉了畏惧和猜疑，产生了使人信赖的善意，那么在你进入庭院之后，就一定会发现和了解隐蔽的中国家庭，并且受到盛情的招待。

我在回忆中已提到不少中国人，我和他们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形成了亲密的珍贵友谊，如果不是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人本应在这里也提一提的。

读者诸君一定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傅泾波这个名字了，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进一步把他举为美好忠实的中美友谊的典范。我已经讲到在我任燕京大学校务长期间他如何帮助过我。当我被日本人囚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京，我以为他也许可能设法帮我逃跑，或通过协商使我获释。事实上，他也受到监视，在那整个期间也很少能离开家。当我临近获释之时，他是第一个获准和我见面的人。而且在随后几周的令人兴奋和精疲力竭的日子里，他一直和我呆在一起。

1946年4月底我从美国返华，在上海羁留了几个星期。由于某些校务方面的事情需要傅泾波帮忙，我打电报请他到上海会我。那时只有飞机能通达上海，而除了得到盟军当局的特许外，要坐飞机是很不容易的。当飞机飞越共产党控制的山东省时马达出了毛病，驾驶员要傅泾波把他的手提箱扔掉，他拒绝了，而拒绝是有道理的：在那个手提箱里放着有

关中国的重要文件。驾驶员有一把供自己用的降落伞，当危险增大时，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自己跳伞让乘客听天由命，要么与乘客共存亡。正在他权衡取舍之际，马达奇迹般地又发动起来了。他们安全地在青岛着陆，除去神经受了点刺激之外，毫无损伤。傅泾波从青岛搭上一架商用飞机，但他在兴奋中把手提箱忘在机场上了。幸好，航空公司找到了它，并于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

在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微妙的会谈中，以及我以大使身分在一切事情上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知道傅泾波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请他和我一同到南京去住上数周或数月，以便完成马歇尔计划。首都的住房既少又昂贵，我便请傅泾波和我同住同行，就象他是我的一家人一样，以便我在应付中国客人时随时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没想到在这件事上我第一次碰到了美国官场的规矩。把一个中国人列入一位美国大使的家庭是前所未闻的危险先例。这其中也有些社会的偏见——只是不那么严重罢了。更重要的理由则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训示。马歇尔将军耸起了眉毛，有广泛经验的外交界同事们对我有可能把外国间谍带入美国大使馆密室的这一创举侧目而视。那些忧虑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别的地方，只在工作时间才到我家来，他一样有机会刺探情报。象在所有此类问题上一样，一个人的道德纯正无瑕是受人信赖的基础。我知道可以毫无保留地信赖傅泾波，并且还知道他对我的事情的关心超过了任何其他事情。不久之后，使馆的同事们便认识到了傅泾波的作用并象

我一样对待他了。

中国人显然很乐于把这一早为许多人所熟知的、长期存在的关系扩及到我新任的外交事务中，这与美国人适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更随便更频繁地到我家来，即使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泾波，或是只和我会见几分钟。他不断拜访那些我们碍于身份或别的原因不宜拜访，而又很想与其保持接触的人们。每逢我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总是几乎毫无例外地带着他，而他也从未泄过一次密。这既使我能够和各阶层的中国人保持远为亲密和广泛的联系，又使他能在大多数场合毫无疑问地代表我本人。他可以对中国人讲一些他们明知是我的思想但却不宜或不便由我说的事情。因此，他成了我在外交事务中一位公认的不可缺少的人物。我确信，虽然美国政府没费分文，却从他对中国政治的深刻了解和他与中国人民的广泛接触中获益不少。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他也给我帮助，比如提醒我可能忽略的适当礼节，或者常常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替我处理一些有关事情。尤其是在我的大量中文通信方面，他在一位擅长中文书信者的协助下负责替我处置。

这种友谊已继续了三十多年，并且发展为一种完全信赖的关系。这证明即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的确可以存在田园诗式的友情。傅泾波之于我，就象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

我于四年多以前开始的一场病，是对这一友谊的严峻考

验，傅泾波表现出了最大的友情与忠诚。医生曾嘱咐说，除去近亲可以和我在一起最多呆半个小时之外，任何人都不得超过十分钟。但不久之后，那些只讲科学不重感情的人们就明白了他这个客人是与众不同的。他和我在一起一连呆几个小时我都能支持。这种时候并不使人兴奋，而是使人感到舒适和轻松。在我住院的将近五个月中，傅泾波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我出院以后，傅泾波、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跟我一起住了三年多，我觉得我们就象一个美满的家庭一样彼此十分融洽。在我缓慢康复的漫长过程中，他们都完全象泾波一样悉心照顾我。当然，他是主要因素，但他们都是自发地学他的样子。据我所知，更有意义的是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对这种安排表示赞赏。中国人民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处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时，对这种实际的责任和忠诚要比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看得重。在我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他在长时期内一刻不停地照顾我，那是很累人的。这既需要对我的残疾具有最大的同情，又需要有最大的耐心。简言之，这种中国人特有的、在照顾病人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按医生们的说法，可能是我得以奇迹般地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

(三)

我曾两次度过了与人世隔绝的生活，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囚禁了三年半，第二次就是近几年来我被疾病困在家里不能出门。这些经验帮助我懂得并体会到世人今天正在经受着大量惊人的痛苦。我曾竭力想象那些贫民，那些在绝望与颓废

中挣扎的人们,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那些伤病者以及那些孤独者与囚犯的困境,他们的困难比我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许多人肩负着令人头疼的责任或者面临着可怕的战争灾难。我们人类除了上面那部分人遭受着一时的痛苦和危险之外,还总是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在肉体或精神上受着各种各样疾患的折磨。我的一生要算是极其幸运和愉快的了。在我个人情况比较令人满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漠视过人类的痛苦,这可能出于一种怜悯的心理,充其量也只是以旁观者的清高态度去对待的。两次被隔离的大教训给了我一种近乎神秘的感觉,似乎我与所有受苦的人结成了一体。我隐隐窥见了痛苦在道德成长中的作用,这不仅指有关的个人,而且在集体关系中也是如此。教义讲,不管是上帝或是人,要想从自己的罪孽及其可怕的后果中得救,都得不惜一切代价替人受苦。现在我进一步懂得了它的深刻含义。在人类生活中,悲惨的事情是有的,也是可以见得着的。纵然我生性乐观,也很幸运,但从我个人的切身经历中,自己在思想上也不得不大胆地去面对严酷的现实。

(四)

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这些我在回忆录的其他章节里已经写过,在此就无需重复了。然而,人身自由毕竟是民主的本质,因为它基于这样的信念:人民能够行使对自己的管理权,这甚至比由最好的家长式政府或独裁政府治理要好,因

为他们从自身的失败和错误中将学会如何管理自己，学到管理自己的办法，从中显出无比的好处。我们说人们在寻求上帝时冒着信仰上的风险，但不应忽视上帝在赐予我们选择道德的自由时，也承担着可怕的信仰上的风险。所以，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自由而斗争是最高教义所许可的。

当我七十八岁之际这样看待世界时，我看到一场伟大的斗争正在进行着，所争执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让无神论的、无情而专制的共产主义制服并统治世界呢，还是让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原则与实践，和基督徒对上帝与人的尊严所抱的信仰成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家庭的基本准则呢？这两个理想是不能无限期地共存的。

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了崇高的社会目标，然而他们所遵循的却是“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个不道德的原则。他们已把欺骗发展成一种高超的艺术；他们依赖武力、诈骗和虚伪。在他们看来，倘若把人类投入苦难与毁灭符合他们目的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数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首领们曾告诉过我，他们将不惜一切牺牲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人在战术上是灵活的，他们的战略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们控制世界的目标是不可动摇的。

共产党人有他们的道德观，但他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衡量事物的标准，不象大多数人那样论理。在他们看来，反革命活动显然是一切罪行中最严

重的。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不可战胜的。但愿我们这些自由世界的人能象他们那样热衷于自己的信仰。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批评与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长存。如果共产党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人便都绝然错了。但如果我们真正信奉我们最美好的理想和信仰，我们就有责任使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获胜。我们不应仅仅作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为了维护民主、维护社会与经济正义、维护我们的道德信念及其精神价值，我们还必须制定出积极有力的纲领，给自由世界以新的希望和力量。

(五)

“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我青年时代每个有教养的长老会派的儿童必须记住的第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的主要目的是赞美上帝并永远爱他”。这几乎成了严厉的加尔文教义的主旨，这是我的苏格兰祖先代代相传遗留给我的东西。这一严厉而不可动摇的崇高信仰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信赖正直的上帝权威，并把服从他的旨意作为首要义务的传统哺育了一种特殊的品质，它在一切信奉新教的地区中已成为一项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宗教理想主义在与一些较为粗俗的思想观念竞争中所得到的最崇高的进展，在许多情况下接连地受到歪曲并趋于反动，这似乎成了对宗教理想主义的讽刺。

这种情况可以从住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行为中找到说明——在其他许多传教地区中无疑也一样，在那里，传教士们

和他们那些从事非宗教事业的同胞们彼此疏远，互相攻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在本国会不成问题地和睦相处。甚至同一家族的人以及传教士的不肖子女也常常走到这一或那一极端。对宗教的献身精神（倘无这种精神，他们就不会选择这种职业）加上盎格鲁·撒克逊人赞美效率及追求可见成果的本性，已使传教士们在别人面前成了令人生厌的、疯狂的神职人员；而其他西方人由于感到厌烦，希望摆脱传统的生活规范，也常常做出一些为传教士们难以容忍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东方是一种极为普遍而令人沮丧的现象，这不仅仅是人们不信教因而堕落所致。目前世界范围的大动乱也许已经永远打破了那些居住在传教领地上的人们所抱的想法，从而提醒我们去注意，在我们对新教的虔诚信仰中潜藏着把宗教与世俗行为分开的危险倾向。世界目前似乎出现了灾难，如果不把至关重要的宗教信仰与人类对待生活的观念结合起来，世界就会陷入更大的灾难。我深信，人们在生活中对基督教失去信仰这一现象，是同当前全球性的斗争密切相关并互为因果的，这两者的关系比人们一般所承认的更为严重。

基督教必然会把它传统的教义和神学学说传进中国。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们会给他们的人民和全世界以某种对基督教真理新的创造性的解释。中国教会正在经历一场严峻考验，这也许会给它们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带来丰富的宗教实践与体验，使我们的期望能早日实现。这就象宗教文献所记述的那样，耶稣只是在流放以后才有了旧约中那些精湛的精神见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及其一切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主要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那是一笔伟大

的遗产，近年来它经受了翻天覆地斗争的考验和筛选，受到了已在中国人思想中深深扎根的基督教真理的影响，并且恢复了活力。因而，毫无疑问，它应当就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意义作出新的解释。

（六）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中挑选一个反映我宗教信仰的精华段落，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为了在实际应用中把我的这一信仰作一个简短的归纳，我要引用耶稣的两句话，那两句话已结合在燕京大学的校训中，这就是：“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三至四十五节）。

我喜欢的赞歌是艾瑟克·瓦茨的“当我凝望奇异的十字架”——这可能是英文赞美诗中最美的一首——以及克莱沃修道院院长伯纳德的“耶稣，只要一想到您”。此外还有乔治·马西森的“哦，挣不脱的爱”和乔治·克罗利的“上帝的圣灵，降临我的心房”这两首。

一首最能表达我愿望的诗是乔治·艾略特写的：

我希望能加入那幽灵的合唱，
他们的降临使人心善良，
那不朽的死者在善良的心中复活，
激动着慷慨的脉搏，
在大胆的正直行为中看到他们，
鄙视那只为自己的可悲的人，

象星光冲破夜空，他们生活在崇高的思想之中，
以他们那温和不挠的精神，
激励着人们把更广泛的问题探寻。
我愿登上那最纯洁的天堂，
成为别人在剧痛时一杯产生力量的玉液琼浆，
点燃慷慨的热情，滋养纯洁的爱，
因此我将加入那幽灵的合唱，
他们的音乐是人间的欢畅。

无论在我老年或青年时期，耶稣基督总使我感到最大的满足。我绝对尊敬他，忠于他。他的一生、教导、死和复活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他被钉上十字架，显示了信仰与爱的顶峰。

对于耶稣生与死最合理的解释——我也许可以大胆地说是最科学的解释——似乎是基督对自己的溯源和造化表现了令人信服的直觉意识。我相信，信奉基督教的人越多，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稣，世界就会变得越好，人的命运、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也就越幸福。

人们自古便就基督信仰灵魂的不朽性进行了争论。如今，这种争论还在继续进行着，只是在现代生活环境中，人们对这种争论的兴趣减退了。在灵魂不朽这点上，自然科学和它从前不发达时一样不顶用，哲学和心理学也都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相信灵魂的不朽性，就象人类精神上任何合理的直觉认识和科学发现的一切方面所揭示的那样，我的这种信念从宇宙的无限广大和神秘中得到了支持。实验科学中

一切为人知晓的发现和有可能取得的成果，对于把现实与精神世界都同样视为异常辉煌，以致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想象和最大胆的推理这一点是一个挑战。基督信仰灵魂的不朽性最终是要靠人们冷静而有把握地去认识的。看到在宇宙混乱现象的后面有一种人们见不着的力量，这就是体现在我们耶稣基督主身上那种无尚崇高的爱。

所以，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整个人类及其每个成员的命运值得做一番创造性安排，这一安排的惊人伟大，在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经验中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近代的科学进步，由于证实了更崇高的愿望与信仰宗教的深远意义而应当受到欢迎。“人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耳朵还没有听见，心里还没有上帝为爱他的人们所准备的东西。”（《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要这样地死去，
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漫长的时日，
我已得到报酬，我的心中有一只岁暮的百灵在歌唱：
让我皈依那安静的西方吧，
象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威廉·欧内斯特·亨利，马格雷特·索罗里）

十五、美国和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有人一再问我，美国对中国，或者说对蒋介石、对台湾，或对大陆上的共产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政策”是一个大字眼。“现在”在时间上是一个不停地移动着的点，而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问题也在经常地变化。中国虽是一个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但只是我们必须对付的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据我看，要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有一个健全的政策，我们就必须首先对整个世界有一个健全的政策。要制定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民；必须正确地去认识世界。我们不仅必须充分谨慎地看待我们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利益，而且必须充分谨慎地看待其他民族和全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制定这种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自始至终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必须从道德、法律和正义的最高观念求得，并与之相一致。这些原则还应该服务于和应用于我们与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按照基督教的原则和实践所得出的观念，那么，我们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应以这一观念为指导。

在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当然必须

有而且也会有不同的方法，但基本的指导原则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是不变的。为了最终达到主要目标，也同样需要基本的指导原则。我们原则中的最根本的一条，是使所有的人和民族都有获得自由的权利。我们最根本的一个目标，是确保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民族而生存。要忠实于那个原则并有效地为那个目标服务，我们就必须不仅关心我们自己而且还必须关心其他国人民的民族生存，以及他们获得自由和得到安全的权利。

今天正在发生世界性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一边是少数国家中的少数人，他们正试图把一个实质是置全人类于彻底奴役之中的政权强加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些国家和它们的人民——美国站在最前列——在反对和抵制上面那种企图。

为了生存下去并得到安全，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府必须与其他象我们一样站在自由一边的人民和政府合作。我们应当支持一切象我们一样受到奴役势力威胁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和他们都不应该支持那种推行奴役政策和谋求统治世界的政府或政权。自由国家应维持一条共同的阵线，帮助一切寻求自由的人民抵抗苏联策动的好战的共产主义对全球的威胁。

如果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为了一致的社会和经济目的而进入了真正的共产主义，那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但是，现在的这种“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有灵魂，宣称一切都是物质性的，一切行为须唯物，它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制度，是依靠武力或欺骗或两者兼而用之来维持的。它渴望

统治全世界，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它靠吞食别人而生存，永无厌足。软语温言和友好姿态是不能使其驯服的，这是应该绝对反对的，是必须反对的。

那就是说，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我们美国、我们美国人民首先必须象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继续同情中国人民，我们的政府应该坚决地再次使我国执行我们传统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说明一个信念，即中国应保持为一个享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它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管理自主权应受到尊重，它的领导人为学习和实行自由的原则所作的努力应受到鼓励和支持。

美国人应该研究、了解和学会鉴赏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特性和能力。我们应该掌握并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个有四亿五千万之众的聪明健壮的民族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到那个国家拥有近四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比美国的面积还大；那个国家位于东亚的中央，有巨大的物质资源并具有大力发展工业的能力。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那个中国早以“中央王国”而为其人民及所有邻国的人民所熟知。我们还应重温、研究和考虑那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美国和它在贸易、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关系史。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全面地对待中国：它的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国民”政府所作的建设性努力，该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的长期而有效的抵抗，它作为盟国和它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作为联合国成员兼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来所作的贡献。我们还应该考虑到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对那个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苏联

出卖它所带来的后果，那个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兴起与最后胜利的影响，以及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1949年在北京建立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之间继续斗争的影响。我们应该审慎地观察、比较和对照那两个政府在后者出现以来的年代里各自的态度和表现。

目前，即便美国人民或政府与大陆中国的人民或控制那块领土的政府直接接触，可以作的事情也不多。在友好往来和保持互利关系一个多世纪以后，美国的利益和国民与许多别的国家的利益和国民一起被赶出了大陆，从此就一直被拒之于门外，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一个世纪中，许多西方国家曾在中国作了大量经济、文化上的投资。美国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文化方面的投资。尤为突出的是，美国新教和天主教教会曾把大批传教士派往中国；美国的各种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把它们的工作扩展到了中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些中心。在国内外从事同类事业的好心人的合作下，这些活动曾把西方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基督教思想与实践，“西方”教育，现代科学、医学发展和机械工艺等等传给了中国人民。自从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人民政府”不仅尽最大努力驱除和排斥西方的代理人及办事机构，而且彻底消除了它们的影响。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那个政府已把大陆中国变成了共产党集团的一部分，把中国的大部分国土与绝大多数的人民置于铁幕之后，成了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的一方，并且象一个侵略者一样侵略了一个邻国。它曾诽谤、迫害、折磨和杀害了许多传教士和皈依教的人。它驱逐了绝大多数外国实业家，而把另一些

人作为人质；它把所有非共产党的国家和人民斥为“帝国主义者”，并宣称美国是最坏的帝国主义国家。

但美国人民和政府仍可以为八、九百万在台湾的中国人和一千多万海外“华侨”做很多事情。被驱逐出中国大陆的美国教会和慈善机关在这些“自由”中国人中积极而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教育、医疗和救济工作。美国政府正在帮助留美的中国学生，并给予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作得更多些。

人们可以指望国民政府会坚持抵制共产主义。它在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中保持着这种反共精神。在这场全球性斗争中，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并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唤起这种抵抗精神。这样，它就同美国一起担负起了反共的大业。我们能够而且正在通过它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组织和个人同大陆中国人保持接触。是的，我们仍能为中国人作许多事情，这对他们、对中国、对我们和整个自由世界都有好处。

1950年6月，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向大韩民国发动进攻的时候，美国的决策人迅速决定必须对共产党人的侵略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议，集体向南朝鲜提供武力支援。联合国采纳了美国的建议。美国政府更进一步制定了不仅在朝鲜而且在东亚其他地方支持抵抗共产主义的策略：支持中国国民党人为保卫台湾而进行的抵抗，支持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人，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下令第七舰队去阻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并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从台湾进攻大陆。这项命令从1953年

以来已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所修改，要第七舰队不要阻止台湾采取反对大陆共产党的行动。从1950年6月起，美国政府就执行着一条增加对国民党人经济援助的政策，并已经在以提供物质和顾问的方式给予军事援助。

美国政府在态度和实际做法上的这种变化，即恢复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照我看来，是一个健康的发展。国民党人不仅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中与自由世界结成联盟，而且以他们的抵抗为整个东亚树立了一种人们正在注视的榜样。对自由世界的安全来说，阻止共产主义向东亚扩展是非常重要的。从政治和战略上说，不使共产党人接管台湾对美国也是很重要的。在这点上和其他各个方面，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保卫自身利益，同时又使之服从于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是明智的，这就要求美国合理地、坚持不懈地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由于共产党的再三要求以及我们某些盟国的要求，美国人民和政府被迫注意两个一再出现（后来在1954年又出现）的问题：（1）美国该不该“承认”共产党中国？（2）该不该让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这些问题并不涉及承认和接纳一个国家（中国）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按其本质、基础、结构、方法和目的来说都是共产主义的、目前在绝大部分中国领土上和人口中掌权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很久以前美国就承认了中国，并于1928年——象那时及尔后大多数别的国家一样——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于1942年成为

联合国宣言的签字国之一，并于1945年成为创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在联合国中，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而中国的国民政府就代表着中国，为中国发言并代表中国投票。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中国，也不是接纳中国入联合国，而是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转而去承认共产党政府，是把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给予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当然有一个可以想见的程序问题，如果这个程序得到通过，实际上将造成一种分裂局面，出现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但依我看来，这是不可行的，不应考虑。美国一向支持一个统一和独立的中国这一原则，反对与此原则相冲突的做法，而任何主张分裂的建议也很可能遭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和那两个互相对立的政府的共同反对。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大约二十五个国家从承认国民政府转而承认“人民政府”，而大部分国家则还没有这样做。有几个已经作了承认的国家目前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集团敦促美国也仿效他们的做法。“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集团，及另外几个非共产党国家正在迫切地要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转交给“人民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和坚持什么立场？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努力？美国人民和政府致力于确保我们自己的合法利益和目的的前提下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当然，也要适当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利益和目的。近些年来，随着事态的发展，目前世界的情况是，由于许多因素的作用，美国已经成为自由世界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国家了。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整个自由世界都受到苏联共

产党征服计划的威胁。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保卫本国和国际的安全。美国人民和政府关心世界和平，其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和平，相信自由，他们已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以及别的国家才能得到安全和享受自由。美国的强大及其在自由与安全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使它成了自由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领袖。这就是说，对于安全问题，美国与每一个自由国家都表示同样的关注。

美国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行动，也不可能采取会削弱自由世界的行动。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大大帮助共产主义世界，同时将大大损害自由世界。这就会使共产党人在巩固其在华地位的道路上去掉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将毁灭中国国民政府，从而取消了它对共产党的抵抗。这将促使在投票和发言时支持自由世界的国民政府更快地将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转交给在投票和发言时站在共产主义世界一边的共产党政府。这就会从自由世界的选票中减去一票而给共产党集团增加票数，并大大加强共产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的影响。这将使那些正在阻止共产主义推进的亚洲人民士气低落，感到沮丧，从而使他们以及其他怀疑美援的可靠性，使许多国家坚持抵抗的能力受到限制，意志受到削弱。

从共产党领袖们的声明和一切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当局的行动中，世界早已有理由知道每一个共产党政权力图破坏人类自由的原则和实践，它们向宗教开战，使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劝诱和强制手段，巩固发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制度并企图强加给全世界。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行动无不损害

自由世界的利益。鉴于这些结论和事实，我诚恳地希望美国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自身及全人类的福利，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在联合国中让那个政府占据中国的席位，坚决反对一切旨在加强那个政府的行动，坚决支持和援助一切旨在防止那个政府及共产党集团得到巩固和发展所开展的运动以及所作的努力。

我认为美国应该坚持不懈地执行反对与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即使是外部世界提供的那些不具战略性质的商品，也有助于共产党中国恢复经济和加强军事力量，从而使“人民政府”能够采取它曾在朝鲜所采取过的行动。自由世界对于中国向在联合国旗帜下代表集体安全原则的军队发动武装进攻的侵略行为决不应该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帮助。很难说，我也不想说，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就贸易问题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但我好象明白而且也不难说的是，从自由世界的长远利益来考虑，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越少越好。

总而言之，我认为美国应该执行一种牢固地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在我们称作我们的“生活方式”中，那些原则普遍地受到了人们的公认。不管信仰什么教义或属于什么教派，我们都属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我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按照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法律、礼仪和实用的观念来安排我们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民族的生活的。我认为，在我们与其他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中，我们应该遵照那些共同的观念去行事。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但现在，我们象其他民族一样，

受到一些已经奴役了许多民族并妄图奴役一切民族的势力的威胁。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成了那些势力的牺牲品。他们的绝大多数现在处在铁幕后面被编成团队，并被教育说，我们和其他自由人民是必须加以毁灭的敌人。但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处在可望继续为自由和安全而战斗的地位。我们同这些人有联系，我们可以如同和其他自由的人民保持联系一样，同他们建立互利关系。

对于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按基督教的“金箴”去思考和行动，以己所欲施之于人。我们应以道义上的支援和物质上的援助去帮助他们之中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以寻求自由与安全为目的的人们，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对于那些竭尽全力想统治和奴役他人的人，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能使他们的影响和力量得到扩大和增强的行动。我们应该同那些愿意接受并回报我们的善意的人交朋友，作他们的好邻居。这种人不仅在台湾和东南亚有，在我们附近和我们中间也有不少。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国民政府及其追随者，并且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固定部分。我们现在不，将来也不容忍共产党人征服台湾。对那种可能损害或不顾我们目前对国民政府所承担的义务的任何建议，我们都不应考虑。同样，我们也不应被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要求以及来自各个方面对它所表示的支持而动摇，并最终给予承认。此外，我们还应该坚持不懈地反对可能导致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的一切努力和手段。我们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和反对同在那个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进行贸易。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这个事实：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卷入中国问题并作了妥协，非但没有哪一次对美国有利，而且每一次都对中国有害。我记得1917年美国在《兰辛-石井协定》，1919年在巴黎作出的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以及1945年在雅尔塔签定的“远东协定”这些明显的例子。不顾原则、放弃好传统、根据虚构的权宜考虑作决定、机会主义的“拆东墙补西墙”——这一概都不应是美国的办事方法。在处理我们同中国及其人民的关系时，应该象我们在国内以及在处理同我们较接近的国家和更接近我们的人民的关系那样，都应采用同样高标准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到凡就中国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时，都要使之与我们外交政策的整体目标相一致。我们寻求和平与安全，这是一切对别的国家不抱有征服意图的民族的共同目标。为了使我们自己得到安全，我们必须与其他有此目标的人民合作。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性、不变的忠诚和持久的可靠性那样的岩石上，而决不能建立在诱人的“特殊政策”和漂亮的语言那样的沙土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页数=301

SS号=10241437